

沉思

川
迟
著

天
地
出
版
社

chen si

沉思

川迟
著

天
地
出
版
社

一九九九年
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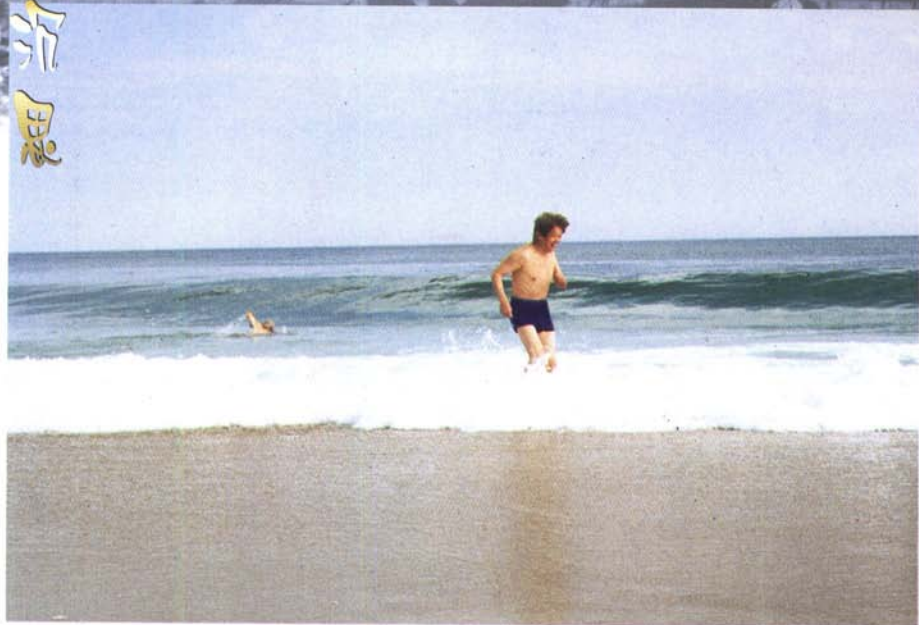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作者在纽约热情参加庆祝回归大游行，手持五星红旗者即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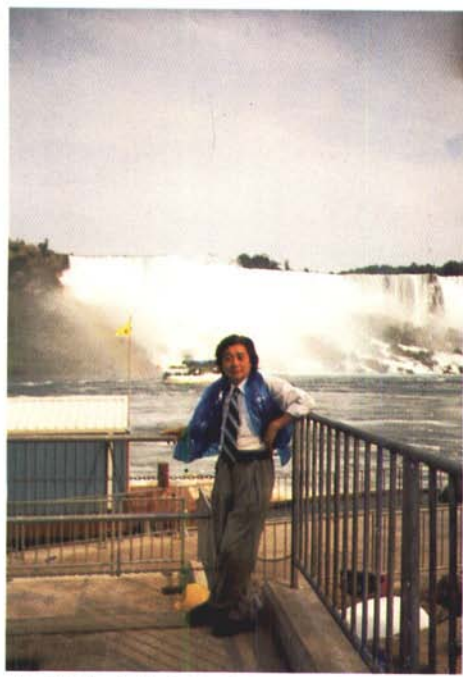
作者与朋友在一起。前排左一是作者的大哥纽约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左三是Lulne Lnine教授，左二是她的丈夫。后排左一是哥伦比亚大学Jim教授，左二是纽约大学博士后，右二右一是Peter教授和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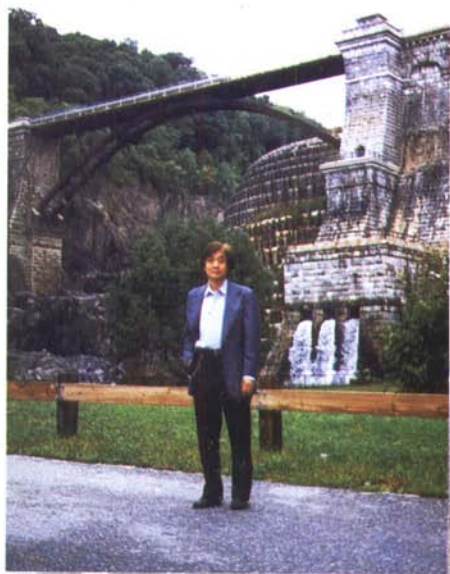
作者与好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Dr Jim Russo合影



1998年，作者在纽约长岛度假



作者在加拿大度假，摄于尼亚加拉大瀑布



作者在Croton Harbor



八旬老母来美探亲时在大哥家“芎园”门前留影。“芎园”原名 stonecrest，位于Croton on Hudson New York



1996年，作者的弟弟来美探亲，合影于大哥家中



作者与夫人在纽约的住宅后院



作者一家在纽约一中餐馆度周末



作者四弟兄在大哥家中合影，从左往右依次为二哥、大哥、弟弟与作者

目 录

写在前面	(1)
第 一 章 蜜月婚别	(1)
第 二 章 大字报出笼	(18)
第 三 章 第一次批斗会	(34)
第 四 章 “阶级斗争新动向”	(52)
第 五 章 造反派的兴起	(74)
第 六 章 巴山夜雨	(90)
第 七 章 武 斗	(103)
第 八 章 又一次批斗	(114)
第 九 章 审 问	(136)
第 十 章 “牛鬼蛇神”队的成立	(151)
第十一章 步行王庄 500 里	(166)
第十二章 “牛棚”生涯	(182)
第十三章 下 迁	(204)
第十四章 在农村劳动改造	(217)

第十五章	离 婚?	(229)
第十六章	鸡场育子.....	(241)
第十七章	落实政策.....	(262)
第十八章	再登讲台.....	(281)
第十九章	出 国.....	(293)
第二十章	关注中国.....	(302)
后 记		(311)

写在前面

这是一个回忆。说它遥远，却如同隔夜。真如一场大梦初醒。是的，“梦”！这是一场“噩梦”啊！几度春秋，夜梦犹存……

从南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农学院任教动物生物化学的我，年青、热情，对科学探索充满着幻想。自从担任动物生物化学课程教师之后，真恨不得在一夜之间，一口就将现代生物化学之成就吞到肚子里去。

1964年暑假，我回重庆探望老母亲，路过天津市探望母校南开大学。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时机里认识了小文妹，一个美丽文静的姑娘。我们在不断的通信和接触中建立了友谊，发展为爱情。我的母亲十分喜爱小文妹，我对婚后调小文妹到我任教的学院或附近的医院工作，充满了幻想。

1966年6月，她从工作单位——天津市远郊的一个医院来到我任教多年的学院结婚。我满以为一同工作多年的同事们，会为我张罗，那怕只是举行一个小小的茶会式的婚礼，然后我俩一同旅行，探望双方的家长和兄弟姐妹。我们幸福地盼望着新婚蜜月。

万万没想到，我们结婚的日子却错误地选在了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时间——1966年6月。

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全国上下，特别是教育界和文艺界掀起了掀“牛鬼蛇神”的高潮。我想：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党派。也“牛鬼蛇神”不到我的身上来。定居美国的大哥曾于1962年来信，因弟兄多年不见面，要求见一面，虽然曾引起一点波折，但那早已因不批准而告终，是已经过去的事了。对于后来被深深地卷入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毫无思想准备。

事态的发展比想象的还要糟。谁会料到，我不仅作为首批“牛鬼蛇神”被抛了出来，而且受尽住“牛棚”，罚劳改之苦。被殴打、遭侮辱更是家常便饭。时间几乎长达10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正值我壮年之时，一场噩梦醒来，竟然已经步入老年，想起那被浪费的时光，令人无限惋惜。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责任把这一段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历史以作前车之鉴。

1980年我已人在美国，一切从零开始，年已半百，每

日为一家生计奔忙。但我仍关注着中国的一切变化。自邓小平主政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可喜变化。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成了鼓舞人心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狂热的个人崇拜转变成了“振兴中华”；过去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变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去的“闭关锁国”，变成了“改革开放”，探亲、求学，往来自由。我经常听到中国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消息，但却始终未得机会回去看一看。1983年大哥接母亲来纽约看看，自她由美回国后就未再见到她。1997年我的母亲已是96岁高龄。我决计回国探望母亲，更想看看祖国的变化。我从纽约直达上海，继而杭州。我决定不乘飞机而乘长途火车去重庆。再去成都、大足、万县、奉节、丰都、宜昌、三峡、小三峡、小小三峡、北京……

是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文物建筑物，已经一一修复。著名的丰都鬼城，又以其固有的丰姿多彩的历史面貌，迎接着各方游览的客人。到处都是繁荣景象。虽然全国人民达到小康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部分人确已先富起来。火车沿途，农田精耕细作，一派葱绿。过去疏懒的“吃大锅饭”的现象已经绝迹。中国人民固有的勤劳本色、奋发精神又生气蓬蓬地展现在我的面前。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把贫穷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市面萧条，粮食、日用商品奇缺。只得靠发粮票、购物券来控制物资短缺的市场供应。而今实行“市场经济”市面物品供应丰富，应有尽有，市场一片繁荣。更使人惊讶的是各地高层楼房，拔地而起，新建高楼大厦林立，多不胜数。

尤其使我惊讶的是人们说话随便。当年那种“墙有眼，壁有耳”，人们说话谨小慎微的现象已不复存在。“抓辫子”，“打棍子”，动辄无限上纲的现象亦已不复存在。此次回国曾与众多老友相聚，有报社主编，还有大学教授……大家相聚，随意攀谈。我深深地感觉到，现在确实已经和过去那种“话到口中留半句”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大家可以随意发表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的看法。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看来天下之事真是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堪称一场浩劫，到头来却是坏事变好事，人们的思想认识却为之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在北京的一天，我来到天坛公园，坐在一张长椅上，看见一人约有五十开外的年纪，在近旁练太极拳。不一会儿他练完太极拳，来到我附近的长椅上休息。我特意走过去和他搭腔。闲谈中得知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由于彼此水平相当，交谈起来十分投合。在他知道我是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以后，他和我的谈话却依然无所顾忌，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政治评头品足。这再一次使我感觉到，中国变了，确实变了！我的心中为此充满了喜悦。

我的母亲已经96岁高龄，但她耳聪目明。坐在母亲的身旁，思绪万千，历历往事涌上心头。我特意去为父亲扫墓。小小的墓碑字迹已经开始剥落。我轻轻地读着碑上的“墓志铭”：“雄伟将军骨，多情诗人肠。”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父亲的诗句“一枕黄梁七十年，花开花谢如梦传……”真是叫人感叹不已。

我怀着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返回美国。如今科学、民主

迅速发展。小小的地球将会是一个“世界村”。愿我中华与世界接轨，迎接那 21 世纪的到来。有感于中国今日之进步，萦回往事，遥望清明，愿我从 10 年噩梦中惊醒的民族，向着科学、民主、法治的方向振创一代新风。

青玉案

十年噩梦绕惊魂，
长夜漫，
景阴森。
河山悲惨浩劫频。
千门万户，火热水深，
神州叹陆沉。

蓦地虎降豺狼群。
劫后居然庆余生，
喜看人间净妖氛。
萦回往事，
遥望清明，
烟柳又一春。

川 迟

1998 年 10 月 1 日于纽约

第一章 蜜月婚别

那还是在 1966 年，我在西北某省一所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任教动物生物化学。记得是在那年的 6 月 26 日，畜牧兽医系（以下简称牧医系）党总支（全名：中国共产党畜牧兽医系总支部委员会）召开一次教师扩大会议，每位教师都必须参加，听取宣读中央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曾有过许多“运动”，所谓运动，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参加一个既定政治目标的活动。

这时我已开始觉察到，我的同事们似乎和我保持距离。我的未婚妻从她的工作单位来到这里，她也同时觉察到与人相处的困难，似乎是山雨欲来的前夕，好像将有一种灾难降临到某些人的头上。但是，我们无法估计会是什

么样的灾难，并且是谁将会遭遇。

我俩决定结婚。我没有钱来买一件小礼物送给她，婚礼可说是最简单的了，但却是十分深情的。更准确地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婚礼，除了我和她拿着各自从工作单位开来的结婚证明，一同到办事处领取了一张结婚证书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庆贺仪式，没有聚会，也没有朋友来看望我们。在这风云密布的形势下，谁还顾及得了。事后得知，当时系领导早已背着我，发动群众给我写大字报了，只是还没有贴出来而已。

当是时，农学院的单身教师是三个人住一间屋子。我得到牧医系领导批准，请另外两位教师暂搬别屋睡觉，这间不曾挪动任何物品的，零乱不堪的小屋，就是我们的新房。我写了一张小字条，权充喜联，上面写道：

路漫漫其修远兮，宜同攀以求索。

她愉快而深情地接受了这个“礼物”。我俩相依坐在窗前，静静地望着天空。繁星点缀着一勾弯月，四周一片静寂。月亮含着微笑，星星俏皮地对着我们眨眼，晶晶闪闪，好像在与我们的心灵对话。是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宜同攀以求索。”这就是我俩心灵的歌，我们的婚礼。

我反插了门，门外似乎有走路脚步声，又像是窗外有夜鸟在飞。我俩都屏住呼吸，继续静寂地坐着，不说话，相互依偎着。生怕一举一动都会惊醒了这甜蜜的新婚之夜的梦……

后来，她轻轻地问我：“你在工作上没有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吧？为什么……”

我说：“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也没有说错什么话，看来似乎是一场新的运动又要开始了。”

她忧虑地问道：“什么运动呢？”

我说：“谁知道，慢慢就会清楚的。”

我们又进入了沉静。然后，我说：“你轻轻地给我唱只歌好吗？”

我的妻子是天津市远郊一家医院的内科医生，她不仅通达医理，热爱医学，而且画得一手好画，更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歌唱者。我很爱她。

她点点头，然后轻柔地唱道：

“是谁给我苦酒满盈，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这是赞美诗中的一首歌，召唤人们跟着耶稣基督。她柔和的歌声深深地感动着我。她是一位基督教信仰者，她的父亲原是一个神学院院长，在中国基督教会甚具声名。他是一位谦和而可尊敬的人。但是她的父亲由于有过这样的工作职位，无论对他本人还是他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危险的记录，似乎是一个不可洗脱的羞耻。

她唱完后，我就开始给他讲一个又一个有些是她早已听我讲过的故事。从天方夜谭到春秋战国，从宋代的辛弃疾到清末的石达开，以渡过这个苦而甜的新婚之夜。一直到午夜，我俩都十分疲倦了，才脱衣同卧于那狭小的单人床上。她含着微笑幸福地拥抱着我。

好像是飘泊在湖中的两片浮萍，在微风荡漾中碰在一起，相互依偎着，任凭水波荡漾，再也不愿分离；又像天空中的一朵浮云，在漂移中搂住了美丽含羞、皎洁的明月，久

久地不愿分开，使夜色变得更加宁静，柔和与美丽；还像是火山爆发后流出的岩浆，烤热了就近的一个沼泽，就在这暖暖和和的沼泽中滚打，在那壮观景色之后，留恋不舍地徘徊在那温柔的暖泽里；也像是一个古老的童话，在这古老的童话中却蕴藏着无限的新颖，令人激动和惊奇。上帝创造的人是有缺陷的，但在神秘的爱河中，却是完美无缺，令人无可挑剔。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拼搏，在拼搏中需要智慧、情操和勇气，在这狭小而又简陋的新婚洞房之中，我与小文妹的情爱，远远地超越了物质，超越了时空。爱情像一个巨匠，正在修筑起一道永恒的长堤，在这长堤的背后，有巍峨的高山，滚滚的流水，茂密的森林和那无边无际的莽莽苍穹……

我俩早已下意识地感觉到将有可能降临的危机，但神秘的爱情的力量，却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静静地倾听着她那均匀而甜蜜的呼吸声，轻轻地在她耳边说：

“亲爱的，在我们前面有一条漫长而弯曲的人生之路，今天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开始，愿我俩甘苦与共……”

清晨，她把我推醒说：“你睡得好香哇，你们要开会了，还不快起床。”

我急忙穿好衣服，立即到楼下职工食堂胡乱买了早点，给她送到屋里，就开会去了。把她独自一人留在那间她十分陌生的，原来是三人同住的小屋里。小屋显得既窄又乱，另外两张床的被褥已经搬走，床上留下中国北方惯用的草垫。我们不可能去整理收拾它，因为三分之二都是别人的东西。这间小屋就是承蒙领导关怀暂借给我们的新婚洞房——农学院第二教职工宿舍 305 室。

会议是由牧医系党总支部召开的全体教职工会议。这时除少数课程还在进行外，大部分均已停课。会议室是原来的一间教室，我进去后安静地坐在一角。与我较接近的朋友看见我只是点点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耳语般地对我说：“祝贺你啊，你的新婚。”

我就点点头说：“谢谢。”

看来大家都在十分谨慎地保护自己。只有那些负有“官”职的要员和个别一向认为自己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家庭的人，才是畅无所忌，嘻嘻哈哈。这样的人是在教师中贯彻阶级路线，培养无产阶级师资队伍的力量，在年轻教师中并不在少数，但自恃“自来红”，因而专横跋扈的人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在运动期间也表现不出来。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表演时机。

今天大部分党员都集中开党员会议去了，留下一位掌握会场。所谓会议，只不过是由指定的人念读指定的“两报一刊”，即《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社论或文章。每读完一部分就要求大家发言、讨论，谈心得体会。并照例重复那几句老话：

“这次运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大家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这次运动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不秋后算账。”

积极分子往往争取先发言，表示坚决响应党的任何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一般中、老年教师都较沉默，说话都较谨慎。但每个人总得说几句，否则无法应付场面。一般多说些对文章的拥护之意，或检查自己认识不到或还不够深刻

等等。但人人说话的开场白，都学习官方报章杂志上的口气，因为这样免于犯错误，都有这样的内容，即“东风劲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

快到中午才休会，大家赶忙回家吃午饭。我们这些单身职工（我才结婚，夫妻不在同一单位工作，还没有分到房子），都在教职工食堂买饭。我赶到食堂时，买饭的人已排起数条长队，好在炊事员手脚快，加上帮厨的，大家10多分钟就买到饭了。当我把饭菜拿到三楼我们的洞房时，看见她一人正忙着作画，虽然是铅笔画，但画的一个少女，翩翩起舞，栩栩如生，十分可爱。

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妻子恬静而美丽的面颊，说道：“对不起，才散会我就往回跑，到食堂排队又花了一些时间，你一人在屋里觉得很寂寞吧？”

她微笑着说：“你们开的什么会？你平安我就很快乐，我并不寂寞，我在画画儿呢。在工作中总无时间来画，没有时间来作我喜欢作的事。现在有时间了，回头我去买点颜料，我要画几幅画。可惜这张桌子太小。”

我说：“有爱好就没有寂寞，愿你在你的爱好中得到快乐。时间不长，下午和晚上开不开会现在还不知道系里怎么安排。快吃饭吧，这些菜你爱吃不？晚餐你和我一同去食堂买饭。”

下午1点多钟得到通知，今天下午和晚上党员集中开会。群众没事自学。我高兴地说：“快，我们到王陵去玩。”

王陵是清朝皇帝的陵墓。从农学院后山小路走去，约20分钟就可走到。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包括农学院和周围

地区在内，方圆数百里，以前都是参天古松。居民原来多在此采松油、蘑菇，打野生动物等。近年来由于管理不善，林木被砍伐，现在只有陵墓周围的松树还幸存。我们来到了王陵，看见古松成荫，雄鹰高翔。其中有一棵特大的松树，约有四人合围的直径，枝叶茂密直撑蓝天。我们高兴极了！

我说：“围着树跑，你能抓到我吗？”

她说：“当然能。”

我们围着树跑了一会儿，我故意放慢脚步，让她抓着我，然后我们一同躺在草地上。过了一会儿，她提议说：“让我们再一同围着树跑三圈，第一圈为五哥的健康、平安和永远如意。”她称呼我五哥。“第二圈为我俩的爱情永远像这棵松树一样长青。第三圈为我们家里的人永远平安。”

我说：“还有，为你的快乐、健康和你的美丽。”于是我们围着树又跑了起来，一圈、两圈、三圈。四周静无一人，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亲吻着她，轻轻地说：“小文妹，我爱你，永远，永远……”然后，我俩又一同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天空是晴朗的，古松笔挺挺地直指蓝天，一些小鸟在林间鸣叫，穿插滑飞。古老的红色墙垣旁有几株静寂的野蔷薇，悄悄地散发出淡淡的芳香。还有那牵牛花和紫萝兰在风中点头向我们微笑。啊！我爱这清新雅致的静寂，我爱这大自然！

她刚要说话，我立刻说：“别忙，请等一等。”

她说：“哦，我明白了，又是穷秀才诗兴发了，是不是？”

“对，胸中有诗，就像你笔下有画一样，总要表达、表

达。”于是，我就一句一句地念出来，当然都是我临时乱编凑的：

千年古松枝叶茂，
苍劲翠拔挺晴空。
雄鹰高翔苍穹碧，
小鸟嬉戏绿树丛。
而今恋人漫游处，
却是前朝开国功。

.....

说到这里，她笑着说：“什么开国、苍穹的，不好、不好。打油诗、打油诗。”

我俩都笑了起来。我建议去看看王陵建筑。本来若从前面正门进入，都是要购票的，一角五分钱一张。我们从后面断墙处走进去，林密树高，空无一人。

我说：“入陵票今天就免了。这是农学院的福利，你不用害怕。”

其实，每到下午4点多钟，已无外来游客，本地人早已是畅行无阻了。中国清代园林，大体相似。但此陵若比之东北沈阳的故宫，当然是差之甚远，就更不能与北京故宫的建筑相比了。但这儿的参天古松，却是别具一格，无法比拟。可惜当年那么多的古松苍柏如今却毁之殆尽。此陵墓若从旁门进，有下马亭，若从正门拾阶而上，亦然甚为雄伟壮观。有第一道院落，第二道院落，每群建筑都有正厅，侧厅。可

惜每个厅堂都是大门紧锁，只能从窗口窥视室内。尤其是有一楼角，前些时因雷击着火，现在正在整修，游人不得进。走过第二道院落，是宽阔的林区，最后才是如一座小山样的坟墓。也许清朝的哪一个皇帝就埋葬在其中。走了一圈已快到下午5点钟了。

我说：“该回去吃晚饭了，去晚了买不到菜的。”

于是，我俩又从后面出陵，这条捷径回农学院既美又幽静，若从前面走回去，要走一个多小时，就是公共汽车的两站路程。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在路边摘了一棵三棱草，让她拿着另一端。

我说：“来，一同撕开这根草，看看你会生个男孩还是女孩。”

她红晕着脸，害羞地说：“谁说的，这能灵吗？”

我说：“灵的，若两人撕到交叉处，剩一道草茎，就是生男孩，若是两道草茎相连，就是生女孩。这叫爱情草仙算命，不信试试。”于是，我俩各执草茎的一端。

我说：“等一等，先要吻一下以示爱情的真诚，否则不灵的。”

她依从我说，相互亲吻了一下。然后我俩同时轻轻地撕开草茎，撕到相互撕裂的连接处，看见只剩下一条草茎相连，于是，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喊着说：“男孩，男孩！”

她红晕着脸，紧紧地追赶我，一边说：“你坏，你坏。”

我们顺着山脊跑过去，快到校区，行人多了。于是，我俩才收敛笑容，慢慢地，一本正经向教职工二舍走去。

农学院教师中早已传遍，吴老师娶了一个年轻的，十分

美貌的妻子。晚餐我带她一同去食堂买饭，发现不少人故意滞留食堂，要一睹吴老师美丽的妻子的风采。当她排队买饭时，大家有意很有礼貌地让她。炊事员打饭时故意多盛一点，在大菜盆中盛菜时，故意将勺子往肉多的地方伸，分量也足。

我说：“今晚就在食堂吃吧，往楼上端太麻烦。”

我们在食堂一角刚放下饭菜就有人递来两张凳子。食堂的凳子并非每张桌子都有，平时大家都是站着吃饭。只是在食堂的一角有两张桌子有凳子，是供客人或领导吃饭用的。但客人不是天天有，领导也不是每天来。于是，凳子就被大家传来传去地坐。我谢过了递凳子的人。

我小声地对她说：“乖乖，你买的菜都是双料加钢，肉又多。下次还是你去买。”

她笑着回答说：“快吃吧，这儿是食堂，不要多话。”

牧医系的单身职工，吃饭时多集中在食堂左上角的几张桌子。不一会儿他们来了，一边吃饭一边大声逗趣。农学院大家对牧医系的印象均不大好，由于少数牧医系的年青教师说话粗鲁，所以就有人给牧医系取了一个绰号，叫“驴子系”。这时畜牧学助教兰尹成走到桌前，嘻皮笑脸地说：“夫妻餐呐，吴苑新你这小子，真他妈的艳福不浅呢。”我带着微笑沉默着，没有说话。

晚饭后，我建议去几位老教师家串门。她和我一道先到蒋教授家，又去程、杨二位教授家。他们是农学院的老教师，待人都很客气，照例端出糖和水果来。我们也照例拿出糖来，一人一块，这叫“喜糖”。

他们就会说：“恭喜，恭喜。糖真甜，像你们小两口子过日子一样。”

每家我们都坐不多久，只是略为寒暄一阵便告辞。最后一家是聂老师，她是我们生理学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我们很熟悉，坐一会儿后我看见她家的唱机。我说：“放只歌来听吧。”

聂老师叫我到一旁，小声对我说：“还是不要放唱机吧。现在情况不对，你们少去几家，早点回去休息。”

我明白了，不一会儿就告辞回去了。但我万万没想到大祸马上就要临头。

这分明可见是一场大运动的前夕。

我记起1962年农学院曾经大张旗鼓地批判农学系助教李琪苑投敌叛国。李琪苑的丈夫在香港，她经过长期申请获得批准去香港探亲未归。农学院内就掀起了李琪苑投敌叛国的批判运动。在牧医系的座谈会中，人们还把归国华侨李新华也贬得一文不值，体无完肤。李新华原是农学系作物栽培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和我原来同住后山第一教职工宿舍，我们因都爱好体育运动而相识。他从香港探亲回来带了一些当时认为是价值昂贵的东西。例如，一台凤凰牌自行车。自行车在国内本是十分常用的简易交通工具，凤凰牌只不过是当时难得买到的抢手货。但是他的自行车的扶手上，装有一面可以不用回头就能看见后面的镜子。这在当时的情形下，这面镜子就不容分说地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装璜，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象征。骑自行车还在照自己的丑脸！

后来由他工作单位的领导亲自与他谈话，叫他把镜子取

下来。李新华倒是很识时务，很顺从地把镜子取了下来，再也未装上。但更使一些人不能容忍的是，李新华还带回来了一个当时国内很少见过的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理当是一个大匣子，放在桌子上转动电钮来听才对。他的收音机居然带在身上，骑自行车还能唱歌，简直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因此就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屁股里面唱洋戏”。

聂老师这时告诉我不要听音乐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口号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我想：“这次运动刚开始，有人见我就显得这么紧张，大概是3年前我的大哥从美国来信，弟兄20年不见面，要求见一面但未获批准有关吧。但是已经事隔3年多，不批准也就不批准，也不至于有太大麻烦吧。”这时妻子见我不说话。就向我说道：“你一个人发愣，在想什么呀，我不会因为结婚没有婚礼，没有朋友来而责怪你，我知道你心中为此事很烦恼。”

我说：“谢谢你，我十分了解你的为人，你聪明，你通情达理，我谢谢你！”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眼中充满了泪水，我借故去上厕所。回来后我说：“睡觉吧，今天也走累了，明天还要开会。”

我躺在床上，她披衣坐着。我要求她唱只歌。她知道我喜欢听什么。

于是，她轻轻地哼：“蓝蓝的天，银河水，一只小白船。船上有棵桂花树，一只小白兔。帆儿，帆儿也没挂，桨儿也

没有。漂呀，漂呀。小船向着西天走。”

啊！夜，美好而宁静的夜。又来到了我们这狭小、零乱，但却是十分甜蜜的小小洞房。我愿这夜色长住人间，不要让白天的烦恼和那无休无止的会议再来干扰！

第二天的会议，仍和昨天一样没有多大区别，党员多集中开会。从历次运动来看，每次运动均是从党内布置，再到党外。党员、团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当然是执行任务的主要力量。在党团员的带领下，依靠阶级出身好（所谓阶级出身好，就是指其父辈或祖父辈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定为贫农或下中农和城市定为工人的人，这些人总称为“被剥削阶级”）的人和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来完成运动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党委也采取同样作法。由于党内部署尚未完成，所以我们这些群众的所谓开会学习，当然就只是皮皮毛毛没有多大作用的。念读各种政治文章，是填补空白时间的最好办法。

以后得知，事实上这些天各系对要整的人的大字报，在系领导的组织下，一部分已经写好了。只等一声令下就张贴出来。只是不让我们这些被系领导点名、当然也必定是经过学院批准的批整对象知道而已。这也是我结婚都没有朋友来庆贺的原因。

这时学习的各种文章很多，其主要来源就是“两报一刊”上面登载的文章，学习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此文是姚文元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由此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就是向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合

写的《三家村札记》开刀^①。

批评文章说他们的每篇文章均有所指，或以古喻今，或以今论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其实当时党内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我们这些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又非党员，当然无从得知其究竟。

这个“学习”一直延续了6天，到第七天，大概是一切均已就绪。他们认为已经布置妥当了。所以就由牧医系基础课党支部书记王佳真来通知我，要我的妻子明天离开，回她的工作单位去。这是我的新婚蜜月，我当然不同意。我说：“她请假来结婚，假期是一个月。现在才7天，时间还长着呢。”

王佳真是被保送去苏联的归国留学生，当时他热衷于“政治”，学术上并无成就，他是由牧医系系主任刘子武，一手主持由研究所调来我校任教微生物学的。他见我不同意，就走了。傍晚，系党总支部书记王立成，又来找我妻子谈话。她回来后对我说她决定明天离去。

我问：“为什么？”

她说：“还是走吧。你们的运动要开始了，硬顶是不行

^① 《三家村札记》是廖沫沙任《前线》杂志总编辑时，于1961年开辟的一个专栏。他邀请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合写。此三人皆学识渊博，笔下文采灿烂，他们的文章引古喻今，批评了当时的“假、大、空”，即说假话、大话、空话的恶劣作风。他们的杂文深受欢迎。

江青用批“三家村”来打开北京市委的缺口。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发动“文化大革命”作准备。吴、邓、廖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吴晗和邓拓都先后被逼死。廖沫沙被关押10年之久，1990年病逝于北京。

的，我俩相隔仅两天路程，不久我就会回来看你。”

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遇事千万冷静，自己多保重，不可太着急。”

夜来我俩都不能入睡。

明天她就要走了，这是我们的蜜月吗？我们为什么要受人如此摆布？

我惶惑，我痛苦！

但当时最大的痛苦，就这一股离别情。我提起笔来想写点什么，但却不能成笔。一直到她离去后，我才写下了《婚别》。

菩萨蛮 婚别

梦入春风拂絮杨，
乍惊日暮山昏黄。
游云楼弯月，
夜色益茫茫。
两情相聚短，
银瀚恨偏长。
莫道关山远，
寸心惜流芳。

当时，虽然我俩均相互劝说对方，但谁也劝说不了自己的感情。她平时不许我喝啤酒，今晚却主动给我买了一瓶，但玉液金波噎满喉……

夜色早已降临，桌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我终于

想起了一个礼物。

我说：“你把这时钟带着吧。听见滴答声，就是在催促我们早日再见。”

第二天一早她离去了，牧医系派人看住我，不许我去车站送她。我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一步一步消失在泪水迷蒙的眼帘之中。

她走后，我又去开会，但被通知不要去牧医系，改去综合楼的一间教室学习。我进得教室，看见只有牧医系的几位老教师在这里。留学日本的养马学教师文成之，留学美国的畜牧学教授周谷中，养猪学专家毛立广，系副主任孙光文，蚕学专家李玉铃，名兽医张雨英，脊椎动物学教师胡朝芬……来这里作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只知我们从现在起由学生来领导学习。我进入教室时学生不在，各位老师向我打招呼。

毛老师问我：“你爱人呢？她走了吗？”

我说：“是的，她回她的单位去了。”

文老师说：“这就好了，不在这儿最好。”

毛老师说：“老文头儿，你在说什么呀！人家是新婚蜜月。”

我睁着一双大眼，看着他们。一句话也未再说。是的，这是我的新婚蜜月。

我们就这样地被抛了出来，成了运动的第一批对象。

一旦被抛了出来，抄家、游街、批斗、劳改、打死、自杀……遭遇无奇不有。

而我呢，一整便是10年，经历了数不尽的屈辱和辛酸，

就这样度过了我一生中的壮年时光，它本应是我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年华！

第二章 大字报出笼

傍晚回到我的“新婚洞房”，这儿已经不是新婚洞房了。另外两位教师已经搬了回来，而且很明显地看得出来，他俩是奉命监视我。其中一位是家畜病理学助教米成西。其父是煤矿工人，当然是所谓出身好了。但是他却常常忧虑，经常向工会申请生活补助。因为他的家境困难，有三个小孩，工资收入太低，妻子又找不到工作。看来他并不愿意作这项差使，我们同在一个系里教课，虽然不是同一门课程，但也十分了解，更何况同住一个寝室，所以他十分马虎。而另一位则是家畜生理学助教赵江。因为他出身好，在大学一年级就被选进师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专门突击学习生理课程，其它课程统统不开，以培养速成教师。

凡是领导叫他作的事，他自己从不思考也不问一个为什么。他对解剖教研室的另一师资

训练班学员——关山木的话总是言听计从。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还要争取超额完成。其中缘故之一，乃关山木是他入党介绍人。赵江虽然过去对我是吴老师、吴老师的叫得十分亲切，但今天转瞬间就变了样，对我十分凶狠。带着一对敌视的眼光，好像真是一下子就抓到了一个阶级敌人一样。

农学院的教师这时的表现十分微妙。一些人被称作“实力派”，即埋头钻研业务，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都多少有些心得，大体说来这些人都不爱过问政治，所以常常成为党团员或积极分子帮助进步的对象。而他们弄得不好就会得到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不好名声。另一些人则被称为“风云派”，这些人多貌似积极，争取入党或入团，有的则早已是共产党员，得到一个官当的机会就多，所以“入党做官论”这个词儿就应运而生了，也成了群众对“入党动机不纯”的质疑内容之一。这种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却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在高校，若谁能得到一个“又红又专”的美名，当然就是很大的成功了。赵江在“专”字上毫无基础，在学术方面本无兴趣，就拼命在“红”字上下功夫，所以就处处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诚。如今运动到来，当然就成了他积极表现自己，靠近党组织，所谓争取进步的良好时机。

第二天上午，赵江十分敌对地对我说：“交出你的日记本来。”

“你要我的日记本干什么？”

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命令。”

“我是一个普通群众，不必接受这样的命令吧”，我回答

道。

他气势汹汹，大喊大叫，不一会儿门外涌进一大批人。关山木也在其中。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好而抽调入“师资训练班”的速成教师。

这时他说道：“大家先出去，回头再说。”

人们离去后，我坐下来，翻了翻我的日记本。在我备课或看书感到疲倦时，总爱以欣赏文学作品来恢复精神，或是抄一小段我喜欢的诗句，或是我自己有感写一首诗或填一首词。质量虽然不高，但作为自我欣赏，是我习惯的一种消遣方式，确实是很有兴趣的。年积月累竟有一厚本了。说实在的，在我的诗中根本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若是朋友有共同爱好，想要看一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日记本里，还有些是我爱好的生物化学或“衰老研究”的科学摘录。所以当赵江伙同一些人再次回来索取时，我就让他们拿走了。我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本子，又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看就看吧，何必弄得这么紧张。”

下午当我再去综合楼时，被通知去生化楼（即畜牧兽医系所在的教学楼）看牧医系的大字报。进得楼来看见已在走廊上从墙顶到墙脚挂满了“大字报”^①。

第一幅大字报的醒目大标题是，“看！汉奸文成之的丑恶嘴脸！”因为文成之曾经留学日本，所以就是汉奸。当然

^① 大字报，即用一相当于报纸大小的纸张，用毛笔以较大字体书写，挂在墙壁上称为大字报；若用十六开的小纸张书写贴在墙壁上，则称为小字报。

不止这么一幅。其它诸如“看汉奸的反党言行!”“揭发汉奸文成之的反党事实!”等等。走廊的另一面是攻击畜牧学家系副主任孙光文的大字报,其通栏大标题是:“反动学术权威孙光文的反动本质!”

当然每个被整对象都不止一份大字报,各人从一份到十份不等,有的甚至上百份。纸张、笔墨、糨糊,挂大字报用的绳子一切应有尽有,全部免费,方便供应。

大字报内容千篇一律,不外乎都是以谩骂攻击为能事,攻击谩骂越刻薄越凶狠,其作品的质量就越高。尽量把被攻击的对象与阶级敌人挂上钩,这在当时叫做“上纲上线”。“上纲上线”得好就代表该大字报作者的思想觉悟高,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来说就是“对待阶级敌人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就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代表着马列主义水平高,毛泽东思想学得好。谁能从只字片语中,“上纲上线”得愈高,就越是好文章。谁能无中生有,编造事实,迎合领导意图,就是最好。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阶级敌人揪出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能这样做,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

再往下又是,“反动会道门,迷信巫婆胡朝芬。”胡朝芬是基督教徒,所以有此标题。又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张雨英”。“揭发反动学术权威毛立广对党的恶毒攻击!”……多得不可胜数。顺着走廊走去,在拐弯的中部,就是给我贴的大字报了。

第一幅大字报的巨幅标题是,“看!小毒蛇放大毒!”

关于大字报还是在1957年,我在南开大学念书时的

“反右派斗争”中就见得多了。但如此恶毒攻击的标题强加于我的头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张开始，顺着走廊约七八米长，均挂着攻击我的各种大字报。大字报未书写真实姓名，多是集体签名，也有大字报不留名的，也有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这张“看！小毒蛇放大毒！”的大字报，其内容大体是分析我的所谓反动阶级本质，里通外国，说我和在美国的哥哥通信往来，是里通外国，为帝国主义提供情报。通篇文章其用词之恶毒、谩骂之刻薄，确实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文章紧接着就是揭发我放的“大毒”。那就是从被他们强行取走我的日记本中抄下来的一些诗作。第一首，也就是王立成、王佳真等人认为是反动的一首，就是我写的《腊梅赞》一诗。

围在这一幅大字报下面的人最多，一些人在读，一些人在抄。有几个农业机械化系的学生，站在一旁议论纷纷，说道：“可真有点才气。”旁边有人向他示意，对着我撇了撇嘴。意思是说，“那就是他”。于是，他们的议论我就再也听不见了。

我静静地站在这幅大字报前，再读我自己多年前的诗作——被指责为最反动的作品《腊梅赞》。

腊 梅 赞

渴饮霜露饥餐雪，
风号冰坚尤自得。
植根冻土不惧寒，

苍劲枝干韧如铁。
不重容色求优宠，
何思妩媚对蜂蝶。
千树凋零百花谢，
唯君独傲霜冰雪。
含苞一枝香彻骨，
素裹大地添颜色。
待看冬去春来吋，
万紫千红慕高节。

他们抄完这首诗之后，紧接着就是他们精心组织起来的所谓的批判内容。其中心内容大概归结起来不外乎是说，这首诗的作者是对新社会，对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新中国怀有刻骨仇恨。作者居然将自己比喻为不屈不挠的“腊梅树”，而将新中国比喻为“冻土”。诗中的“待看冬去春来吋”，就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

大字报故意隐瞒我写这首诗的副题是《〈王若飞同志在狱中〉一书读后感》。这本书以前一直是共产党为教育年轻一代提倡必读的文学作品。我读此书，有感于书中的主人翁英勇不屈的气节而作此诗。“腊梅”是赞美书中主人翁的，而“冻土”是比喻书中主人翁所经历的监狱生活。大字报之所以隐瞒这些事实，是为了便于造谣惑众，借以煽动群众，来对我发动起更多更大的攻击。毫无疑问大字报的组织者就是系的领导班子。其主要领导，当然是系党总支书记王立成，基础课党支部书记王佳真和党总支干事李林新。以后“造反派”造了他们的反，将他们中一些主要人物打成“保

皇派”。这是后话。

另外一份大字报，也是从我的日记本里抄下来的一首词。同样也是用巨幅大纸抄下原词。

鹧 鸪 天

景短云愁雪拥阶，
寒鸦绕树苦难排。
枯枝忍待东君至，
绿叶红花一夜开。
梅浪发，
暗香猜。
河山忽又笼阴霾，
冰雪几度熬煎过，
引望春风总不来。

紧接着也是对此词的批判文章。也是说这首词是我的反动思想的大暴露。词意清楚地说明了我刻骨仇恨新社会，整天在那里“枯枝忍待”，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虽然是伸着脖子盼望，但蒋介石还不来，故而十分失望等等。

批判文章故意不提这首词并非我的作品这一事实。这首词乃是定居美国的我的大哥的作品。我的大哥是解放前通过考试去美国留学的，他是纽约大学教授，爱好中国诗词文学，有甚高造诣。他的作品深得我们弟兄喜爱由来已久。他的不少作品我十分喜爱，辗转吟读，爱不释手。这首《鹧鸪天》便是其中之一，所以被我抄在我的日记本中。此词会在

今天被如此曲解，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大字报所谓揭发我的第三首，是我和大哥的词。亦调寄《鹧鸪天》。

鹧鸪天 思兄

咏雪

古垣野草戏寒风，
苍林霭霭烟尘红。
最是昨夜连天雪，
万叶千枝皆是重。
从别后，
忆相逢。
几回相见在梦中，
奈何一夜青山老，
人间有路不相通。

接着也是对此词进行所谓的批判，大体是说我弟兄间所谓的感情，是反动的阶级情感，此词在实质上是含沙射影地诬蔑伟大的共产党造成“人间有路不相通”等等。但是，由于对这首词上纲上线，顶多只能解释成为不满情绪，无法说成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比起前两首的“刻骨阶级仇恨”和“盼望反攻大陆”，在等级上就差多了，所以对这首词的批判，就不被放在突出地位。

但是他们认为有了这三首“反动”诗词，就可以下结论，他们已经抓到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对这

种人当然就要实行“专政”，就要进行批判斗争，从而为进一步开批判斗争会开了绿灯。

王佳真是留学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归国学生，是“红”的，当然也应该是“领导”牧医系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就是分析、批判我写的诗词的主要人物。而其他以往众多留学日本、加拿大、美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归国留学生则多是“黑”的，被称为“黑帮”，如今都成了大字报点名攻击的对象。

这次运动和我经历过的历次运动，在手法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只不过这次运动看来似乎比历次运动都更加来势汹汹，更加猛烈而已。

对我来说，公布了这几首诗词，要达到对我进一步召开群众批判斗争大会的目的，就已经是顺理成章了。当然，大字报所涉及的其它内容还很多，诸如生活、吃饭、穿衣、睡觉、乃至一笑一眸、一言一行，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成为批判的内容和材料。我的日记本中其它的诗词还很多。诸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国庆节”，系里黑板报要我的投稿和其它诗词等等。因为这些对要把我说成是阶级敌人没有用处，所以就只字不提。

看完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仍然一人静静地站在大字报下。我并未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只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情景……

那时我还是南开大学生物学系三年级学生，自从我被同学推选为系学生会主席之后，每天都是十分忙碌。除了功课之外，还要忙着开会，还忙着编写我那幼稚的理想中的第一

著作：《为建立一门新兴的科学——衰老生理学而斗争》。我的学生生活，每日清晨是长跑运动，下午4点钟后的课外活动时间是学习骑军事摩托车，晚饭后拉半小时小提琴，然后到图书馆复习功课。学生宿舍晚上10点熄灯后，我还一人偷偷地带着一本书到路灯下复习半小时功课。

记得大概是1957年4月，党中央发起整风运动，层层传达到我们年级，说这次整风运动“是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要求大家给党提意见，说这是爱护党关心党组织的具体表现。经过反复动员，提意见的积极性仍然不高。一直到4月末的一天，在学生食堂的墙壁上，出现称之为“一只接力棒”的大字报组，这只接力棒是物理系的同学从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转抄来的，说是继承五四运动精神，发扬民主。当时正是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这正符合运动的精神。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好奇去看这只接力棒。其内容是由三份大字报所组成。一份大字报的标题是，《热爱党，向党进我肺腑之言》；另一份的标题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第三份大字报的标题是，《我什么也不想说》。其内容大体都是首先赞扬解放后党领导新中国的成绩，但是缺乏民主作风，或某些党员无民主作风之类的意见。原来党支部再三号召大家踊跃参加，帮助党整风是爱护党，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甚至动员每人至少要提三条意见的具体要求，但提意见的仍然不多。可是，自从这只“接力棒”出现之后，沉静的南开园，突然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到第二天下午，学生食堂墙上，提意见的大字报已贴满。

我被召去开各系学生会主席联席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北京大学谭天仁同学，来我校开自由论坛的事宜。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各系主席讨论表态欢迎或是反对谭天仁同学来我校开自由论坛的问题。谭天仁说：“所谓自由论坛者，就是充分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帮助党整风，就是要独立思考，有创见地发表意见。”与会者大多赞成。于是，当天晚上谭天仁就在礼堂发表演说，去听的人很多。他讲的内容是关于马列主义哲学定律——“否定之否定”。我这时只对“衰老研究”感兴趣，整天泡图书馆，其它一切皆十分冷淡。

在谭天仁的自由论坛讲座开始之后，南开园就更加活跃了，大字报转而指向学校党委，给党委提了许多意见，焦点集中到了物理系教授冯京的问题上。冯京本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抱着建设祖国的理想回国，据说在交心运动中，曾经逼他交代自己的历史，冯京从此精神失常，不理发，不洗脸，整天蓬头垢面。大字报上提的问题十分尖锐，说：“电影《夜半歌声》中有个宋丹萍，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而我们新社会的南开园，竟然也有一个鬼，就是大家都敬爱的冯京教授。”大字报越贴越多，发展到食堂门口，成为为冯京事件的签名运动。

恰好在这个时候，生物学系也发生了一件大事，二年级的一位同学提出了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侵犯人权，偷看他的日记，要求开自由论坛，而该支部书记则矢口否认。当时认为运动是为党整风，所以此自由论坛由学生会来主持，具体落实到人，就是应该由我来主持。开自由论坛的当天，全系

同学参加十分踊跃。会上要求发言的人很多，根本就不可能做到每个要求发言的人，都有机会发言。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两派。一方指责党支部书记偷看日记，是侵犯人权的；另一方则认为这是诬蔑，党员帮助落后群众，作思想工作是对的。参加自由论坛的人越来越多，以至窗台上都站满了人。物理系、化学系、外文系不少人都来列席参加。有的是来看热闹，有的则认为是发扬民主的大会，应该来参加。会上两派意见僵持不下，晚饭时间到了，只得宣布休会，没有辩论出一个结果来。南开园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自由论坛的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看来确实像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民主气氛伊始的大好形势，一扫以往只由党支部说了算的陈旧、刻板局面。

但是，1957年6月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文章说，“有人说我们号召帮助党整风，人家提意见后又清算人家的言论，这是‘阴谋’。我们说：不对，这是‘阳谋’。阶级敌人总会跳出来捣乱的。”于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就展开了。

南开大学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一场帮助党整风的民主运动，转眼就变成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反右斗争开始后。凡在前些时候给党委、支部或党员提过意见的，凡贴过大字报的，在自由论坛上发表过讲演的，为冯京事件签名和贴大字报的，为冯京鸣不平的，赞成谭天仁在我校开自由论坛，从北京大学传递“接力棒”的，欣赏或赞美“一只接力棒”的，凡一切被认为立场不稳，思想不正确，出身不好的老师和同学，都逐步在各党支部领导的战

斗部署下，一个接一个地作为“准右派分子”或“右派分子”被揪了出来。在各系学生会主席联席会上，讨论是否欢迎谭天仁在我校开自由论坛一事时，由于迟到，我未有机会表态，再说我当时是所有系学生会主席唯一的非党团员学生会主席，加之当时赞同谭天仁开自由论坛者已占绝对多数，我再表态与否已不重要。冯京事件在食堂门口的签名运动中，别人已把签名笔递到我手上，但因与人谈话，忙于办事，就忘了签名。在反击右派时，清查到我的头上，这两件事都抓不到。关于主持生物系的自由论坛这一事件，是生物系党团干部联席会会议决定交由我来主持，并不是由我发起的，顶多只能给我扣上一顶在主持会议的过程中“立场中立”的帽子。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我已清楚地感觉到，我是被严密审查的对象。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本该打成右派，但却无言论可据。就这样逃过了当“右派分子”的厄运。反右斗争运动后，紧接着展开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双交运动”。在班级会议上，给我提了许多意见和缺点。诸如：个人主义，组织纪律性不强等等。

暑期到了，假期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学习。第二学期一开学，全校的“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就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了。批判右派分子斗争的大小会议，生物系也和其他系一样，在系党总支部领导下，一个接一个的开起来。当时的响亮口号之一，就是：“把大字报这个有力武器从右派分子手中夺回来！”

开学时，同学们纷纷由家返校，化学系有一个小同学，听说他因个子小，化学实验课中总要站在一个小凳子上作实

验。这一天他由家返校，刚走进校门口，从校门到马蹄湖，又从马蹄湖到芝琴馆，两边都站满了化学系的同学，突然举起了标语牌，高声喊叫着“打倒右派分子！”的口号。

这个小同学一人颤栗地走到这夹道高喊的通道式人墙中的情形，我至今也不会忘记。我们每天都要学习各种反右文章，念读报纸上的批判文章、社论和全国各地反右派斗争的报道，上课就变成次要的事情了。一天下午我去浴室洗澡，正碰见历史系一位被揪斗为右派分子的同学也在那里。这时不知是谁唱起了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歌曲。当他开始唱：“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狌，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漂零……”这位历史系的右派同学就开始哭泣。当唱到：“我愿意作那刑余史臣，尽写出人间的不平……”时，他已泣不成声。在旁的我怎么样也不能止住同情的泪水。

我想：“前些时我未多说话，谭天仁开自由论坛我也未表态。真是好运气，要不然今天也就成为右派分子了。”

大字报也像当初一样，到处都贴满了。南开园一下子变成了一边倒的反右派分子的大字报。校刊《人民南开》整篇整版地刊登反右派的各种文章、漫画、连环画、诗词。南开园的《反右文艺专集》、《反右漫画专集》，纷纷出版。

南开大学校党委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同学们，‘把大字报这个有力武器，从右派分子手中夺过来，作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

以后得知，1957年当共产党提出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后，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口号，在海外亦引起了轩然大波，普遍赞誉“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可喜的民主政治时期”。许许多多海外学子，纷纷准备行装，欲返回家园，报效祖国。仅以纽约一地而言，当时经常都有为回国学子举行的饯行活动。在饯行会上，大家约定回国后立即来信，告知国内的真实情况。好友之间约定暗语：“若回国后果真是民主，来信就签名，若所说一切不真实，在来信中就不签名。”大家都等待着先行者的佳音，赤子报国心切，许多人归心似箭。仅纽约计划回国者，估计就有千人以上。

却未料到，“帮助党整风”的运动，在1957年6月骤然煞住，形势急转直下，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右派分子斗争”。这对当时海外刮起的建设祖国的回国热，犹如当头一盆冷水，一下子降温了。

不久得知，我的二哥被定成右派，送去农村劳动改造。我的弟弟当时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也被定成右派分子，而被勒令停学，劳动改造。

我想：“在南开大学时的‘反右派斗争’，我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这次运动刚开始，就毫无理由，不由分说地冲着我来了，这是为什么？”

……正想到这里，突然听见有人对我说话，抬头一看原来是系领导王立成。此人中等身材，西北人，担任畜牧兽医系党总支书记。

王做思想工作，皮笑肉不笑。这次牧医系抛出我来，他

当然是主持者。我的回忆被他惊醒了。

墙壁上挂的是：“看！小毒蛇放大毒！”

他慢慢地向我走过来。我打心眼里厌恶。我知道他会说什么。

“……群众运动嘛，自己要正确对待，改造世界观是一个痛苦过程嘛……”他果然就是这么说的。

念经！厌恶。

我和他一同慢慢地走向食堂。

大字报，造谣！无耻！

但是，他们胜利了。至少现在他们是胜利了。个人的智慧，在一个时代的面前，如同置身于滚滚的急流之中，是渺小的，确实无法扭转啊！他们想干什么呢？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呢？

第三章 第一次批斗会

大字报每天都在增加，揭发出来的所谓问题也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离奇。我心里明白，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畜牧兽医系领导王立成已经把我列为要“整”的对象。

“整人！”

1957年反右派分子斗争以来，“整人”之风愈演愈烈，人人都得学会如何在各种学习会议上发言，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的情况下保护自己。一个专职政工干部若是长期不抓阶级斗争，不抓路线斗争，这样的政工干部还能算是一个“好干部”吗？当然不能。若如此，他的官职还能保得住吗？当然也不能。这也是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1962年，我被牧医系安排主讲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的动物生物化学。我当时的讲授，

受到了学生的极大好评，有些学生并称誉我为后起之秀。有一天全系教职工和学生齐聚一堂，参加民主投票活动。投票箱放在台上，人们依次上台投票，轮到教师投票了，我亦依次上台投票。没想到当我走到讲台上投票的一瞬间，学生中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还以为是在为别的什么事鼓掌呢，当我环视周围，才明白是我教过的学生在为我投票鼓掌，我急忙用一个食指对着学生的方向摇摆，示意他们不要鼓掌，但是学生们却发出了爽朗的笑声，掌鼓得更欢。我急忙走下讲台。教师投票完了，王立成上台投票时，台下学生居然鸦雀无声，相形之下王立成十分尴尬。投票完散会后与我相好的胡老师和我走在一起。

他小声地对我说：“小吴，今天的情况我都看见了，你上台投票时学生掌声雷动，而书记上台时悄然无声，这可对你是个危险信号啊！”

我说：“这些学生也真是的，我向他们示意不要鼓掌，他们反倒鼓得更欢了，有什么办法呢，真气人。”

王立成的马列主义是装在手电筒里的，是专门用来照人的。此后，我当然就会更多地受到书记的马列主义教育和指导了。

天下之事，无独有偶。就在这1962年年末，我定居美国的大哥来信，弟兄20年不见面，要求见一面。这种信是必须交给领导才行的。我十分清楚，若不上交其情况会更糟。李林新整天忙忙碌碌，忙些什么呢？畜牧兽医系偷拆信件之事我早已有所耳闻。所以，国外来信，虽是平平常常的家信，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主动交给领导当

然是要好得多。国外的大哥并不了解我的情况，仍然来信。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停止来信。因为他毕竟是我的哥哥，我也想念他呢。于是乎，我的家庭出身加上大哥要求见一面，我就成了畜牧兽医系特殊的“内控人物”。这是一个可怕的、十分危险的角色。但我却无法规避，这是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1962年，我住在学院教职工第一宿舍，那时的教职工一舍住的都是学院各系教学主力，多为年青讲师。大多全心致力于科学，每日埋头读书到深夜。年除夕夜，各位老师张罗给自己寝室门上挂对联，同室老师要求我作一幅对联，我一高兴就写了一副对联：

临深夜秉烛攻读
看清晨气吞山河

横联是“社会主义好”

我的这些活动，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李林新收集的重要材料。《红楼梦》有一幅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我觉得不错，就抄在一小纸条上夹在书中，不久就不见了。我当然完全没放在心上，从来也未找过，不久就忘记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小纸条竟然进了我的档案材料，而且派上了用场。寝室墙壁上挂有一首于谦的《石灰吟》，也被作为“材料”收集去了。

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还有我写下的《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的一副对联：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也有思想问题，是应该批判的内容。教工一舍教师们努力学习与埋头读书的风气，后来被新党委公开地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于是，教工一舍立即被指责为“黑色航空母舰”，“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我当时所住的寝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指责为“小三家村”（“三家村”即江青组织批判的《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三人所谓的“反党集团”）。土壤农业化学系首先开始了对与我同住一室的汪哲馨进行批判，各种大小会议提意见。弄得他灰溜溜的，最后调离了农学院。说是政治上不够格作大学师资。

由于我大哥要求见面，1963年我就被王书记送到学院后山猪场劳动，停止了我的教学工作，名曰接受再教育。我在猪场劳动了半年，农学院本来养猪只养育种猪，但利用我这个编外劳动力，我为他们养成了268头肥猪，使猪场得到了一笔额外的可观的收入。于是，我得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劳动鉴定。这当然是王所不愿看到的。

但是，系里缺乏动物生物化学师资，加之我的劳动鉴定好，于是又安排我回到系里作教学工作。“教学工作”，这在当时叫做“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灵魂工程师”，当然“红”是第一要素，“专”则次之。所谓“专”是指科学技术，而“红”则是指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灵魂深处就深深地热爱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听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

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还有海外关系，在王书记的心目中当然必须清除，“整”我才能表现出他自己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表现出他的政治工作之甚有成效。

1965年学院停课，全体师生去江东地区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亦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这时，原农学院人人都敬爱的老院长，被勒令“靠边站”（意即停止他的领导工作。老院长是早年留学美国，抗日战争时期回国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新从江中市调来了一位名叫叶华的担任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成立了新党委。叶华其人，对教育工作一窍不通，他接手后立即大抓学院的政治整顿工作，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此时，全学院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去江东参加社教的。

我和另一位积极争取入党的畜牧学助教甘月新分配到沿溪大队第八生产小队（均为人民公社下的编制单位，一个大队相当于过去的一个村，小队相当于一个组）。甘月新是我的领导，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我的材料找出问题，经常向王书记汇报我的情况。事实上，王书记早已部署力量多

方收集我的材料，早在1962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因吃不饱而发生浮肿，李林新就曾安排我的实验员，暗中称量实验药物葡萄糖，看看我是否偷吃。

他们长期收集不到我在教学工作中，他们所需要的能够证明我的错误或缺点的材料。所以设想在江东农村能够收集到关于我的什么材料。但是，农村贫下中农和我相处极好，我和他们一起大汗淋漓地修水渠，不像甘月新那样爱给他们作报告。老乡们都对我好，而不喜欢甘月新。但他却在江东社教中入了党，因为他经常去汇报我的思想，毫无疑问这都是他想当然的我的思想，诸如什么我“想偷越国境啦，看不起贫下中农啦……”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我的思想竟在他的脑海中！

若要说这时我真有什么“思想”的话，我到还真有些思想，可他却没有汇报上去，那就是在这社教中清理出来的农村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使我震惊！清理出来的问题90%以上都是男女关系和贪污。

社教结束，没想到贫下中农给了我很好的鉴定，房东家老贫农提一篮鸡蛋非得让我收下不行，而对甘月新却不闻不问。在社教结束几个月后，贫下中农派人到学院来，要揪甘月新回去批判。说甘月新整他们的好队长，说他的心术太坏。这是否也是他们恨我，因而更要“整”我的原因之一，我就无从得知了。

贴大字报的第三天上午，我照例到指定的那间教室和系里大部分老年教师一道“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写交代材料和自我检查。这些老年教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

们在旧社会里，或教过书，或出国留过学，或做过别的工作，只要与国民党、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教会及其它团体有过接触，哪怕一丁点关系都必须交代清楚。所以这些人就都被集中起来写交代，写揭发材料。我是这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教师。我的历史最简单，像一张白纸上面还没有画几笔道道。我的唯一难于交代的问题就是我的大哥在解放前就出国留学，现在是纽约大学的教授，是美籍华人。这些组织上早已在我的档案材料中写得清清楚楚。解放后交代个人历史的运动，大大小小已有许多次。和老年教师相比我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也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东西，来完成每天必须上交的材料。

下午，突然通知我去学生食堂开会，由几个人带领我走向会场。与其说是带领，不如说是押着走进会场。会场是在学生食堂的一端临时布置起来的。里面早已坐了半屋人。掌握会场的是畜牧学助教朱成。王书记坐在他的旁边。这位朱老师是从西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平时与我相处虽说不上接近，但也从无芥蒂，还算过得去的同事关系。现在是由他掌握会场对我开批斗会，当然，这正是可以表现他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看见会场的前方挂着醒目的巨大横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被强迫站在一个大半圆圈围坐的人群中间，我的身后放了一张凳子，但这不是用来让我坐的。我过去备受同学爱戴，被他们称为年青有为的老师，没想到转瞬间就成了一个“准阶级敌人”。

多年后得知，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教过的学

生不少人都很为我难受，尤其是一些女同学还悄悄地哭了。但是，从全国的政治气氛来看，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必须在这场运动中有好的表现，才能使自己平安无事。还有一小部分人总是想借运动的机会，挖空心思去揭发，去诬陷别人。甚至无中生有欺骗群众，以表现自己无产阶级立场坚定，以达到自己想索取的目的。有的想得到好的政治评语，从而得到满意的毕业分配。有的想成为政治骨干，为入团、入党积累资本。在那个被扭曲的年代里，似乎只有你“左”我比你更“左”，才能使自己有前途。

当强迫我站定后，朱成领着大家一同念毛泽东语录，他说道：“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请大家翻到毛主席语录第十页第三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大家同声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再读毛主席语录第十五页第一段，“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读完这两段毛泽东语录后，朱成大声地对我说：“吴苑新，广大革命师生强烈要求和你开一个辩论会，你也可以发言，但是态度要老实，不许和群众对抗。现在你开始交代你自己的问题。”

我一言不发，静静站在那里。南开大学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情景，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一次，当年右派分子站立的地方却轮到我了。

朱成又说：“你说话呀！”

我问：“说什么？”

他说：“交代你自己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我回答道。

这时突然有人带头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连续地喊叫一阵子口号后，会场又是一片静寂。我仍然静静地站在那里。

党总支王书记说：“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然后他继续说道：“吴苑新，今天是大家和你进行的辩论会，你要老老实实向群众交代你的问题和罪行。你一定会想，你们那么多人，我一个人怎么能够辩论过你们。你不要

那么想。你只要老老实实，群众是通情达理的。”

我说：“你们要我說什麼嘛，辩论的题目是什麼嘛？”

大家发笑。会场上又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朱成反复念刚才读的毛主席语录后，接着说：“现在吴苑新自己不肯坦白交代，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大家开始揭发吧。”

许多人举手要发言。我已明白这是一个早已有计划的预谋，我的内心变得很沉静，继续静静地站在那里……

发言人首先念读毛泽东语录，他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吴苑新，你别看他像个人样，他还站在人民讲台上来培养我们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其实，他是一个对党对人民充满着刻骨仇恨的坏蛋。”

我说：“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他立刻高声地喊了起来：“好，你要证据。老实告诉你，没有掌握你的大量罪证，群众也不会要求开这个会。现在我问你，腊梅赞这首反动诗，是不是你写的？你为什么不敢回答！”

我说：“诗是我写的，但不是反动诗。”

立刻有人带头呼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吴苑新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等人声稍静下来后，我问：“你们这叫辩论会吗？”

朱成说：“怎么不是辩论会？我们也让你说话呀。现在

你就交代你的反动诗吧。你是怎样诬蔑社会主义，怎样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社会主义的？”

我说：“腊梅赞是一首好诗，不是反动诗……”

朱成打断我的话，说道：“现在我们不许他继续放毒。大家继续发言，揭发批判！”

会场上又响起了持久的口号声：“不许吴苑新继续放毒！”“吴苑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新的发言人声色俱厉地大声喊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吴苑新极其反动的腊梅赞，是把我们的伟大的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都热爱的，无比温暖的新社会诬蔑为冻土！是一片黑暗。而他自己却是生长在冻土上的一枝腊梅花，整天在那里‘渴饮霜露’，真他妈的反动透顶。这是脱了裤子打老虎，此话怎讲？就是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全场哄堂大笑。

他得意地继续发言：“我问你！吴苑新！你他妈的臭不要脸，你算个什么‘辣霉’？我看你像个‘倒霉’，你连个狗屁也不如！你来说说，人人热爱的新社会，怎么是冻土？你说哇！”

一些人在喊：“叫他说！叫他说！”

发言人接着说：“你他妈的怎么连个屁也不敢放了？”

我没有说话。

他继续说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

们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剥削阶级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作梦也在想复辟，老实告诉你，这是痴心妄想，你休想他妈的什么‘冬去春来’！吴苑新，你他妈的好好给我听着，社会主义永远是春天。”

接着口号声大作：“社会主义永远是春天！”“不许阶级敌人诬蔑社会主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朱成问道：“吴苑新，你不要他妈的站在那里撇着嘴不服气。你说你是怎样写腊梅赞这首反动诗的？你还想为你的反动诗的罪行辩解吗？你说！”

“你真允许我说话吗？”我问道。

他说：“我们让你回答革命群众提出的问题，但不许你继续放毒！”

我说：“《王若飞同志在狱中》这本书你读过吗？”

立刻有人大声喊道：“他说些什么呀！现在是叫你交代，不是要你来考我们的学问，你以为你还是在讲课吗？”

口号声又起：“吴苑新必须交代罪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口号声停下来后，我说：“腊梅赞是《王若飞同志在狱中》一书读后感。”全场沉静片刻，口号声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许狡猾抵赖！”……

不断响起的口号声，使我根本无法说话。

朱成说：“吴苑新，今天你态度很不老实，你与群众运动对抗，这绝对没有好下场。现在大家继续揭发批判。”

立刻又有人要发言，照例是先念毛主席语录，然后说道：“吴苑新，你反动透顶。过去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好人。看你那个小样，还在你的反动诗里，什么，什么‘遮股舔’中，天天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的罪行，白纸黑字，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说到这里大概是忘记了词儿吧，停顿了一会儿，拿出了发言稿继续念道：“‘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他（用手指着我）就是这样的敌人。”

我说：“你们既然已经定了我是敌人，又何必说这是一个辩论会，和敌人还开什么辩论会，这明明是个批斗会嘛。”

朱成说：“这样久你到底说了一句对话。我们还没有定你是阶级敌人。这就要看你交代问题的态度，向群众认罪的态度了。”

这时突然有人带头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朱成抬头看了看带领呼口号的人，接着继续说道：“吴苑新，你的反动诗很多，你已经犯下了严重罪行，想抵赖是没有出路的。但是，只要你低头认罪，老实交代，群众会给你一条出路。我们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说：“我能说话吗？”

他说：“可以，但不许放毒。”

我说：“既然你们说《腊梅赞》是反动诗，那么是谁出版的？”

站在旁边的人一时没摸清头脑，他说：“‘出版’？谁出版了？”

站在朱成旁边的甘月新立刻接过话头，大声地喊道：“放毒！他在放毒！他说大字报是出版。”

全场哄笑！有人喊道：“你真混，那是揭发！”

我说：“既然是反动诗，把它张贴出来，就是放毒。”

口号声又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不许吴苑新反攻倒算！”

有人大声喊：“我揭发，我揭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吴苑新和他在美帝国主义那里的哥哥经常勾搭，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还无耻地诬蔑我们是‘一夜青山老，人间有路不相通。’这句话你是说对了。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待你们这些人，我们就是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对于你和你帝国主义的哥哥，我们就是有路不许你们通。”

他拿出了发言稿继续念道：“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紧接着就是一片连续地呼喊口号。

李林新要求发言，他在念完一长串毛泽东语录后说道：“吴苑新，你不承认你写的诗是反动诗。我问你，你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这又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反动透顶？”

我睁大了眼睛，说道：“什么时候我写过这句话？我没写过。”

李林新说：“你自己写的字，想赖？赖不掉的。”

会场内口号声大作，批斗会进入了高潮。

我更沉静了。我想：“‘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好熟悉的句子。这是什么书上的？……”突然，我想起了。

我说：“那是《红楼梦》上的原句，这有什么罪？”

李林新说：“《红楼梦》，什么红楼梦？你不学习毛主席著作，看这些封、资、修的东西！还说没罪？”

接着有人大声喊要揭发。念完毛泽东语录后，他无中生有地瞎编道：“吴苑新不仅仅是写下了大量反动诗。他还在后山教工一宿舍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小三家村’。把后山教职工一宿舍变成‘黑色航空母舰’，组织‘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在墙壁上挂什么于谦的诗，一些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玩意儿，就是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还写什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志’呀‘远’的，就是个人主义向上爬，想出人头地，想走修正主义道路。他还诬蔑党的领导人偷抄诗词。他还偷听敌台！”

一时群众大哗。口号声长时间不断。有人大声喊道：“叫他规规矩矩的站好。”

有人喊：“不许他乱说乱动！”

“低头！低头！叫他把狗头低下来！”

朱成接着说：“吴苑新，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在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吧，顽抗是没有好处的。”

我说：“我不想和你们辩论了，你们瞎编。这叫做辩论会吗？”

人群中发出笑声，有人说，你不想就不辩论了吗？你好自由！群众从领导干部的态度明白是要把我划成阶级敌人，就更加乱编些问题来问。

有人大声喊：“叫他交代偷听敌台的问题！叫他说，叫他说！”

我说：“偷听什么敌台，我买不起收音机，我根本就没有收音机。”

又有人喊：“叫他交代诬蔑党的领导人的问题。这小子还想抵赖。太不老实了。”

但是他们并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有人立刻叫喊：“吴苑新老实不老实？”

众人一起回答：“不老实！”

“我们怎么办？”

大家同声回答：“叫他灭亡！”

甘月新大声喊道：“我揭发，我揭发。”念完毛主席语录后他说：“吴苑新在参加社教时，看见甘西河就想偷越国境，这小子游泳游得好。”

我说：“偷越国境到哪里去？”

“到苏修（苏联修正主义）那里去吧，又从苏修去美

国。”他答道。

我说：“甘西河过去是苏联吗？”

他哑口无言。霎时间口号声又大作，“不许狡猾抵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又有人揭发，照例先念毛泽东语录，然后说道：“吴苑新在后山教职工一舍作对联，鼓吹走白专道路，鼓吹深夜攻读，就是不读毛主席的书，还要气吞山河，想要搞垮社会主义，用心极毒。”

又是口号声连续不断……

朱成站起身来大声地说：“吴苑新今天很不老实，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事。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吴苑新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拒绝接受群众对他的挽救，这是他自取灭亡！”

就这样呼口号，夹杂揭发、批判、谩骂、嘲笑不断地交替进行了5个多小时。大约快要到吃饭的时间了吧，他们不得不收场了。我已站得两腿发麻，头也开始晕眩。最后，王书记终于站了起来，念了一通毛泽东语录后，他说：“红卫兵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吴苑新的态度很不老实。他顽固地对抗群众运动，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

没想到后来他自己也没逃脱这场政治运动的劫难，这是

后话。这种人也真可怜，除了“整人”二字外，恐怕在他的葫芦中就没有别的灵符了。

我继续听他还要说些什么。他说道：“吴苑新，今天大家挽救你，揭发了你的许多罪行。证据确凿，其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回去后好好思考，写交代材料。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现在把他带出会场！”

于是，就这样的，在一片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被四名学生押出了会场。在这个会场上，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政治运动带给人们的危害。一些人在政治运动中为了表现进步，他们见风使舵，谎话连篇，甚至不惜诬蔑陷害别人，导致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这岂不是对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的尖锐讽刺吗？

这时“文化大革命”才刚开始，高等学校自是首当其冲。一个更大的，更加残酷的斗争，正在酝酿着，即将全面展开。

第四章 “阶级斗争新动向”

从这所谓的“辩论会”会场出来后，几位学生并不远“送”，因为开饭的时间到了。我独自一人慢慢地向着教工二舍走去，快到教工二舍遇见其他系的老师，他们依然向我点头打招呼，偶然回头，看见赵江在不远处跟着我，显然是在盯梢。我独自回到寝室，这间几天前还是我的新婚洞房的小屋。进得屋来，我疲倦地坐在床边。赵江拿着碗到楼下食堂买饭去了。我不想吃饭，只觉得口渴。但又不想站起来去弄点水喝。桌上的书籍零乱不堪。同室的朱成和赵江都不愿回到屋里，因为难于对付那相对无言的难堪局面。我把零乱的被褥推在一旁，斜靠在床上，头晕晕的像有点发烧一样，我慢慢地抬起头来，突然看见桌上有一封信，拿起来一看，是从天津寄来的。不知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还替我从系办公室信箱中，把信给

我带了回来，放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急忙拆开，一行行秀丽的字迹印入了我的眼帘。

五哥：

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你在做什么呢？在想我，是吗？我们分手已经10多天了，你一切都好吧。一切都平安如意，是吗？

五哥，离开你后，我更感觉到我是多么地想念你，我是多么地爱你。我真后悔，临走前没有把你的衣服叠好，衬衣上掉了的那颗纽扣，因为找不到扣子，也没替你缝上。你去食堂打饭回来，没有我坐在你的身旁，你一定很想念我，是吗？你寂寞吗？五哥，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吃好饭，睡好觉。有小文妹与你同在，你永远也不会孤独的。

我回来后被分配到了海河工地医疗队，现在我正在工棚中给你写信。你给我的闹钟就在我的枕旁，你听，滴答、滴答……海风吹过芦苇，从工棚的窄缝中灌进来，发出吱吱的声音。四周是一片静寂，此时若你在我身旁，这儿就会从寂寞一变而为一派海滨风光的美丽晚霞。

现在你也正在给我写信，是吧？你想听我唱歌儿吗？好吧，你听，“……含泪送郎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今宵良辰心已醉，袅袅彩云动。别了，此去关山万里，展翅驭长风，眼下虽别，来日方长，愿君多保重。今宵良辰呀，亲吻别离，但愿早日相逢！”

这里随信寄张照片给你。看见她，就是小文妹
在你身旁。

五哥，我吻你。

你的小文妹

7月10日

我一连读了三遍，天色已晚。我想：对，要吃饭，不然怎能战胜眼前的艰难。于是，我拿起碗，快步走到楼下食堂，炊事员已打烊，看见我来了又回到卖饭窗口，并无任何怨言。我买一角五分钱的菜，但炊事员同志却在菜缸中，尽可能地挑选他能找到的好菜和夹杂在菜中的小肉块儿。我拿着饭菜回到三楼寝室，人们大概开会去了吧，只有赵江还在寝室里，他不时推门看看，分明是在监视我。

我一边吃，又一边把信拿出来看。这秀丽的字迹，温存的语言，带给了我力量。我下意识地觉得，我应当像个男子汉，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了困难，自己应当承担，克服。否则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如何担当起自己的家庭重任？我应当面对现实，吃好饭，睡好觉，迎接风雨。

这些诬蔑，明显的是一场阴谋，绝不能屈服于这卑鄙诬陷的谎言。“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是的，“天地有正气！”谎言陷害不能屈服，我鼓励自己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定要镇静、冷静地处理一切。当年我的弟弟被定成右派分子后下乡劳动改造，备尝艰辛。他总对我讲“咬紧牙关尝世味，迈开脚步走风尘”这句话，大概这个滋味今天该轮到我来品尝了。

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睡梦中小文妹和我一同来到一块幽静的岸滩，许多野蔷薇，牵牛花和紫萝兰在风前点头，还在吐露芬芳，蜂蝶翩翩，小鸟歌唱……一觉醒来已是清晨。我想：梦境多美好，却不知今天又会有什么新的烦恼？

早饭后按规定带着纸笔，来到那间指定的“学习”室。老教授们先后来到了，各自默默无言地依次坐在课桌前面写“坦白交代材料”，而学生——红卫兵小将则叼着烟卷，反背着手在教室内踱着方步，监视着这批所谓的该死的老家伙。

我以难以挥去的烦恼看着眼前的一切，也被迫拿着笔来写什么“交代”，从而用以争取所谓的“坦白从宽”！可我交代什么呢？说《腊梅赞》确实是一首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反动诗？说我的确是里通外国，勾结美帝国主义，还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说我确实是偷听敌台，并在后山教职工一宿舍组织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什么小三家村？

这简直是荒谬绝伦！我手里拿着笔……两小时过去了，铺在桌上的却仍然是一张白纸！

两位红卫兵小将走过来，对我声色俱厉地说道：“这么久一个字还没写，昨天批斗会叫你思考自己的问题，你回去却睡大觉。”

我说：“考题太难，答不上。”

两位红卫兵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位说道：“学习毛主席

著作，对照检查自己。”

他的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就拿出了毛主席语录，并抄写其中的段落，什么交代材料也没写出来。

第二天下午，我被带到综合楼阶梯教室，开一个更大规模的批斗会，走到教室门口，看见牧医系系副主任孙光文低头站在教室外，我被叫去和他站在一起等候。因为学生还没有到齐，教室内啦啦队此起彼落，学生们正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兴奋地唱道：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另外一队学生排着队，唱着“文革”初期极其流行的歌曲《鬼见愁》走了过来，他们洋洋得意地唱着：

“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干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接着就不是唱，而是有节奏地叫喊：滚！滚！滚！滚你妈的蛋！造！造！造！造他娘的反！一二三——四！

然后又轮番再唱，再喊……

这是“文革”初期极为流行的歌曲，出身好的学生极其得意。但是，这首歌暗藏杀机，此时农学院中众多的听从党委调遣的学生，在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的形势下，已开始有造反的萌芽，但目前还是按部就班在院、系两级党组织领导安排下贴大字报，批斗教授、讲师以及他们早已选定的所谓的“坏人”。

孙光文和我大约等了 20 多分钟才被押进会场，勒令低

头站在讲台上，就是这个讲台，4年前我曾在此为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的300多名学生主讲动物生物化学。

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会。内容是以批判孙光文教授为主，我只是被抓来陪场，大概是因为写不出交代材料的缘故吧，发言的内容全是胡编瞎扯。诸如什么揭发他如何利用系主任的职位阴谋反党反社会主义，强令交代如何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东德（当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当上了农业部部长，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我学院作的一件坏事，因为东德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国家。而孙为什么还为培养修正主义人才叫好？强迫孙光文交代他是如何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鸣冤叫屈，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强迫交代他是如何安排一大批汉奸、特务、历史反革命来占领教学第一线，为什么要把“小毒蛇”（给我贴的大字报标题，以后就成为我的代名词）安排为主讲？事实上孙是非党员系副主任，一切人事安排他根本无权，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系副主任而已，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已经下台。又揭发他在课堂上如何放毒等等。孙光文支支吾吾一个问题也答不上，因为都是些莫须有的栽赃污陷的话。

这个会名之曰“批斗会”，已不是叫做对我开的所谓的“辩论会”了。群情激昂，所以口号喊得更多，不断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坦白从宽”口号更为激烈，由领导安排的群众发言批判交替进行了几个小时。在强迫孙光文回答提出的问题而答不上来时，“革命小将”就三番五次走上来，重重地打几下，或用手把头用力地向下按，每次打他的同时，总会顺便对我也打几下。有一次两名“小将”打完孙光文

后，突然推了我一掌，我冷不防向后踉跄几步，一只脚踩滑讲台，一下子摔在地上。引得全场哄堂大笑，几个人走上来连打带推，又把我抓上讲台。

立刻有人带领呼喊口号：“不许吴苑新破坏批斗会！”

这时是“文革”初期，还比较“文明”，什么挂大牌，喷气式等刑罚还没流行，孙和我只是被强令低头站着，偶尔挨几下打而已，这已是很“文明”的了。

涉及到我的话题主要是勒令写“坦白交代”，否则将采取进一步革命行动。站的时间久了，背脊和颈部都疼痛不堪，真想立刻坐在地上。好不容易挨到会开完，我和孙教授分别由几个押着离开。孙教授和我互相看了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各自回家去了。我当时年青尚觉如此难挨，岁数大的孙教授所受到的折磨更可想而知了。

次日下午，我又被农业机械化系借去开批斗会，这大概是因为他们系内有几名归国华侨，杀鸡吓猴，批斗给他们看看，当然也是口号、语录、批判发言，慷慨激昂，没有我说话的余地。在这个批斗会上，有人向我提出，我诬蔑党的领导人，说我诬蔑中央领导人抄诗。

他大声地喊道：“你读《人民日报》看见上面刊载《赠越南友人》这首诗后，你是怎样造谣诬蔑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指的这一件事，真是小题大作。

我说：“是我说的。”

“你老老实实交待！”他说道。

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载‘我住江之头，你住江之

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

他问道：“你说什么来着？”显然，当时我说这话后，是被哪一位“争取进步”的积极分子向组织上汇报了。李林新每天就在收集这些无聊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工作”！这是很久以前说过的话，我早就忘记了。可是他们还记着，在今天又派上了用场！

我说：“这不是他的作品，这是宋词。”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口号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许诬蔑中央领导！”“打倒吴苑新！”

掌握会场的人说道：“你到底开始漏点缝，交代点问题了。你说说看，怎么会是宋词，这是不是诬蔑中央领导？你说！”

当时农学院的大学生，除了读点毛主席诗词外，中国古典诗词读得很少。当时，似乎只有毛主席的诗词才能读。而以往我中华数千年瑰丽文化，几乎都是有毒的东西。虽然在口头上也讲什么“继承”，而实际上所作所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年轻一代知道的古典文学，确实是少得可怜，这也算是“文化大革命”“革文化之命”的一个注脚吧。

掌握会场的人此时也许是出于好奇，他说：“你交代，说来听听，看你怎么蒙混过关！你能背出来？”

我说：“原词是‘君住江之头，依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

说到这里，掌握会场的人说：“好了，好了！不许放毒！”

会场哑然片刻。紧接着口号声大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许吴苑新狡猾抵赖！”

有人大声喊：“他刚才说‘此恨何时已’，叫他交代他恨谁？是不是恨新社会？恨党的领导？”

我脸上闪过一丝苦笑，立刻有人大叫：“他还在笑呢！叫他低头！这个死顽固。”

有人走过来，把我的头狠狠地向下按，会场上口号声连续不断，我却心地坦然。我高兴我有机会揭穿他们的谎言。

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学生四舍一楼，室内坐了许多和我一样被批斗的人。一名学生宣布，从明天起开始，除了继续写交代材料外，一律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个“劳动改造队”就是以后的“牛鬼队”的雏形。

第二天的劳动，由红卫兵小将分配，我们20多个人被指定去掏烟囱。农学院冬季的取暖设备，在当地也算得上一流，取暖锅炉都是烧煤，大型锅炉烧热水，通过埋于地下的管道，抽压到各教学楼的暖器设备中，热水还可通过地下管道回流。这样的大型锅炉有六七处，其烟囱高出五层楼房以外。据说高烟囱的炉子好烧，且可将不完全燃烧的浓厚煤烟排至高空。烟囱多年无人清除，这是当时能找到的最脏的工作。曾有一学生自杀失踪，就是在烟囱中找到的。这种肮脏和繁重的工作，说是更有利于对我们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建立起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高尚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感情。

我们是当时学院“保皇派”红卫兵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劳动改造队。这时人数不多，大概只有四五十名所谓的“劳改

分子”，多是各系的讲师、教授和行政干部。以后运动越来越“深入”，被整的人凡讲师以上，尤其是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几无一幸免地进入了这一队伍。

我们每天上午8时，在学生第四宿舍门前集合，当时（“文化大革命”初期）农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就设在这里。大家首先学习毛主席著作，敬祝万寿无疆。低头认罪仪式这时候还没有兴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的长短，视红卫兵来到的早晚或他们的高兴而定。他们对我们施行所谓的“仁政”，每人发了一双手套和一个小口罩。当我第一次从烟囱下的两道门走进，眼前一团漆黑，打开灯一看，惊得我目瞪口呆：周围一人多高的煤烟灰，只要轻轻一动便满层飞扬，窒息得你无法呼吸。整个室内弥漫着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等等有毒气体。当我憋着气快速装完一袋煤烟灰，把它拖出来时，我已目花头旋。所幸我们是实行几人轮流进去装袋，否则就不堪设想了。

当我第一个进去装袋出来时，站在外边由数名红卫兵小将看管着的“劳改分子”都笑了起来，红卫兵们也笑。轮到他们进去又出来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笑。原来出来的人，除了看见一对眼睛在转动外，浑身上下全是黑色的烟灰。这种工作学院后勤部工人们绝不会干的，这就用来整整你们这些教授先生们。口罩根本就不起作用，拉开口罩鼻口仍然全是黑的。我们就这样轮换工作约4个小时。到吃午饭时，我们只被允许快速地洗一洗，各自回去吃饭，很显然像我这样是无法去职工食堂买饭的。我只得回到寝室，从里到外把衣服全脱掉，换上干净的，也来不及好好洗一下，就急忙去买

饭，胡乱吃一点充饥，又立即回去继续劳动。由于晚上各系均有不同安排，诸如“学习会”、“批斗会”等等，所以4点钟就收工。我们被安排进入学生澡堂洗淋浴，然后回去吃饭。刚到寝室门口，就听见赵江在高声叫骂，说我脏衣服堆着不洗，就是想毒害革命群众。但也有帮忙说话的，有人对赵江说：“你没看看别人在干什么样的活吗？”

这一切我只有充耳不闻，忙着去洗脏衣服。因为我的衣服不多，不洗很快就没有衣服穿了。

第二天我们又被施行“仁政”，每人发一套旧的工作服，这大概是学院后勤工人可怜这批老人建议这么作的，再说总务科长也在我们之中呢。如此，我们可将全身衣服脱光只穿一条内裤，换上工作服去掏煤烟灰。如今回想起来若没有这套工作服我还没有衣服换呢。

清理烟灰的工作持续了10多天，学院的烟囱全部清理结束。在这所谓的劳动改造过程中，晚上若没有批斗会，也得集中起来“学习”，念读报纸。报纸连续登载不少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编写的《燕山夜话》，一天念读了邓拓的一首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朝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

我在想：“我有，我有不平事！眼下所见一切都是不平

事!”

这些天我连续不断地收到小文妹的来信，我也抓紧可能有的时间给她写信。读她的来信和给她写信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常常独自一人拿着来信反复阅读，每当独自一人的时候，就是我美好的时刻。

在掏烟灰的劳动结束后，被揪斗后送来劳动改造的人更多了，就正式成立了“专政队”。

这时候在专政队中的人已很多，有小麦锈病专家章嘉仁、水稻专家李伟、蚕学专家金蜀斌、留美归国教师袁骏、土壤化学教师余心德、兽医张雨英、药理学教师李玉铃、图书馆馆员苏至清、基本建设处侯世杰……我们这些人受管于不同专政组。但劳动改造和“学习”有时合有时分，依据红卫兵管理之方便而定。

还是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学院党组织就对我们进行教育，说是农学院中严重地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最有名的例证就是小麦锈病专家章嘉仁，现在已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事实上他早就被批判为白专典型。章嘉仁是留学加拿大归国，在小麦锈病的研究上颇有声望。国家为其研究项目拨给的经费较多，故而研究室建得较有规模，设备较现代化。其温室可制作人工气候。玻璃房顶透出的日光灯光，入夜光亮辉映，故而被讥讽为“水晶宫”。他们批判说这是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章嘉仁带领的研究班

子，培养的研究生维持着研究项目 24 小时不停地进行。这本是可喜现象，是国家兴旺发达之基础，是一个正规大学办学的一条可取之途。不幸的是这位学者长期以来就是一边进行着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一边却要接受批判。说他走白专道路，说什么他在培养“白小麦”，其意思即是反动的白专道路。有个别学生羡慕章嘉仁的科学生涯，因而就在学院中流传了一条顺口溜，叫做“生平无大志，愿作章家子。”这还了得！这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和党争夺无产阶级接班人。长此以往，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

白专道路的对立面是红色专家。3 年前在学院中即树立起了另一个又红又专的典型卫定新。他是研究高粱的，说什么红高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方向。在讨论会上还说什么小麦是资产阶级吃的粮食，而高粱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吃的粮食。这更加证明前者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后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在当时畜牧兽医系的热烈讨论会中，不断批判学院后山养猪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说什么该猪舍的建筑，房顶是美帝式的，地面是苏修式的。关山木在会上的发言振振有辞，说是：“中国的养猪业应该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道路，应该是一个贫农老大娘，端一个小猪盆，拿一把小木勺来养猪，才是无产阶级养猪业的正确道路。农学院的猪圈连猪想拱地都拱不动（种猪产房是水泥地），猪也变成资产阶级老爷了。”把养猪学教授毛立广批得灰溜溜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关山木又发表他的“革命理论”：“文化大革命是解决

农学院长期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毛主席无比伟大，英明，正确。”

我们每天上午8时在学生第四宿舍或图书馆门前集合。由红卫兵监督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又称红宝书。林彪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开始登载毛泽东语录，到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解放军报》刊载过的语录加以补充编纂而成。此书为红色书皮，正面印有身着军装的彩色毛泽东头像，其下印有金黄色“最高指示”四个字。此书长10.5厘米，宽7.5厘米，厚1.2厘米，不及手掌大小。内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毛主席语录，均是从毛主席著作上摘录而来。归纳为：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政治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三大民主；教育和训练；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调查研究；纠正错误思想；团结；纪律；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员；干部；青年；妇女；文化艺术；学习共33类，427条语录。第二部分是毛主席的五篇著作。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等五篇文章。第三部分是毛主席诗词共有34首。

学习红宝书，这是看你是否接受改造的第一表现，“学习”时间的长短依情况而定。此书每人必须随身携带，劳动间隙，吃饭前后，开会期间都必须学习，也就是这本小红

书，使所有的教授、讲师、整个知识阶层乃至全国人民学习了10年，并且是永远学不完，永远理解不够的红宝书。

学完毛主席语录后即由红卫兵分配劳动地点。这是根据农场等附属单位事先报来需要的人数而定。到达劳动地点后，由工人来指导干活。但多数工人都不愿意来“指导”老师们干活。因为工人或实验员都是各位老师多年训练培养起来的，所以他们总是把要干的活告诉红卫兵小将，然后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监督着这批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教授、专家、讲师、技术权威和一些行政干部，去进行与他们年龄和专业均不相称的劳动，以改造他们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重新作人。

此时正是养蚕季节。我和一些人被分配到后山桑树林收桑叶。李玉铃是蚕学专家，已七十高龄，是所谓“四体不勤”脱离劳动的反动学者。每天批判他，说他是蚕学专家，但采桑叶还不如一个养蚕工人。

据说，那时中国一位著名分子生物学家在北京被强令扫厕所。

他说：“他们是舍我之长，用我之短。”此话确实不假。

我们这些人都是按照舍弃专业之长，而用其短的方式进行所谓劳动改造的。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江青领导下，三令五申“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在这所谓的“专政队”中，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于是，红卫兵小将就在我们之中抓起“阶级斗争新动向”来了。

有一天，我们被命令去桑林。林木很深，我们埋头钻进一片林间空地，正好看见红卫兵拿着木棍在打林学系的教授余心德。余老师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位红卫兵你一棍我一棍向他背上和腿上乱打。

他俩看见我们后停住了，问道：“你们到这儿干什么？”

“摘桑叶。”

“为什么到这儿来？”

“摘那边的一块地，”我回答道。

其中一位红卫兵对余心德喊道：“余心德，你跟他们一道去。”

于是，余老师就一声不响，一瘸一跛地跟着我们走了。我们的出现使他少挨了些打。红卫兵之所以打他，据说是嫌他干活太慢。面对这种打人现象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也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异议！

我们每天都由红卫兵小将监督学习毛主席语录。一天早晨红卫兵小将以急迫的口气命令余心德领着大家朗读毛主席语录。余心德眼睛近视，动作慢。红卫兵小将不停地在一旁催促快，快，快！他人老眼花，手脚迟钝，哆哆嗦嗦拿出语录。急忙中顺手一翻，然后眼睛几乎快贴到书上了，念道：“大家翻到第一百七十页，第二段，大家齐声朗读，‘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接着，红卫兵又指定另外的人领读语录，就这样念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排着队去劳动，这是每天必做的常规仪式。

没有那么轻松的！以后就是要求背诵了，不会背诵的就

要挨打。这是后话。

当天晚上全体“劳改分子”集合，照例先是小将带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然后红卫兵大声宣布，在专政队中有人兴风作浪，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煽动专政队里的人团结起来反抗运动。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这阶级斗争新动向又会抓到谁的头上。说时迟那时快，两名红卫兵走过来把余心德抓了出来，强令他站在众人面前。

低头！交代你的反动思想！

余老教授咿咿唔唔说不出话来，一位红卫兵上来就是一记耳光，眼镜都被打得挂在一旁。此时，平常待人温和可亲的余教授面色苍白，两眼圆瞪，手脚哆嗦，不知所措。

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就理直气壮地开始了揭发。这时我才弄清楚原来是为今天早晨领读毛主席语录的事。

几番对话后，进入了问题的“实质”。

“为什么带领被专政的人学习毛主席语录要念‘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一条语录？”

余答：“我没有什么意思，因为革命小将叫我快，我一翻就翻到了170页。”

“好，就算你是顺手一翻就翻到了170页。为什么别的几条你不念，偏要念这一条？”

余答：“因为革命小将叫快、快、快，我看这一条语录短，所以就念了这一条。”

红卫兵大怒，在他头上狠狠地打了几下。

“混蛋！真是他妈的胡说八道！学习毛主席语录是要

‘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急用先学’，这是林彪副统帅教导我们的，怎么可以看哪一条短就学哪一条。明明你是心怀鬼胎，还想狡辩！”

余教授再三想解释、说明。但是，在这种情形下，只有越说越不明，大家眼看着发生的一切。我的心中真是欲笑无力，欲哭无泪。白天已经劳动了一天，可这会一开又是几个小时。

……余心德被勒令写出检查交代，明天一早交卷。

第二天一早集合劳动，学完毛主席语录后，余心德就被带走，交革命群众批判，因为在专政队中火力不够猛烈。

红卫兵的专政队，想来必定是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红卫兵就有责任把阶级斗争扎扎实实地抓起来。怎么个抓法呢？那就是察言观色，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要提高到毛主席教导的理论上来分析认识，必然都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进行着。对被专政的人要实行阶级分化，发动他们互相揭发，所以，在这劳动改造队中，不但有红卫兵小将每天用显微镜和放大镜来观察，也要被专政的人互相揭发批判。生活在这个专政队中，真是“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早晨不知中午会发生什么事，中午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可真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幼年不知诗的含意，认为人生哪会有像《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形容的这样严酷的日子。但如今我所经历的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每天去后山柞树林收集蚕茧。说实在的，这是一个愉快的劳动，若真像电影中那样一面劳动一面唱着山歌，那

就太美了。可惜我们过的不是那样的生活。柞树上有一种蠕行动物小虫子有保护色，其颜色随柞叶的颜色而变，很难一下子看清楚。此虫遍身布满绒毛，毛端有一种毒性很大的分泌物。不小心碰到皮肤上，就会立即红肿。这是属于蠕行动物门的一种小虫，俗称“洋刺子”。这一天我在柞树林中已碰到手背上一次，红肿而且疼痛。

在我一旁劳动的毛教授对我说：“要小心哇，碰上可疼了。”

我说：“这种虫子可能是分泌一种酸性毒物，对皮肤的刺激性很大。”

当天晚上，在例行的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后，联系实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被指名站出来交代今天犯的新罪行。我不明白自己有什么事做错了，当然也坦白交代不出自己的新罪行。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揭发，批判，其实都是在胡搅蛮缠，只要他们想得到，就编得出来。例如说我表面上是在劳动，心里却在盘算策划动员大家起来反抗红卫兵，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我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念毛主席语录，甚至小小的“触及皮肉”。当时称改造思想为“触及灵魂”，动用武力打人为“触及皮肉”。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说我今天劳动时说“洋刺子”是暗指红卫兵，是对红卫兵小将进行攻击。这种“莫须有”的罪名真是叫人啼笑皆非。可这确实是当时随时随地被莫名其妙的“上纲上线”，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内容。

说了个“洋刺子”，就是阶级斗争！

这是个什么阶级斗争呢？

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学说确实曾动员了千百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奠定了这场革命胜利的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谓的“阶级斗争”已根本不是什么“一抓就灵”，而是一抓社会就不得安宁，人们不得安生。

就在这1966年8月份的一天，整个学院掀起了一个迎接红宝书的高潮。毛主席著作几乎早已是人人都有书，但却又在学院内各个单位掀起登记购书新高潮。谁会不登记呢！只得又登记再购置一套。这一天大清早全院师生员工在大操场紧急集合，组成啦啦队，迎接红宝书，大家唱革命歌曲，呼喊革命口号，一直折腾等到中午，红宝书仍然姗姗来迟。电话催问了若干次，送红宝书的彩车队仍然不见踪影。

这一天太阳很大，中午时分农学系有一名女学生晕倒，抬到学院卫生所去了。人人都站得很累。

迎接红宝书，谁敢离开！

这时站在我一旁的孙教授轻声对我说：“小吴，买书嘛，大家都累了，何必一定要这样等。”

我说：“造声势嘛。”我立刻意识到会出问题，便说：“不要说话。”

这是一个壁有眼，墙有耳的环境，这样小声说话仍然被人听见了。

到这时，批斗会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对于我们这些被揪出来的人早已不是什么希奇事了。在晚上的一个批斗会

上，革命小将紧紧追问我和孙教授在迎接红宝书时的言论。

孙教授无论怎么威逼，他只承认他说过等累了，坚决否认他听见我说过什么话。

他说：“锣鼓声那样大，我根本就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话。”

我看见他被逼得可怜，于是我说：“我是说话了，但是他没听见。”

众人一哄而上追问我说什么。

我灵机一动，说：“迎接红宝书是造声势，造革命声势，这有什么不对？”

没有人敢说“造革命声势”不对。虽然继续喊了一阵子口号，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这个运动中，每个人都在自我表现。牧医系的教师中最为作威作福的人，就是家畜解剖学助教刘铭。运动一开始，他就处处表现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抓人，打人，斗争会到处都少不了他。

但是，一派独霸天下的局面好景不长。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三位教师朱为政、苏伟、孙大洪和一小部分学生起来造党委的反，墙壁上挂起了巨大的横幅。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他们在1966年8月25日成立了第二总部，取名“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他们的矛头直指党委。他们的言论若在1957年肯定是右派分子无疑。所以也难怪原来的红卫兵（简称“第一总部”），就把他们的言行作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来收集。

于是，农学院中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第五章 造反派的兴起

1959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讲真话而被罢官，到1965年11月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10日，《解放军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后，全国各报转载，以批判《三家村》作为对北京市委政治斗争的突破口。所谓《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都是采取无限上纲，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手法。这就给全国作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开端的样板。

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

知》。也就是在5月16日毛主席还发出了最新指示，直指“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进一步号召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

在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讲话”、“社论”的引导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市带头作用的推动下，就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我所在的农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在步骤上较之北京要晚一些，但其情形则大体相似。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是在院、系两级党组织领导下，对教授、专家、讲师以及他们抛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如法炮制，学批《三家村》的手法，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恶劣手段，整了一大批人，而且引导学生不断地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这时的红卫兵组织是由各学校工作组组建的，参加红卫兵的都是所谓“根正苗红”，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的人，所以他们在工作组领导下参加运动，成为以后所谓的“保皇派”。“保皇派”一词，大概来源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该文把坚决保护被揪斗的干部的群众组织称之为“保皇派”，许多人被打成“铁杆老保”、“钢杆保皇派”，而受到冲击迫

害。不过，农学院有的老保可没这么“铁”这么“钢”，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一旦感觉到自己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偏差，便大义凛然地“反戈一击有功”了，成为时髦的造反派。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北京的学生在党报的煽动下，在北京大学的影响下，北京各个大专院校纷纷掀起了揪斗党委领导的热潮。此时，毛主席不在北京，交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袭用以往办法派工作组，从6月5日起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各高等学校都驻进了工作组。工作组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八条指示”进行工作的。一时之间北京市的高等学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下令撤销刘少奇主持中央时派出的工作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继续在学生中活动，制造与刘少奇更加严重的对立。北京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浪潮。

1966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

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北京形势急剧发展的影响下，学院党委大概是感到仅仅抛一些教授、讲师还不能满足运动的发展，于是就抛出了以老院长为首的原党委来进行批判，召开全院大会揪出老院长站在台上，强令他交代反党黑心。未料到就在这个会上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朱为政站了出来质问：这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反对现任党委的作法。

1966年8月25日，农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简称造反派）成立。于是，以朱为政为首的占人数极少的造反派，就和党委领导下的占全学院大多数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保皇派）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在畜牧兽医系中保皇派势力极大，当时参加造反派的只有一个人，是一名教学辅助人员，名叫曾加礼。过了几天才有另一名教寄生虫学的助教吕中义参加。

前些时，这些在党委和党总支领导下的保皇派，整理了大量我们这些被他们抛出来的人的材料，在造反派起来后，这时候他们就把大部分精力转而对准了造反派，说他们是把

矛头指向党的反党分子，说他们的言论都是右派言论，因此收集这些新右派的言论并存作档案。诸如，党委不是搞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委想在运动中蒙混过关等等。

在畜牧兽医系（别的系也一样），这是长期使用的手法，如我在看《红楼梦》时抄下的对联，看报时说过的一句话，都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收集进了档案，成了今日整我的材料，也许这还只是一种“准档案材料”，要经过运动才能落实，但至少它已是对一个人的疑点，前些时对我开的所谓“辩论会”，对孙光文教授开的所谓“批斗会”，在会上狂呼乱叫，批判斗争的依据，当然就是来自这种手法取得的材料。

当造反派初露苗头时，这些保皇派就收集、整理了他们的大量“右派言论”。当时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认为：“在野的右派感到气候已经适合”。“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兴风作浪，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现在出现了假左派、真右派和我们激烈地争夺领导权。”

农学院此时也正是按照这一思路来抓一小撮“新右派分子”的。当时造反派初露苗头，人数不多，但从北京不断传来的消息，大大地鼓舞着他们的士气。于是，造反派贴出大字报，勒令保皇派交出整人的“黑材料”。但是，他们不但不交出来，反而越整越多，越整越黑。双方长期僵持不下。

这时一切宣传器材，如广播站，高音喇叭等，都在保皇派手中。宣传上的劣势，更加激怒了造反派，于是，造反派到处搜查“黑材料”。黑材料包括他们开会时的发言记录和

贴出过的大字报等等。

就拿畜牧兽医系来说吧，陈志方、关山木、王佳真都是保黑材料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些人多年来都是畜牧兽医系中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普通群众都是看他们的眼神行事，大小会议上，都是他们说上句群众说下句。在今天这个抓“新右派”的紧急关头，保护他们收集到的“重要材料”不致失落，就成了这些人当前的头等重要大事。他们想来想去就把赵江选中了。此人一贯听领导的话，如今在这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势下，赵江认为正是党考验自己的时候到了。所以，凡交到他手中的一切报纸，他都精心保管，或放在书包中经常背着，或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或藏匿在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因为赵江平常不爱说话，所以别人不会想到藏黑材料的人会是他。

赵江接受了保卫“重要材料”的任务后，真是兢兢业业完成得很好。由于他这次表现好，过去也一贯听话，而今又“立场坚定”，因而就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火线入党”发展为新党员。

但是，造反派从北京高等院校运动的发展，感觉到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多的支持的迹象。例如聂元梓的大字报直指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却立刻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浪潮。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给予了他们振奋人心的鼓舞。

农学院此时造反派人少，无法找到黑材料。10月25日他们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抢了人事科档案室，意图找到“黑材料”。档

案室是人事部门的重要保密机构。于是，保皇派把教师朱为政和其他一些重要造反派头头，作为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并押着他们一同去北京告状。一路上保皇派人多势大，到达北京后贴出了大量标语制造舆论，宣扬他们自己的路线正确。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双方代表。接见后中央文革小组给朱为政等造反派买了返回的飞机票，而对保皇派却不闻不问。回到学院后由于造反派“路线斗争正确”，声威大振。大量学生纷纷反戈，造反派二总部势力大增。于是，两派争夺广播器材就激烈地展开了。一总部一直独占全部器材，将高音喇叭安装在房顶和树梢，造反派就在一夜之间，爬到高处将喇叭后面的装置全部卸走。第二天一总部广播无声，就贴出了“捉拿偷喇叭屁股贼人”的大字报。两派互相攻击的大字报战就进入了高潮。

一总部反戈的人日益增多，二总部的势力渐渐强大。在用大字报作战期间，互相攻击，胡乱上纲，怪事百出，不胜枚举。例如，造反派写大字报，画了一幅象棋图，棋上写了一个“帅”字，但棋盘上只有寥寥的几个其它棋子，因一总部的人正纷纷反戈申请加入二总部成为造反派红卫兵，想用此图来说明一总部是一个空“帅”，不如早些垮台。

大字报挂在外面，第二天下起雨来，不久天气转晴，但毛笔写的字均因雨水浸盈而字边发毛。于是，一总部就大抓写大字报的现行反革命，说“帅”字边发毛，是暗指毛主席，是说的“毛帅”，真是振振有词煞有其事，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又如有人用废旧报纸写大字报，“打倒刘少

奇”，但这个“倒”字的立刀字旁举起来对着光看，正好对着报纸反面的毛主席头像。这又是抓现行反革命的铁的证据。抓现行反革命的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高音喇叭喊得震耳欲聋。我看见有一个高音喇叭安装在老院长卧室的窗前。一个老人怎经得起这样的折磨！

不久学院里刮起了跳“忠字舞”的旋风。最为普遍的是跳“敬爱的毛主席”。其歌词是：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向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一寿一无一疆！”

跳此舞时要面带幸福微笑，心中要向往着美好的、伟大的时刻。跳时动作要轻松自然，右手在前，左手在后，手心向上，右手比头部略高向着天空配合着右脚有节奏地轻捷地踏步，两手同时向着天空有节奏地来回伸缩；毛主席就是天空上的温暖的太阳，他正慈祥地照耀着我们。一边跳一边唱，跳到“我们心中”时，两手收回，幸福地放在胸前，跳到“贴心的话儿”时，两手又送向天空，作热爱状，跳到最后“万寿无疆”时，全身作360度幸福的旋转动作，两手从天空向下画一个大弧形，然后两腿前后作弓箭步，信心十足，头部微仰，眼睛看手比划的动作的前方，深情无比地唱“万寿无——疆”！“疆”字要唱得激昂，铿锵有力而信心十足。

这时，学院所在的整个城市，也都刮起了“忠字舞”旋

风。

“忠字舞”旋风最强劲是从1966年10月至1970年这段时间里。每日早晚，每一餐饭前，每一次开会前都要作“三忠于”活动；人们相见以往是问“您好”，表示互相招呼的意思，而现在见面，则是一方先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另一方立刻接着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去商店购物，站在柜台前先要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售货员就回答：“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才说我要买什么东西；接电话时也一样，以往是说“喂，谁呀？”现在则拿起电话就要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方就要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才能开始说话。到照相馆去照像，一律要照革命像。所谓革命像就是要手持红宝书，双目凝视前方，身后则是放射着太阳光辉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年青人则可照手持红缨枪，心中热爱毛泽东的革命像。除此之外皆是封、资、修，一律不照。

一股个人崇拜的狂热，人为地推向了顶峰……

北京告状保皇派打了一个大败仗，学院造反派在两派不断的斗争中日益强大。院、系两级领导组织中的保皇派头头，被造反派抓来游街，这些保皇派头头多是党员，大小都有个官职。

畜牧兽医系的保皇派头头，基础课党支部书记王佳真被揪出来戴高帽子游街，像排演滑稽戏一样，在校园内转了一圈。大概从此他心中不快，以后在开会时，他总爱开玩笑似地说：“戴高帽子舒服！”在作完对毛泽东挂像的“三忠于”

活动后，他就半真半假地说：“三呼已毕，现在大家开始开会。”王佳真被作为保皇派头头揪出来，吃了些苦头后表现出了不敢明言的不满情绪。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他一心“突出政治”，20多年后我在美国听说他后来也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性扭曲，由此亦可推见一般了。看来“文化大革命”扭曲了一些人，但也教训了一些人。

保皇派急先锋陈志方，跑回家去长期不回来。保黑材料有功因而火线入党的赵江，被造反派批判后“开除党籍”，就是说这次入党不算数。这一“闷头棒”对赵江非同小可，加之人言可畏，一些有心无心的话语，给他精神上很大的刺激，从此他就疯了。独自一人对着自己的手指头发笑，或长期一人独坐不语，突然间又笑了起来。这些人以后如何呢？自是后话。

保皇派失败后，不久全国兴起成立战斗队的热潮，畜牧兽医系成立了“大吼猛进战斗队”。一些原来是保皇派的人又都变成了“反戈一击有功”造反派。因为当时的形势只有造反派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时，院系两级党组织领导似乎已意识到运动很快就会纠缠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已自顾不暇，也没有精力再来组织对我们进行批斗，而且他们的骨干分子已纷纷倒台，被造反派戴高帽子游街。

话分两头说。在这造反派和保皇派争斗不休的时刻，对揪出来的人的管制就放松了。这个所谓的专政队就几乎无人管了。我们这些人两派都不能介入。我们仍然每天去劳动，有几个红卫兵来管，也只是做样子了。

于是，我就写信给妻子。不几天她就请假来了，我到火车站去接她。

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五哥，你好瘦啊，你不愉快，是吗？”

我说：“我想你。”

来到学校，我到学校后勤部去借一间房子。后勤部的人立刻给我找出一间他们认为是较合适的小屋给我。这屋在中专部，离打闹不休的中心较远。这一段时间没有人来麻烦我们，每天我去劳动，她就在“家”画画，有时到我劳动的地方采摘野花野果。和我一起劳动的老教授，还去和她聊天。大家向她夸赞我的为人。这时我们虽然没有钱，但却很快乐。只不过我每天都在担心，红卫兵会不会突然间又来找麻烦。

我告诉她我现在的处境，她毫不在意。她说她们的单位也一样，被整的人都是好人，她认为这些整人的坏人迟早会有报应。

她与我一起商量对策，我认为最好是离开学院到重庆去看望母亲，设法躲过这混乱的时刻。我们决定先在这里住些日子再说。我俩就在这对我进行所谓的“改造”暂时放松的短暂时刻补度新婚蜜月。记得一个阴雨的黄昏，她要我给她讲个故事，我就给她讲了一个。

话说清朝初年，一日，文人雅士济济一堂。有学生请文人纪晓岚题诗，以作留念。纪晓岚挥笔而就，写古诗一首：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不幸将第一句的“间”字写掉了。有人说道：“您写掉了一个字。”顿时满堂哑然，面面相觑，无人说话。

纪晓岚立即答道：“这不是写的那首诗，是写的一首新词。”

众人问道：“此话怎讲？”

答曰：且听我念给你听。

黄河远上，
白云一片。
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大家无不佩服其临机应变之才华。

小文听后，开心地笑了。她说：“你讲的故事，全是些诗呀词的，你怎么能记得？真是个穷秀才。”

我说：“毛主席的诗词我也会背，不信你考考。”

“才不管你那个呢，古典诗词就是封、资、修。对别人可不要讲这些笑话故事，听说郭沫若要批判李白和杜甫呢。”小文说道。

我十分惊讶：“是吗？我看他最好还是批判批判他自己

吧！秀才无骨气，真是信口开河。”

当时小文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俩能够在一起。这运动看来才开始呢，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结束？现实生活是如此的严峻。可我私下的爱情生活却是缠绵悱恻，农学院后山有养猪场，前面有种马站、养鸡场、养鸭场、奶牛场，左侧有园林系的植物园，右侧有水稻专家的水稻试验田，其附近又有小麦锈病专家的人工气候室，蚕学楼旁有桑林，其上又有苹果园，葡萄园……

可以让我们去劳动的地方是很多的。

小文在这儿住了 10 多天，我俩的情感与日俱增。这一段短时间里，没有人来找我太大的麻烦。

送小文妹离去后，回到学校我继续参加劳动。现在的劳动虽仍然有几名红卫兵来分配工作，却已无人来抓什么阶级斗争了。各位在这个专政队中的教师或行政干部，就做着非本职工作。但人人都按时上下班，人人在劳动中都是尽力而为。有事或去看病也可请假。但是每人都十分明白，现在只是运动中的特殊时期，这段时间一过去，运动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所以大家都在观望，等待。我多么希望这个运动快些结束，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我是多么地盼望我和小文妹在一起，让我们能有个家。哪怕只是一个简陋的小小的地方。

一天，突然两名第二总部造反派的红卫兵，我也弄不清是哪个系的学生，气势汹汹地把我叫到学生第五宿舍的一间小屋。进得门来他俩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厉声命令我立刻向毛主席像跪下。这时我确实是无法再控制自己，我拒绝

下跪。

“下跪我没学过，你跪给我看看，”我说。

其中一名走上前来就要动武。

我说：“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下跪是封建礼节。怎么可以用封建礼节来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行礼。”

没想到，他俩回到桌旁轻声商量一会儿后对我说：“好吧，那就不跪了。你还有点儿造反派的脾气。你可以走了。回去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过了两天那位要我向毛主席像下跪的红卫兵，又来到我的寝室。他详细检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因为每次勒令我写坦白交代材料，我写不出来，就抄写学习毛主席著作。再说，这毛主席著作而今已经达到了神话的地步，我为什么不应该趁不能从事我的专业生物化学之机，好好地学一学，认真地研究研究呢？所以我也就真的开始学了起来。

他对我说：“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很认真，不错。我们要解散现在的专政队。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请假休息一个月，最近我病了。”

“有医生证明书吗？”他问道。

我拿出了医生证明书。在学校内有医生早已为我开好了证明。他同意我病休，并准许我回家养病。我去财务科借了路费，按规定婚后夫妻不在一起或未婚探父母一年一次可报销旅费。有红卫兵批准谁敢不依。我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就匆匆地离开了学院，唯恐转瞬就会变卦。

到了火车站，交通秩序混乱不堪，好在我年青力壮，手上又没有什么行李，当然容易挤上去。本来到天津约10个

小时就可以到达，但火车行至郑州就不走了，必须下来等转车。走出站来路上正有红卫兵在抓人游街。被游街的约有10多个人，每人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一个大牌，第一个牌子和高帽子上均写着“走资派”，另一人是“反动权威”，还有一人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倒数第二人是一个女子，牌子上写的是“大破鞋”三个字，她的颈上除了挂着牌子外，还挂着一双破鞋。看上去此女子十分可怜，她用一只手抓着一只鞋，用绳子拴着的另一只则任其在胸前摇摆，她头发蓬乱，长得很秀丽的面容上，包含着无限的哀伤。最后一名写的是“大茶壶”，颈子上还加挂了一把茶壶。这位“大茶壶”看来一点也不害怕，他一边走一边与走在旁边的红卫兵小将说话，还故意让那把茶壶在胸前摆来摆去，逗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还有什么好笑的呢！我厌恶地背转身去，走进了一家小面馆，买了一碗小面，任凭外边多么喧闹，也不再想看它一眼。

3个多小时后转上火车，到天津后，再转乘公共汽车，奔驰在那尘土满天、颠簸不堪的公路上。但是，立刻就能看到小文妹，我是多么地高兴啊！一路上风尘仆仆，但心中却充满着喜悦。

到小文工作的医院后，找到了她，凑足了路费，她请好假，我们就一同回重庆看望我年老的母亲。此时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交通之混乱简直不堪设想。要从门进入火车厢是绝对不可能的，车站门一开，我背着随身携带的行李，拉着她的手飞快地奔向火车，我原以为我们跑得这样快，火车一

定是空的，等跑到一看，车厢内早已挤得满满的，红卫兵从铁道上早就爬进去了。我俩跑到车下，看见开着的窗口，急忙把行李从窗口塞进去，我让小文踩在我的肩上，帮助她爬了进去，她回过头来想帮助我。

我说：“不用，看我的。”

于是，我反身用手抓着窗口，一个鹞子翻身就进去了。我刚进到车内，周围的红卫兵小将就鼓起掌来。

有人说道：“好武艺。”

于是，大家就交上了“朋友”。

有人问我哪个学校的？我顺口答道：“南开。”

火车在北京转车，车厢内之拥挤不堪想象，行李架上都是人，列车员根本就无法工作，干脆什么也不管。最困难的是无法上厕所，因为厕所里也挤了三个人。经过协商，大家轮流坐座位，轮流上厕所。

旁边的车厢没有解决好，为上厕所的问题打起来了。

我俩曾经设想的蜜月旅行，就是这样开始了。是的，我们艰难，贫穷，但是我俩仍然很愉快。对我来说比起专政队中的生活，这就是天堂了。

第六章 巴山夜雨

小文和我一路上风尘仆仆，吃尽苦头，终于到达了重庆，与老母亲在这乱世中相见，感慨良深。母亲含着两行热泪，拉着小文和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此时重庆的形势已经很乱，日常物品买不到，食品更是奇缺。红卫兵到处抄家、抓人。我的父母亲与二哥一家同住，已经被抄家多次^①。

我母亲家境贫寒，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虽然抄不出什么东西来，但却把换洗衣被扔得满地。二哥的两个孩子还小，长子8岁，幼子6岁。在居住的大院里，别的孩子常常会来欺负。我们走在路上时，他们就跟在后面叫喊：

^① 抄家，即红卫兵闯人家中翻箱倒柜，砸烂和搜走他们认为的“四旧”，拿走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一切值钱的东西。“四旧”一词来自于1966年8月18日“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黑五类”，“黑五类”！哥哥比较老实，低着头不敢说话，弟弟人小聪明，就噘着小嘴喊：“你是黑八类”，“黑十类”。我们看见就立刻把他抱开，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的父亲被宣布“集中学习”（即到一个外人不得入内的地方，由军队把守看管）。幸好被“集中学习”，否则在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中后果难测。红卫兵的情绪有如干柴烈火，凡个人历史上所谓有问题的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抓来游街、批斗。

我的父亲过去是国民党将领，由于抗日战争的功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获得联合国反法西斯勋章。1986年去世于四川省重庆市，享年86岁。父亲在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逮捕，据说父亲是以“战犯”罪名被逮捕，并立即判处死刑。但那时重庆市有位资深人士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曾与父亲交往甚密，认为不宜判处死刑，而另一位在共产党中被誉为军事家的高级将领也说不要杀。故而改判无期徒刑，被关进监狱，1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得到特赦，释放回家，任文史馆馆员，列席重庆市政协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直到追悼会才又重新称他为将军，肯定他抗日战争中的战功。追悼会的巨幅挽联是：

挽民族危亡于往昔宿将名垂千古，
争国家统一于当今吾翁愿遂平生。

另一幅对联是：

将军辞世犹记勇退扶桑寇，
博士无间难忘继承爱国心^①。

父亲去世后，我们给父亲写了“墓志铭”：

父亲墓志铭

雄伟将军骨，
多情诗人肠。
沙场叱风云，
儒林讲汉唐。
长空翅未展，
临去意彷徨。
黄泉若论兵，
应是冥国王。

我的二哥 1957 年在整风运动中，被推选为小组代表发言向党提意见，转眼间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斗争，而被定成右派，经过劳改成了所谓的“摘帽右派”。现在又是红卫兵打击的对象。二哥的家只有两间小屋，已住着他们一家四口和我年老的母亲（父亲已被集中学习），绝对不可能再住进去一个人。我们就晚上临时打个地铺睡觉，在重庆的家其困难情景已达极点。不久弟弟也由他工作的医院回到了重庆。

^① 博士指的是我在美国的大哥。

长时期分别，短暂相聚。

重庆比我所在学院的城市情形还要乱，还要糟。市场上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为了买白菜，我和弟弟在头一天傍晚就到菜店门口排队，但排队等候的人既多又乱，很难想象明天菜店开门，秩序会乱到一个什么样子。于是，我和弟弟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找出纸来，给每位排队的人发一个号码，没想到这办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拥护，很快就变成了大家公认铁定的“法律”。我和弟弟忙了一个通宵达旦，到第二天早晨，发出的号码竟有 300 多号。菜店开门后，总算“有秩序”地买到了白菜。很难想象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但是我的母亲在这儿，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一个贫穷而温暖的家。大家和睦相处，相依相亲，短短的相聚，使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巴山夜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夜来人静，大家挤在一间小屋内，忆不完的儿时旧事，谈不完的心里话。我们想起了小时候在广安县八月中秋，母亲和我们弟兄 4 人，坐在凉椅上赏月，大哥提议每人作一首赏月诗，弟弟当时 4 岁作的诗得了第一名。

今夜是十五，
月亮圆如鼓。
大家用力笑，
莫要自寻苦。

当时我们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共同欣赏大哥寄来他的

诗词新作。记得1957年当大哥知道弟弟从山西我从天津回去看望父母亲时，寄来了他填的词《团聚》——鹧鸪天。我们就从母亲保存的大哥的来信中翻找了出来。

团聚——鹧鸪天
1957年诸弟返渝与母团聚

春至渝城欢几何？
嘉陵依自泛微波。
南来对泣依萱草，
隔岸何因系网罗。
失行雁，
怅离歌。
梦魂长绕故山河。
天涯岂是无归路，
千岭云横恨最多。

我们讨论、推敲大哥的字句、文风，津津有味。我问母亲大哥有否新作寄来？她说还有一首，可是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母亲说可能被抄家抄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却又在一堆乱纸中找到了。红卫兵几次来抄家，只想找出什么值钱的东西，老母亲保存的字纸，他们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当我们找到了后真是十分欣喜，有了这两首诗，犹如他也在我们的身旁。这是大哥写的另一首诗，题目是《母亲节忆大陆父母》。

七 律

母亲节忆大陆父母

耆年福寿号双全，
谁解倚闾望眼穿。
岂待儿归承菽水，
只由官命配柴盐。
衣单未耐冬霜逼，
室陋难熬夏热煎，
此地奉钱堪侍养，
云山何故阻人圆。

念起大哥的诗作，我们更加想念他。弟弟作了一首诗——《思兄》。

思 兄

十年一觉论兴衰，
两地茫茫暗相猜。
关山明月仍记否？
梦魂几回绕旧阶。
万里秋风染红叶，
点点苦雨浸绿台。
相思梦里惊沉睡，
繁星欲语夜色哀。

当时的促膝谈心我们称之为，“不是踏春好天气，却宜拥被论纵横。”

后来弟弟告诉我，他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时，他还是某医学院二年级学生，解放前他在南开中学参加过一个中学生社团，名叫钢锋社。当时学生成立社团十分流行，学生三五成群，八九结伴，自立社团办起一张小小墙报，对提高学生的写作与组织能力，甚有裨益，很值得提倡。

肃反运动却说他是参加过反动组织（他当时才15岁），故而将他隔离审查了一年。1957年整风，我的弟弟就像我在南开时那些右派同学一样，傻乎乎地提了意见，说肃反运动整他是整错了。当时是鼓励他提意见的，但却把他提的意见指责为右派言论，把他定为右派分子。

他讲述他当右派劳改的种种苦难，他对着一座孤坟写下的诗句，其中两句，被我们称作“短命句”：

热血化作春风拂，为君驱尽孤坟寒。

弟弟的故事听得我凄然泪下。不要讲了吧，还是请小文妹给我们轻声地哼唱一支旧歌吧。

金风瑟瑟浸梧檐，
满地凄凉天未寒。
万里长空驱征雁，

几行衰柳绝鸣蝉。
秋声淅沥在何处？
似在树林野草间。
正欲相寻寻未得，
更堪谁弄管弦繁。
寒梅树下军行急，
何日长驱夜出关？

这是一支旧歌，当时至少会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更或是“反动歌曲”，可是她却以无限的生命力，拨动着我的心弦。这首歌总是使我感动。我们还同声轻轻地哼起儿时的旧歌：

母亲的光辉，好比灿烂的旭日，永远地永远地
照亮我的心，谁关心你的饥寒，谁督促你的学业，
只有那伟大慈祥的母亲，她已经疲劳了，你可曾见
她的额上已添上了一条条的皱纹……

母亲眼中含着泪花，我们眼中也含着晶莹的泪水，这一段短短的时日，是那艰难岁月中我永远回忆和怀念的时光。那“万寿无疆”的赞美歌，和那“鬼见愁”的革命歌曲，却只是昙花一现，只有深受迫害的人，才会在噩梦惊醒中记起。

此时的重庆物资奇缺，家家户户都烧蜂窝煤或煤球，但是生炉子却需要发火柴。母亲能够用极少量的一两根小木材，加上几张字纸将炉子生着。过去总有农民担着小担劈柴

沿街叫卖。现在没有了，生炉子作饭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于是，我就和弟弟带着一个旅行袋，渡过长江到南岸农村，走了几十里路，拾得一小袋干树枝回来。弟弟和我一路上担心的是，我们离去后母亲的日子怎么过？

重庆并不是我们能够躲避磨难的地方，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造反派不断来电报，命令我返校，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我不愿意我的母亲受到更多的干扰，我只得又回学院去，临别依依，无限愁怅。

我与妻子一同回到天津市，这儿是小文的家。一路上交通秩序比我们回重庆时还要乱。一出火车站，就看见传单满天飞，大字报密密麻麻贴满了墙壁，一群群红卫兵到处招摇撞骗。小文的父亲过去是牧师，当然更是被冲击的对象，她的妹妹们十分可爱，尤其是小妹妹长得如花似玉，最为可爱。走在路上她总会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大五哥（她们的姐姐是大姐，我是五哥，所以就叫我大五哥），大姐和你才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恨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整你，我把我的红卫兵带到你们那里去，我去造他妈的反，夺他娘的官，我去帮你。”说完后伸伸舌头，作个小鬼脸。那时她才14岁，她总想留我们多住几日，但眼下的形势，确实无法留住，只得分手。小文妹回她工作的医院去，我又回到农学院。

回到学院，二总部已经占了绝对上风。夺得广播器材后，高音喇叭中每天不断放着造反有理的歌曲。从保皇派第一总部中觉悟过来，反戈一击新加入第二总部造反派的人数

众多，红卫兵小将们排着队意气风发，雄赳赳气昂昂，有节奏地高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雄壮地高唱着：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他们还喜欢唱下面这首毛主席语录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鬼见愁”一歌唱完，后面叫喊的内容随着造反的进程已有增加，他们反复叫喊：

滚！滚！滚！滚你妈的蛋！造！造！造！造他娘的反！夺他妈的权！罢他娘的官！夺他妈的权！罢他娘的官！……

一，二，三——四！

“革命意志”益发坚决，“革命斗志”更加昂扬。

这次回重庆沿途也看到了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所谓“壮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与鼓舞下，红卫兵小将背着小小的行装，穿上红卫兵军装，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罩，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手举红宝书，从全国四面八方拥向北京，又从北京撒向各地。所到之处有如暴风骤雨，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势不可挡的“破旧立新”“全国一片红”的运动。

破旧立新！破什么旧？立什么新呢？

“破旧”这两个字的含义太广泛，哪些事情，哪些风俗习惯，哪些东西是“旧”呢？这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可是这在红卫兵小将的眼中，却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回答也十分简单。那就是“凡是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旧’，都要‘破’，都要彻底地砸烂！”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文物大浩劫就此开始了。

中国是一个具有 50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各地丰富多采、千姿百态的文物建筑，醒目地成了红卫兵小将们“破旧”的对象。于是，每天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小将就到处拆房屋，砸雕像。除了周恩来总理指定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有解放军把守的以外，破坏和砸烂了许多文物建筑。

真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浩劫啊！

我见到离农学院不太远一个名叫“古佛山”的风景区。其中许多地方都被砸烂，佛教殿塔亦被拆毁。除破坏旅游古迹景点外，普通民房的屋檐或房顶上有雕塑者，也不分青红皂白统统砸烂，砸烂了的地方房屋就要漏水，房子漏了再修嘛。一位红卫兵小将对我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地区名，商店名，道路名，凡有沾“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之嫌者，也一律砸烂，敲锣打鼓重新取一个革命的新名字，例如天津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嵌在墙上的这三个字已有 38 年的历史，敲锣打鼓把它砸烂重新命名为“人民商场”。“中原百货公司”改名为“工农兵商场”。北京有 70 余年历史的“全聚德烤鸭店”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改名为“红卫兵

战校”。有40多年历史的“协和医院”改名为“反帝医院”。新疆乌鲁木齐的“中苏友好医院”，就改名为“反修医院”，该医院座落的街道“友好路”就改名为“反修路”。

一时间全国各地“反帝街”“向阳大道”“伟东路”“爱东路”“敬彪街”等等多得不可胜数。记得辽宁省境内有一个火车站站名叫“白旗堡”，“白旗”代表反动派，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就改名为“红旗堡”。一个城市中的一条街道改个名字影响并不太大。但一个火车站的站名要改，就不应该是一小队红卫兵拿着棍棒说改就能改的。可是小将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说改就是要改。谁敢不依？

红卫兵小将要建立起一个毛泽东思想光辉灿烂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于是，所有的街道，墙壁，门窗一律都涂成了红色。更有甚者，小将们又发现了交通信号有攻击社会主义之嫌。为什么要用绿色代表安全，而红色却代表危险不许通行？应该改为红色代表安全，红色许可通行才对。更不管是否会造成交通混乱。

小将们看姑娘的长辫子是“封建主义”，手上戴着瑞士制造的手表是“帝国主义”，小裤腿和大裤腿都是“修正主义”。于是，一个剪辫子，砸手表，剪裤腿之风就刮了起来。我的妻子原来留有一对长辫子，一天回家，火车刚到站，就上来了—队红卫兵，走上前来，不由分说几个人抓住胳膊，一人上来就剪辫子，并有意只剪去一条，好让你在街上出丑。这个剪辫子的人动作粗鲁，把剪刀戮到了颈子上，被拉了一条口子。她捂着伤口向家走的路上，看见另一位女子，裤管从下一直剪开到腰部，内裤露在外面，引得路上的行人

和红卫兵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女子一边高声叫骂流氓、流氓，一面捏着裤腿往家跑。这分明已不是什么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而是流氓集团的流氓行为。但此时此地，在这大街之上竟然无人过问，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哈哈大笑。

这时候全国各地各种造反团，战斗队，联络组纷纷成立。凡此时成立的社团不用登记，一律有效。而且任何社团都可以出版刊物，印刷报纸，发行传单。各个社团取的名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用毛主席诗词或语录上的词句来命名，诸如：迎春到、千钧棒、起风雷、换新天、尽开颜、战犹酣、山花烂漫、飞鸣镝、全无敌、风雷激、鹰击长空等等。也有用纪念日命名的，例如：五二一、八三一、五一六等等。也有用对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效忠而命名的，例如：东方红、红卫东、死如归、铁血团、井冈山、誓卫彪等等。

所有的人，包括当年南征北战，为共产党建立政权，功勋卓著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要在红卫兵小将的冲击下全部重新过关。至于省市级以及其他各级机关，当然就更不在话下。农学院的各级干部当然亦无例外。

第七章 武 斗

1967年5月“驻农学院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学院。此时在学院内造反派的势力极大。大势所趋，保皇派都已反戈纷纷加入了造反派，但小规模零星争斗仍时有发生。

畜牧兽医系的教职工成立了“大吼猛进战斗队”，提出了“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都变成了“反戈一击有功造反派”，其中大多数都是随潮流，并适应当前本市革命斗争的大形势办起了《炮声隆》战报（此名来自毛主席词《西江月·井冈山》）。

这时农学院所在的C市主要分为两大派，各大专院校分别加入了不同派别，其派别的基本分歧在于对待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

一大派取名为“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站”。简称“省革站”，被对方骂称为“无赖

站”。它几乎包括了各工厂矿山和大企业的大部分工人，而高等院校则只有农学院参加。所以农学院就被对方骂称为“无赖站一枝花”。

另一大派是“八三一”派。在这一派中亦有工厂矿山和企业的另一部分工人，还有七个大专院校的大部分师生员工。

两派在保护和打倒某些干部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为宣传各自的观点，仅就我所见到的江中市等两个城市来说，每天从各个单位到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宣传的大字报、漫画、标语、传单、战报、海报等等，多得如雪花乱飞。每日希奇古怪的消息层出不穷，各派都有自己的高音喇叭宣传车和文艺演出队。经常召开维护各自观点的大小游行、集会。抓人、抄家、批斗、游街，24小时不停地激烈进行着。

有一次学院的校车和学院的卡车开到市内别的学院串联，车开得快如出山的猛虎。车行到拐弯处，来不及拐弯，一下子闯到一颗树上，全车的人甩得满地，轻伤重伤者数十人，送到就近医院急救后，还算幸运，只有牧医系一名学生死亡。

又一次学院两辆卡车载满了红卫兵去市内开革命串联大会。回来时播放着革命歌曲，行进间把一位骑自行车的人闯死。

革命小将也造了“公、检、法”的反。所以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已失去了正常功能。这叫做“砸烂公、检、法”！

两派各持己见，辩论争执的白热化就是动武。初期的武

斗只是拳打脚踢，逐渐发展为棍棒交加。不久，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发表“文攻武卫”的指令后，各派大小武卫队纷纷成立，此时的形势真是严峻极了。由于武斗形势严重，所以农学院内亦是壁垒森严，造反派总部（即学生第四宿舍）用桌子、板凳、沙袋垒了起来，俨然如碉堡一般。武卫队24小时全副武装轮流值班。派到市内占领省委大院的小分队亦用沙袋筑起了屏障，全副武装警惕着对立派前来进攻。每日每夜都是如临大敌。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C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在所谓“保卫”和“打倒”的区别下，一场大型武斗，即将拉开序幕。

在这武斗即将拉开序幕的前夕，畜牧兽医系的教职工的“大吼猛进战斗队”就叫我去卖《炮声隆》战报和写大标语（因为我会写大的美术字）。我也就如法炮制，每天跟着混。一般说来《炮声隆》战报是每周出一期，畜牧兽医系的教师们无教书工作可做，各个教研室的教学、科研工作早已全部停止。被贴过大大字报进过专政队的和没被贴过大大字报的人都在“大吼猛进战斗队”的领导下工作，党团书记、行政干部全部靠边站，造反派的人大为走红吃香，整个学院完全处于一种半无政府状态下。

此时的战斗组组长由能说会道的畜牧学助教兰尹成担任，每人的工薪由财务科按月照样发放，教师和职工们每天来“上班”，就是写大字报，出墙报，写大批判文章，学习报章杂志上的政论性文章，并忙着编辑出版这每周一次的《炮声隆》战报。这是一份晚报一般大小的报纸，每期出版

页数多少不定，依据所收集到材料的多少而定，其内容均是所谓的大批判文章，例如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批判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及各级领导的文章。攻击、谩骂对立派别组织的文章，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等等，名之曰“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其内容均是从报章中，主要是“两报一刊”剪辑抄袭而来，也有很多是抄袭当时多得不胜数的其它小报而来。战报上除了大批判文章，还有各种消息、新闻、报导；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其它一些党政领导人和专家学者的漫画、连环画，丑化省委书记的漫画、连环画，这些是当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由学院印刷厂铅印出版，当时在全市也算得上一份像样的小报。

方是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领导，各级党委领导大多数均被打倒，或是靠边站。由群众组织起来的“造反团”，“战斗队”如雨后春笋。称兄道弟，拉帮结派的流氓集团亦混杂其中，全国性大串联方兴未艾，火车、轮船免费供应红卫兵小将闹革命，全国的交通之拥挤，秩序之混乱，确实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无论怎么“乱”，但是任何团体、个人都是打着热爱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旗子。对毛泽东的拥护和崇拜随着这个“乱”字而日益升温，从而达到了极高峰。那风行一时的“忠字舞”旋风，愈演愈烈，从北京发起滚滚流向全国各地。各式毛主席像章成了最时髦的佩饰品。军装、军帽比以往的蓝色干部服更为时髦、美观。“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如一股飓风强硬地刮进了每个人的日常

生活。“三忠于”活动——“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仪式，也更为硬性地闯入了起床、睡觉、吃饭、开会、学习等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全国范围内“武斗”的旋风在“文攻武卫”理论依据的鼓舞下越刮越猛，神州大地到处是乒乒乓乓的枪声。面对这种情况，中央文革小组绝对控制下的重要舆论工具却异口同声地运用毛主席语录，反复宣传：敌人说“乱”是糟得很，我们说是好得很！充分肯定了这场无法无天、祸国殃民的武斗。

同时，各重要舆论工具更是大张旗鼓地宣传“只有大破才能大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并反复宣传“全国的形势是一派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全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真正的发动起来了。”不容许任何人有丝毫不同意见和看法。

由于对一个干部的去留，各派意见不同，不能统一，加之造反派若夺权成功即有官位可图。于是，C市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从1967年8月开始萌芽，而且愈演愈烈的一场大型武斗就展开了。

这是继砸烂历史文物之后的又一次大浩劫！

我所记述的武斗，只是我亲眼所见，至于别人看到讲给我听的，多如牛毛。大型武斗有多达数万人参加的，机枪、大炮应有尽有。因不为我亲眼所见，故均不在记述之中。

1967年秋末，大约是10月份吧，我和另外三位青年教

师一大清早带着新出版的《炮声隆》战报，搭乘火车到江市去卖。因为这天是“省革站”观点的人开大会。当火车到达江中站时，看见整个车站广场挤满了人，“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开大会。人们有的坐在马扎（一种两腿布面的简易小凳）上，有的坐在地上。我们站在广场的一角卖报。突然间听得有人大声叫喊：“八三一的武卫车来了！”

说话间但见两辆卡车，上面各站有全副武装的三个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对着广场马路上的人群急驰过去，横穿广场。人们如潮水般地向两旁跌倒奔逃，卡车就从人们逃开的中间急驶而过。他们主要是来破坏会场秩序，并不想杀人。说也奇怪，这样多的人，车速并不太慢，估计大概有每小时30多里的速度吧，竟然一个人也没被压上。当然，人们向两旁慌忙躲避时造成的小伤，那就无法计算了。可是车开到广场尽头时，一位从农村来的老大娘，挎着一篮鸡蛋，被车一下子闯倒在地。卡车从头部碾过，脑浆与鸡蛋溅洒满地。车到前面路口处，又将一中年男子撞出数丈之外，头部流血，当即死亡在地，而这两部武卫车却扬长而去。

这时开会的一方，只听得高音喇叭大声叫喊，调动武卫车前来保卫。我们4人见势不妙，不敢久留，急忙卷起未卖完的战报翻过月台，一辆火车正要开动，我们就爬了上去。回头只听见车站广场处爆炸声大作。远望见扬起爆炸的烟尘。当时仅是武斗初期，用的是各派自制的土制手榴弹，但也颇具杀伤力。我们离开后，这场武斗是如何在进行，死伤

多少人，无从得知。

另一场我见到的武斗是发生在市中心南街。南街是除友谊路外，另一处繁华的中心。道路两旁都是百货大楼，各个百货大楼均早已分别被各派武卫队所占领。各派的武器到1967年9月就早已不再是木棒和铁棍了。手枪、步枪、手提轻机枪、机枪、手榴弹已应有尽有。农学院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的武卫队转眼间都有了手提轻机枪。造反派头头腰里还有手枪。

南街的这场武斗，记得大约是在1967年11月份。这一天省革站组织人们游行示威，人们抬着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红旗招展，唱着革命歌曲，呼喊着重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口号，在马路上八人一横列进行游行。

在南街的两旁人山人海，骑脚踏车的人，在这儿没法骑，只得下车推着走。街道两旁卖水果的，偷着卖煮玉米的——因为玉米是粮食，还未百分之百的成熟，就摘下来，当时被认为是浪费粮食的行为，还有卖稀有而珍贵的花生的……各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殊的方法兜售生意，警惕地提防着被没收的危险。因为卖水果、玉米都是做生意，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记得前些时我回重庆时，在人民公园路口，看见红卫兵小将批斗一个戴高帽的人。原来此人会雕刻一种微型小字，手持一把雕刻小刀替人在钢笔上漂亮而流利地刻上几行毛主席语录或诗词，再加上年月日，留作纪念。收费五分钱。红卫兵认为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抓来批斗。此人苦苦哀求说：“红卫兵小将们，我可是家庭出身贫农，

我这个小小手艺不过是走五分钱的资本主义嘛。”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由于家庭出身好，是贫农，所以游一游街，刻字工具没收就此了事。若是家庭出身不好其问题的性质，就不知道会有多严重了。

正在这游行队伍行进至南街之时，夹在游行行列中却出现了一辆武卫卡车。车上有正副司机各一名，两旁车门各站一名彪形大汉，手提连发盒子枪，车上有三人，中间一人扶着一支两脚架在驾驶台棚顶上的轻机枪，两边各一人提着手枪。当武卫车在游行队伍中行至南街时，在百货公司楼上的对立派用广播喇叭向下高声叫骂：“无赖站，你听着！给你脸你们不要脸。和平游行，你们为什么开来武卫车？”

车上的武卫队立刻回答：“老子是保护群众，只有武装才能保卫和平。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双方对骂愈演愈烈，武卫车上的人不耐烦，拔出枪来对着天空放了一枪示威。

在楼上的八三一对立派的人喊道：“你他妈的不讲理，要打？好，老子打给你见识见识。”

说完，对着武卫车就是一梭子子弹打了过去。武卫车上的人慌忙对着射击的方向还击。霎时间卖花生水果的，路过围观看热闹的，推着脚踏车的全都一下子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这时百货公司对面高楼上省革站的武卫队，立刻对着八三一派的窗口开枪平射。八三一派无暇再向地面射击，掉转枪口平射还击，其它窗口也立即开枪支持，互相射击。就在这平射的瞬间，趴在地上的人一跃而起，竞相争着赶快逃离。花生、水果、脚踏车……打翻满地，挤伤、踩伤的不计

其数。我慌忙顺着墙根逃离南街，向着农学院的方向跑去，只听得背后枪声大作。我以当年参加运动会的速度不停地向前奔跑。跑出10来里地，后面的枪声仍然清晰可闻。这次武斗死伤多少人，无人统计，也无人来管。大约一星期后我再进城，只见马路上贴满了各派的许多标语。诸如“还我血债！”“血债要用血来还！”如此醒目标题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听说农学院旁边的“炮兵学校”，有一学员在武斗当天走出宿舍，被一颗从南街方向飞来的流弹打中头部，当即死亡。

还有一次我看见的武斗是在农学院校门口进行的，这一天江中市的“红工联”，其全名也许是叫“红色造反派工人阶级联络站”，他们是属于八三一派的，要到C市来开大会。由江中市到C市开车行驶在成北公路上，必须路过位于C市北郊的农学院。农学院革命小将发话，不许通过。此时学院已有由农业机械系加工厂自制的“土坦克”，武卫队手中都是油光锃亮的手提轻机枪。

江中红工联多为煤矿工人，要硬闯过关。所以先开来的是武卫车。武卫车上的人穿着奇特，武卫车也是卡车，上有正副司机各一名，司机两旁车门各站有一名彪形大汉，背上交叉插着两把大刀，腰上系着红色飘带，手腕上亦紧箍红色护腕，一手挽着车门，另一手提着连发手枪。车上驾驶棚后亦是站立着三人，中间一人手扶着两只脚架架设在司机驾驶棚顶上的轻机枪，子弹满膛，手指放在扳机上。两旁各站立一人，提着连发手枪保护。

当红工联的武卫车行至离学院大门不远处，学院武卫队下令立即堵车，由于出现得太突然，对方紧急刹车。但是车

上扶机枪的人手指是放在扳机上的，刹车引起手指扣动扳机。对方枪声一响，农学院一方就立刻还击。此时我正在校门不远，见到此情形拔腿就跑开了。这场武斗时间不长，大约中午时分，看见有人拉着一人的脚，从校门口拖了进来，并看见刘铭在那里指手划脚大喊大叫，此人被拖到了学生第五宿舍和教职工第二宿舍之间的空地上。不知道是死的还是活的。这种事我知道绝不可沾边。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人贵有自知之明”，以我的处境，这种场合当然远离为佳，所以我急忙就走开了。以下的事情是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我就不知道了。若早知今日我还能有机会提笔追述此事，当年我真该追根究底把事情的全过程看完。仅此一件武斗事件，若拍成电影想必也会是一部武斗惊险片。

农学院的另一场武斗，是学院武卫队去进攻疗养院。这是当时农学院入尽皆知的事。农学院的武卫队是傍晚出发，战斗是晚上进行的，在双方互相射击中，学院理发室的汪飞被打死，对方死伤不知。

1967年和1968年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武斗发生。重庆的武斗十分激烈，主要是以“八一五”造反派为一方，与“赤卫军”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另一方的大型武斗，他们使用机枪和大炮（听说是将高射炮平射作大炮），把坦克开到市中心地带。我所在的C市并不是武斗最严重的城市，凡当时过来的人，几乎每个人都会摇头叹气，讲出他自己所见所闻的残酷的武斗情景。武斗阵亡的人当时都被各自的单位或派别誉为光荣的“烈士”。但武斗之风刮过以后，立即被人讥笑而称为“劣士”。

正在武斗进行的同时，学院保皇派已经回来，都变成了造反派，眼看有权可夺，岂能放弃机会，袖手旁观！为进一步表现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一场更为残暴的“专政”回潮如狂风暴雨在学院中再一次掀起了狂波巨浪。

大难即将临头！

第八章 又一次批斗

正当全国各地武斗之风劲刮之时，农学院虽与外界形势大体相似，但似乎又是略略领先一步。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于第一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的彻底垮台所致。这当然是由于两派北京告状中央文革小组对待两派明显的不同态度所造成。到1967年冬第一总部垮台已成定局。

1967年冬，农学院由军宣队和工宣队共同领导，新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宣队的周代表，周代表离去后接替他的是罗代表。

在军、工二宣队的领导下，两派实行了所谓“革命大联合”，决定要造走资派的反。于是，就进一步提出了“打倒申（老院长）、叶（新党委书记叶华）、谭（原学院副院长谭春）、唐（原学院副院长唐思云）、桂（原学院副院长桂继平）”的口号。

我在1958年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农学院时，原是老院长任院长兼党委书记。副院长有唐思云、谭春、汪一舟、辛明等人。老院长曾留学美国主修畜牧专业，在美与一美国女子结婚，抗日战争时期带着夫人，到延安参加抗日。老院长本人热衷教育事业。早在1949年他受党的信任与委托，来到C市创办农学院，将校址选在离市中心20多华里的王陵，位于C市和江中市之间。不但交通方便，且前有小溪，后有青山，既有西北高原的典型黄色沃土，又有丘陵地带的风采。仅就校址之选定来看，已可说明老院长确是颇具远见卓识之士。1952年，学习苏联，全国大专院校调整，将两个大学的农学院并入，农学院即具现在的规模。

到1958年，在老院长和唐思云副院长的主持下，学院办得有条不紊。图书馆、教学楼、运动场、风雨操场、中专部、中小学部、学生宿舍区、教职员住宅区、植物园、温室、实验田、畜牧场……一应俱全，已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学院了。

1965年，已是“文化大革命”风雨欲来的前夕。全院师生下到江东县参加“四清工作队”，学院的第一把手就已由新调来的党委书记叶华主持。老院长与副院长唐思云等即已失权，而被闲置。群众不明就里，大家都对老院长怀着不敢明言的同情和思念的心情。

1968年初，在“革命大联合”的口号声中，一个新的权力机构产生了，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省市以下，一律成立“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

畜牧兽医系从总支部书记到支部书记，以及那些少数想

求得一官半职的人，都怀着难以明言的委屈心态，他们中有的只想随波逐流，顺水推舟。而另一部分人则是早就千方百计地想重架“上天梯”。这“反戈一击有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权”字他们仍然有份。在畜牧兽医系“革命大联合”中，要建立一个“三结合”的新的领导班子，他们原本就是有势力的，怎会如此轻易放弃。

他们使农学院的运动更加“有声有色”了。一下子就揪出了院级干部五人“申、叶、谭、唐、桂”。火力较以前更为猛烈。而且过去他们揪出来的人一个也不放过，他们自信从来就没有揪错，只是眼前暂时还腾不出手来而已。他们把高音喇叭装到了老院长窗前，24小时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呼喊革命口号。

批判唐思云副院长的24个坏蛋（但）的大字报，在学院内颇有名。就是唐副院长作报告中常常说“但是”二字，说他就是在“但是”二字的掩饰之下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词。

对老院长开批斗会时，动手打他的人并不多。那些本来追随叶华在运动初期整人的人，见他大势已去，现在“反戈一击”对叶华的批斗会就不一样了，不少人打他就像用沙袋练拳一样。叶华本当是保皇派在农学院的第一号头头，他们站错队的气就都往他身上撒了。有一次我看见他们批斗叶华，有人一拳把他从台上打到了台下，许久也爬不起来。

在这连续批斗挨打的情形下。叶华忍受不了这无休止的残暴的折磨，又看不到自己的前景，就在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了。据说自杀的前一天，造反派

曾逼迫他第二天回答他们的一系列的问题。

叶华的自杀使得教职工私下议论纷纷，但并未在学院中引起震动。控制了学院一切权势的“造反派”比以前更为活跃，更加嚣张。他们除了更加积极地参加武斗外，并在校内增添高音喇叭，强化宣传威力，猛烈强化他们在学院内的抓人、打人、抄家、游街等等一系列所谓的革命行动。

1968年5月21日，在军工二宣队的领导下，他们刮起了命名为“5·21红色革命风暴”的运动。

在那天上午8时半左右，学院内高音喇叭比往常更加激烈地喊起了革命口号，放起了毛主席语录歌：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

大约二三十人一个小分队，手持棍棒，分头出发去抓人，出发前大家一起念读毛泽东语录“……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出发前学习毛泽东语录，就像大战前的动员令，好像给这些即将出发的英雄好汉们灌进了几瓶烈性烧酒，把他们的情绪推到了高峰，各小队就分别出发抓“坏蛋”去！

一个小队唱起了“鬼见愁”喊着：造！造！造！造他妈的反！砸！砸！砸！砸他娘个底朝天！

另一小队骄傲地唱起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向着另一个方向出发。第三

队，第四队……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抓路免生的小分队，进入教职员工住宅区，到了路免生的家门口，飞起一脚将门砰的一声踢开，进到屋里一把抓住路免生的前胸拖出门外，一下子掼倒地上，几个人立刻走上去，把他抓了起来，按了一个鸭子凫水。几人走上前来，对着他一顿耳光。路免生的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衣服已被撕开。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一群鬼哭狼嚎、凶神恶煞的暴徒，你一拳，我一脚，一推一扑爬，一拳一踉跄，顺着学院林荫道走向体育场。刚到学生宿舍门前，就给他挂上了早已预备好的大牌子，牌子太重，挂牌子的绳子勒在颈子上，像是要嵌进肉里去了一样钻心似地疼痛，路免生不得不用手扶着牌子，踉踉跄跄地被推打着向体育场的主席台方向走去。

不一会儿，另一小队闹闹嚷嚷抓来了学院附属农场行政干部周详檀，又一伙人抓来了余心德，他是土壤农业化学教授。

还有另一队抓来了兽医张雨英。

……

有些人出动去抓原来与自己辩论的对立面，学院体育运动场上杂乱地站满了人，高音喇叭广播的声音压倒了一切。

当喇叭高喊“把反革命分子路免生揪出来”时，我以为又要揪我来了。因为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音相近。我整理了一下衣服，静静地等着他们的到来。一个人在这危急关头，反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往往只好听天由命。当我弄清楚不是要揪我时，就站得远远地看。看着这些无法无天的

红卫兵，心想：不知下一个又该是抓谁？

他们把路奂生等人连推带打地押上台，就开始“有根有据”“理直气壮”地念毛泽东语录和批判发言，对被抓上台的人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广场上人头攒动，喧闹非凡。人们似乎都已习惯了这种场面，其中一些人就像鲁迅笔下描写的人物形象一样，麻木不仁，凑热闹，看希奇。还有一些人，装着“义愤填膺”的样子跟着去打人，实际上他们与路奂生素不相识，有的只是看了给他贴的大字报，或是参加过对路奂生开的无限上纲、谎话连篇的批斗会，有的甚至连大字报也没看过。今天他是要表现表现自己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今后或许能捞到点什么油水。我的心中感到痛楚，远远地望去。现场是一片混乱，阵阵嚎叫声令人不寒而栗。我感到一丝恐惧，担心他们一旦想起了我，就会立刻跑来抓我，于是，就转身离去了。

断断续续的声音随风吹来。

“把反革命分子路奂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路奂生，他抛弃了在美国的高职位和优厚待遇，只为一个理想“振兴中华”，只为一片痴情“怀念故土”。不幸的是这邪恶的事件就发生了，它来得是这样的突然，如此的荒唐！他还没有来得及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再看一眼那曾日以继夜思念的故乡，就告别了人间。

.....

天空密布着凄惨的愁云，体育场旁巨大的杨树无声地低垂着哀伤的枝叶，迎风摇摆着，她在深深地叹息，静静地凝

视着这昔日的高等学府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

为了什么？……竟会发生这一切？

人们心中的疑团，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是一个冤魂，又像一群幽灵，在学院背后的青山上，在他曾全心钟爱的故乡的上空幽游，晃荡……

满 江 红
天 问

欲问苍天，
今夕何年天不应。
孰可料，
铁杆猙猙，
恣意横行。
真谬倒置无人问，
朗朗乾坤乱整人。
是何因遍中华大地，
拜问神。

清秋转，
风恶尘。
暮色起，
悲角鸣。
叹哀鸿遍野，
义愤难平。
赤壁江滔千古浪，
神州大地何日宁？

待悠悠岁月辨曲直，
正乾坤。

打了人以后，红卫兵造反派当天下午顺着体育场旁林荫路上的树杆上长列横排摆开的巨幅标语是：

5·21 红色革命风暴万岁，万岁，万万岁！

既然是红色风暴万岁，是好得很，于是一股严重的抓人、打人之风，在学院中强烈地刮了起来。每天语录歌曲、革命歌曲，在学院的广播中震耳欲聋……

话分两头说。这时我结婚已两年多了。就像我们在一个“不该”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一样，她又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预产期是5月份。在哪里生孩子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重庆市的我的母亲年事已高，虽然愿意尽力来替我照应，但我没住处接她前来，而且我也不愿意让她知道我在学校被整的情况使她不安，重庆家中的困难已达极点，也没有能力再来接待一个产妇。

天津市她自己父母家，由于父亲过去是牧师，所以也同样被抄家。住房也是狭小不堪。更何况她的母亲早已去世，而今是一位与她们姊妹感情不相融洽的后娘。

我早已处于被监视之中，当然不会准许我离开学院，去到她的工作单位。

产期越来越近。想来想去也找不出一个对她生孩子会是比较平静和安全的地方。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到我

的学院来生。可是在偌大一个农学院之中，谁会帮助我，谁会帮助“小毒蛇”呢？我横下一条心，只有置于死地而后生，人来了再说。当时像我这样的情况，或妻子生孩子，或老母有病，向农学院提出恳请一席之地的已有好几家，对于我，他们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事情已经发展到燃眉之急的地步了。所幸学院后勤部中也有不少与我一同呆过专政队的人，他们私下帮助了我。后勤部终于以“人家还未定案”这样的理由，在学院将临时改为教职工用房的学生第六宿舍，借给了我一间小小的屋子，学生六宿舍 205 室。我白天劳动、开会、“学习”。夜晚就来把屋子打扫干净，用水洗擦墙壁、地板。在学院大量的破烂桌椅中，拼凑出桌、椅、床、凳。到外面去买了锅、碗、筷等等。终于这个“家”已初具规模。我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她的到来。

原来整我们的那套人马，此时虽已靠边站，但对系内早些时候他们揪出来的众多的专政对象，仍然认为他们抓“反革命”抓得正确，故而冷眼旁观等待时机。

却有少数教师、同事来看过了我这个穷困不堪的“家”，对我暗中产生了同情怜悯之心。于是，我就在这极其动乱的时刻，得到了一个极其短暂的“平静”。

可怜的小文妹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到了她。她大腹便便行动不便，带着安慰我的微笑，她说：“五哥，你又瘦了，我好想你啊！”

“别说这个，你不是来了吗？我们将要有个‘家’了。”我回答道。当时的交通秩序极其混乱，社会风气恶劣。如何

才能把她从火车站接到农学院呢？这确实是一大难题。

我搀扶着她，等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总算登上了一辆车。有一个中年人站起来让了她一个座位，这在当时确是绝无仅有之事。我就站在她的旁边。突然上来了一个年轻人，硬往里挤，我用一只手拉着扶手，拦住了他，他怒目看着我，说道：

“你干什么？”

“你要做什么？”我反问道。

“我要挤一挤坐那个位置。”

“你没看见那儿是孕妇吗？委屈点站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到站的。”

“你这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旁边的人也说：“一个大小伙子，站一会儿有什么关系。”

他气冲冲地想拉开我的胳膊，但他却没有那个力气。虽怒目而视，却也无可奈何。我就这样把她保护到了学院。

从此，我每天抽一切有空时间为小文弄点营养品。那时有什么营养品呢？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我带着瓶子到学院的奶牛场去买牛奶。牛奶场的工人总会不声不响，在旁边无第三人时，给我装上一小瓶稀有而珍贵的牛奶。养鸡场的工人扔给我一只母鸡。

说道：“这只母鸡病了，你去交钱吧。”

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这真是极大的恩赐。我回到家杀鸡去毛后，发现鸡身后背已经溃烂。这是被公鸡踩伤所致。我切去坏的部分，为小文炖鸡汤，一只鸡大约吃了五六天。

我自己一口也不吃，但却总是装着已经吃得很饱了一样。

我虽然背了个所谓侨属的恶名，弄了一身“里通外国”的罪过，但我却一分钱外汇也没有，唯有一件外国货，是件短袖尼龙丝衬衣。这是大哥几年前托人从香港寄来几件衣服，母亲给我的一件。这种不和时宜的衣着，我从未穿过。但被我同寝室的同事看见了，他愿付给我40元钱买这件衣服，而当时他的月薪却只有76元，我没有卖。现在妻子即将生孩子，经济困难，除了卖掉她的一些衣服和裙子外，这件衣服也以25元钱卖给了我教过的学生王芸麻了。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只剩下一把我十分心爱的小提琴。这是我大学生时代，用每月付5元钱的方法，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才付完，从我同年级的一位华侨同学手中买来的。这把提琴也在以后更困难的时候卖掉了。

我们的简陋的斗室，穷困不堪。但我每天开会、“学习”、劳动回来，它却给予了我甜蜜温馨。这是在更大风暴来临的前夕，上帝赐予的短暂幸福，难得的“平静”。

她依偎着我，哼唱着柔情脉脉的歌，遐想翩翩的歌声激动着我的心，还有她根据想像画出来的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可爱图画。她还清理了我珍藏保存下来的她的来信，每封信都记载着我俩相识后情感发展的点点滴滴。还有我们各自从童年时代直到现在的各种照片。可惜所有这些我们珍贵的东西，都在不久后被抄家时，全被红卫兵拿走了。

5月24日她的产期已临近，她就要做妈妈了。

她总问我：“当妈妈是个什么滋味呢？”

“就是妈妈罢，还有什么滋味。”我说。

就在24日这一天上午，我把那台旧脚踏车检修好，在后座上放了一个枕头。把她扶上去“舒适”地坐好后，就推着她去市妇产科医院。从农学院去医院有20多里路。记得那是一个阴云微风的天气，她一只手扶在我的肩上，当我骑上车时，她就抓着我的腰部，向着妇产科医院缓缓行进。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辛苦，心中充满深情和信任。当我推车走时，她居然睡着了，她确实太疲倦了，可怜的小文妹。

我用一只手连同车把一起抓着她的衣襟。因为我怕她会睡着时跌倒。到了妇产科医院，挂了号排队等候医生检查。医院里挂满了各种大字报，这是早已司空见惯的事。等候的时候虽然很长，但是大家宁愿聚在一起聊天，也没有一个人去看这些大字报，这玩意儿每个人都看够了。更何况是与自己无关的单位的事情。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过来和我搭讪，交上了朋友。

小文接受医生检查后，被接收住院，产期就是明天或后天。与我交上朋友的工人的母亲来了，老人家十分关心，来向我问长问短。

她说：“你要多买些她喜欢吃的东西，让她吃饱些，生孩子才有力气。”

她到我们的病床旁来，看见我们食物缺乏，她十分着急。她愿帮我照应小文，让我好有时间回去拿东西，并告诉我需要拿的东西，有干净的换洗衣服、毛巾、煤油炉、红糖、鸡蛋、小米、小锅……我不但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这台脚踏车怎么拿得了呢？但是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去一趟。大娘送给我几个鸡蛋，给小文煮好后，当天胡乱在外买点食物。一夜

无事。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学院去了。

在我骑车回学院的路上，在马路交叉处，突然间看见一个妇女披头散发向着我急奔过来。她向着我指了一指，又向着她后面指了指。她那哀求的目光，使我震惊。不一会儿一群大孩子拿着棍子、石头追了上来。说时迟那时快，一块石头正好打在她的背上。只见她伸着脖子喊叫了一声，她那瞳孔放大的惊恐万状的眼神，至今仍在我鲜明的记忆中没法忘怀。临走前小文曾再三叮嘱我，路见不平事不要管，如今的社会你管不了的。能够保住自己就很不错了。但此情此景，偏偏我又恰好首当其冲。我下意识地横过了脚踏车挡住了追赶的人的去路。

“你要干吗？”他们问道。

我说：“小同志，你们干吗？”

“打疯婆子”，“她是阶级敌人，”另一人补充说道。

我说：“一个疯子，还有啥打头。”

“好玩儿吧。”……

我耽误了他们追赶的时间，逃跑的人已经很远了，不久这一群半大孩子也就三五成群地走开了，有的嘻嘻哈哈，有的不满意我的阻拦，扫了他们的兴。

我继续向着学院方向骑去，争取早点赶回来。心里却总在想着那追赶打人的情景。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风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塑造着这一代新人的人格深层结构。

回到学院后，我急忙收拾一切能找到的东西。打成一包捆在自行车后座上，又赶紧去商店买吃的，此时货物奇缺，连凭票供应的鸡蛋也要排队。正在排队等候时，前面突然争

吵了起来。原来是一个男人，不排队就要购物，一个妇女和他争吵了起来。柜台内的服务员，并不关心顾客在外怎样争吵，趁此机会正好休息。

女方说：“你为什么不排队？”

“排什么队？还兴资产阶级那一套？谁有能耐谁买，”男人回答道。

众人不满，都喊叫了起来。但这人无动于衷，非买不可。

女方生气极了，骂道：“操你妈，你不讲理。”

“你操我妈，你有那家伙吗？还是让我操你吧，”男人下流地说道。

最后还是这个不讲理的男人得胜，不但先买了东西，还得意洋洋地离去。这个时代是无理可讲的，横蛮无理的人总是占上风。我唯恐又出现这样的人。总算好运气，买到了鸡蛋。把鸡蛋挂在车把上，眼看天色已晚，骑着车飞快地向着妇产科医院奔去。骑出约 10 多里路，下起雨来了。我脱下衣服把被褥包上，只穿着一件背心，飞快地向前赶路。到达妇产科医院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

进得医院，走廊上都是待产妇的家属，那位老大娘急忙迎上前来。

说道：“看你这小伙子，热心热肠的，待媳妇真好。”

我全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胡乱地擦干了头上的雨水。老大娘帮着我做吃的，做好一碗急忙给小文妹端去。她躺在床上，摇摇头说不想吃。

老大娘说：“一定得吃啊，不然，哪有力气来生孩子呢？”

你是头产一定得吃才行啊。”

她吃了一两口，就摇摇头说不想吃，吃不下去。正在这时候护士来了。事实上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护士还是医生。所谓的“等级制”早就给砸烂了，医生都得听护士的指挥，老一点的医生多成了反动学术权威。

她对我们说：“这号床的病人，立刻进产房。”

在护士的帮助下，把小文送进了产房。产房外面站了许多人，当产房门打开时，听见里面呻吟声和说话的声音。我不能再向前走了，留步伫立在外。

突然门打开了，出来一个护士，也许是医生，反正我们都称她们为大夫。她突然大声地喊道：“去，去，去。站在这儿干什么，生还早着呢，远点站着。”

我移步回到她的病床旁，刚才做的东西她未吃，放在小桌上。

老大娘对我说：“小伙子，你把它吃了吧。”

这时我才记起，从早晨到现在我还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呢。这一碗食物，我几口就吃光了。

老大娘笑着说：“好小伙子，你的媳妇有你也真有福气。”

我又回到产房门口，来回走动等候，我找来纸笔写了几个字。

小文妹：

不要怕，勇敢些。我就在门口，我和你在一起。

五哥

5月25日

一位年青女大夫从产房走出来，我迎上去请她把这张纸条带进去。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纸条上的字，然后善意地对我笑了一下。

说道：“你这个人！在外面等着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她的。”

我就这样地在产房门口的椅子上等着，已经午夜1点多钟了，门口的人几乎全走了。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早晨5点，我到产房门口，只听见里面呻吟和说话声，我焦急得坐立不安。9点多钟老大娘来了，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生了没有？”

“没有，”我摇摇头说道。

老大娘说：“怎么这样久？你还不快点给她准备点吃的，她出来好吃哇。”

过一会儿又说：“没关系，我有炉子，我替你做点好了。”

我说：“大娘，真谢谢你了。”

老一辈人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和这年轻一代红卫兵截然不同。

我想还是出去买点吃的东西好，天下起雨来。

老大娘说：“这儿有伞，你带着吧。”

我说：“不用，谢谢你。”

我一下子就钻进雨里，跑去买食物去了。回来时雨开始大起来，不一会儿雷雨交加。约莫 10 点 20 分雷雨停了，一缕阳光穿过云层射在窗台上，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背后的产房门一下子开了，听得婴儿哇哇的响亮的哭声。里面走出来一位大夫。

她对我说：“生了。男孩，6 斤 6 两，母子平安。”

这时，我才感觉到我是如此的疲倦，我真想睡一会儿。

小文被送出产房转到病床上躺着，我忙着给她拿吃的。老大娘走过来帮忙，并祝贺我们，问长问短，十分开心。小文很疲倦，东西也没吃完。

大家在床前说话，我在床边用头靠在床沿，说着说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看见小文躺在床上，也已睡着。我急忙为她准备吃的东西。她醒来后，胃口很好，吃得很香。

我根本没有办法只用一台自行车把她母子二人连同这些天以来我陆续搬来的各种东西运回学院去。第二天我回到学院到后勤部请求帮助，他们立刻就开给了我一张字条，叫我去车库要车，车库头头对我说，决定明天为我出一趟车。

我又骑车回到妇产科医院，护士把孩子给我们送来了。看见这孩子，一头浓浓的头发，他眼睛还没有睁开，身上并排写着父母亲的名字。孩子太娇嫩了，我不敢抱他。可小文用很熟练的医生动作，为孩子穿衣、擦身。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学院去领车，还买了一盒香烟，以便请司机抽烟。回到学院后，小文坐月子。我没有“学习”时，就抽时间骑车到小河里去摸鱼，到农村去买鸡和鸡蛋，到学院的奶牛场买牛奶，把牛奶稀释到三分之一浓度喂孩

子。我们虽然十分贫穷，但我已不再住教职员工第二宿舍，不再和那些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人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本身就是求之不得的幸福事。

每天下午回来，无论多忙、多累、多晚，回来后总是和小文还有我们的小宁宁在一起。这个小小的生命，使得我们陋室生辉，凭添许多欢乐。小文是个十分能干、又能吃苦耐劳的女性。坐月子的第三天，她就在家偷偷地起床了。看到我忙，她想尽可能地减少我的劳累。

我们小小的家庭，你敬我爱，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我清楚地明白，隔窗之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整日杀气腾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歌声、口号声响彻入云。我们的平静，将只是短暂的。这平静之后充满着危机。我向小文毫无保留地谈出我的看法，但她说她一点也不害怕，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她别无所求，什么也不怕。

果然，事情发生了，所不同的只是比我预料的要早得多。

6月15日这天早晨，我刚起床，小文也起来了，正在叠被。忽然听得外面楼梯发出巨大的响声，不一会儿就有急促的敲门声。我穿着一件背心，下面穿着短裤去开门，门刚开一点缝，就轰然一声，一脚踢开了。门外约有三四十个人，为首的全是畜牧兽医系的造反派，他们一涌而入。小文见事不对，一下子扑过去把孩子抱在手中，为首的一些人把我推到墙下，我刚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冷不防陈志方迎面就给我一拳，由于我没有防备，正好打在我的左眼上。眼睛被

重击，疼痛事小，主要是一下子看不见了，刹那间几个人上来抓住我。

只听得小文在一旁喊道：“五哥，不要动，不要还手，事情总会有个是非的。”

有人推开小文，我想挣脱保护她和孩子。他们却把我连推带打押出了门外。所有的邻居都出来看热闹，小文抱着孩子赶到门口。

她喊道：“五哥，穿上衣服再走，记住，不要还手。”

我说：“要抓人，难道衣服都不让穿？”

“不让穿衣服，光着身子带走。”刘铭却说。

另一学生造反派头头说：“让他穿上衣服吧。”

小文一手抱着孩子，一手递给我衣服。

他们把我带到学生第四宿舍一楼的一间北屋。室内光线很暗，几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开始打我，用木棍和铁条一顿乱打。这时我看见地上有一条短棍，几度想拾起来和他们打。但我咬住下唇终于控制住了自己。

听见有人说：“不要打头部。”

我一声不吭，也不叫喊，一直站着，时间不长，门打开了，专政队队长巩立武进来了，他是牧医系的学生。

他说道：“别打，别打，带过来。”

于是，我就被带到对面南屋，此屋光线明亮，室内已坐着十几个被抓来的人，都是教师和职工，有的相识，有的面熟。此时谁也不说话。来管我们的都是学生，去家里抓我的牧医系教职工都已不在场。

巩立武宣布“牛鬼蛇神队”成立（过去叫“专政队”，

现改用时髦新名叫“牛鬼蛇神队”)。巩立武叽叽哇哇地说了一大套。我双唇紧闭，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被专政的人都默不作声。他们放我出来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

我一人往回走，进门看见小文正在给孩子喂牛奶。她看见我回来，立刻放下孩子，过来搀扶我。

她问：“怎么样？五哥。”

“法西斯强盗！”我说。

此时我头晕目眩。她扶我过去，替我撩开上衣。

她惊叫起来：“哎呀！这怎么得了，我手边又没有药，怎么办？谁把你打成这样！快上医务所去吧。”

我说：“好吧，你就在家，我自己去。”

她一定要陪我一同去。到了医务所，医生刘成礼阶级路线分明，不愿给我看病。还是李大夫走了过来。

她问：“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

我说：“背部受伤。”

小文过来帮她一起替我撩开衣服。她惊叫了一声。

问道：“谁打你的，谁把你打成这样？”

我说：“不要问是谁，多给我些药，好吗？”

她含着眼泪，无声地给了我许多药。我们就回家了。

小文为我擦药、包伤。两行热泪。

我说：“不要哭，这一群法西斯强盗。”

家内被翻得乱七八糟，他们把我抓到学生四舍毒打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就抄了我的家。我这穷困的家庭有什么东西可以抄的呢？的确是什么也没有。

他们抄了，他们抄走了些什么呢？他们抄走的主要是书

籍，绝大部分都是我在学院图书馆借的，还有包括我们童年时期在内的珍贵照片，和我一直保存的小文给我写的信件，全都被他们抄走了！

但是他们也给我留下了，他们留下了些什么呢？

他们给我留下的是满室狼藉，留下的是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蔑视，对人的尊严的任意蹂躏和那铭刻于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心灵中的永恒的记忆！

满地都是书籍，我精心写成的生物化学讲稿，如乱纸一样满地皆是。我检也不检查全部扫到一旁，明天正好用来给炉子生火。

全院的抄家、游街，现在比已往都更为激烈地进行着。这一伙造反派，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认为有官可图，更积极了。过去被他们贴大字报揪出来的人，又全部再揪了出来。由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逼死了原来支持他们揪斗我们的党委书记叶华又重新揪出了众多的院领导一级的“走资派”，为自己往上爬扫清道路。他们喊着响亮的革命口号，隐藏着险恶的用心，要在这所谓的伟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一显身手，崭露头角。自以为甜果又将到手，但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错综复杂，好戏还长着呢。

自从抄了家，又把我打了一顿以后，反而平静无事了。一天中午我被通知去学生第四宿舍，进得门后听得隔壁有人说话。

一人说道：“吴苑新来了。”

另一人说：“抄吴苑新的家，啥也没有，穷得叮当响。就是那个老婆还不错，标准小娘儿们。”

另一人说：“把她抓来咕叽、咕叽。”

回到家后我什么也没说，暗地在门后准备了一条铁棍。但是，我想如今最好的办法，也许还是让小文带着孩子去重庆我的母亲处为好，眼下此地不可久留。

我毕竟年青，身体也结实。伤口和眼睛不到10天就好了。6月23日天气晴朗，小文不愿再坐月子了。我说去王陵玩，再给孩子照个像。于是，我们就抱着孩子出去了，碰见我们的人都说：

“哎呀！年轻人，还没满月就出来了！”

都来看孩子。小宁宁在他妈妈怀抱中十分可爱，一双大眼睛轱辘轱辘直转。

相对平静的日子不会太长。在这个所谓的伟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我们只是被人任意鞭打的羔羊。毫无法制可言，他们想起来了，就来收拾我们一通。

等他们再次想起来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就再次降临到我的头上。

第九章 审 问

我们每日都高度警惕着，我和小文约好了敲门的暗号是两长三短共五声。但我也十分明白，这完全无济于事。一旦他们来了，我一个人怎会是他们的对手，最好的办法还是安排小文带孩子离去，但全国上下哪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呢？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小文又只愿和我在一起，不愿离开。

她说：“五哥，我不走，我走了，你再受伤谁来为你上药？”

“嘘！不要乱说，不要尽往坏处想”，我说。

正在我们孤立无援之时，突然有一天，一位解放军来看望我们。我很奇怪，哪里会有解放军来看望我们呢？进得门后果然是省军区的一名解放军，是小文的表哥。他还带来了礼物，一小袋大米，这是极其珍贵的东西，还有

鸡蛋和糖果点心等。我故意出门去，以便让他们表兄妹慢慢攀谈。我回来后留他吃晚饭，他不吃就走了。

小文对我说：“这个表哥许久不见面，怎么打听到这儿来了。”

我说：“来了就好，有个解放军亲戚，也许使他们不敢乱来了吧！你留他的地址没有？”

“有的”，她接着说，“他说我们的孩子出身在这个好时代，应该给孩子取个好名字。”

当时已经给孩子取名叫先宁，小名叫宁宁。

“他建议取个什么名字呢？”我问道。

小文说：“他说现在解放军学习门合同志，所以最好取名叫吴合。”

我听后笑得直不起腰来，小文也笑得前俯后仰。

她说：“好哇，来五合点心。”

我说：“五合糖。”（吴与五同音）当时给孩子取名字追求时髦，总要取个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之类的名字。例如卫东、向阳、卫彪等等。教学辅助人员马文华家的孩子就取名马卫彪，后来林彪出了事，就改名叫马彪。

我们停住了笑，我说道：“先别笑，解放军亲戚来我家，好兆头，也许他们就不敢乱来了。”

小文说：“嘿，老远来个亲戚，谁也救不了谁。”

也许他的来访，确曾起过一点点好作用，因为他到处打听才找到我们。或许这就是他们没有来动小文的原因吧，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的一切都是听天由命。

一天，我在路上碰见了李新华，四周无人。

他问我：“你怎么样？还好吧。听说你遇到了不少麻烦，说是爱人生孩子了。我祝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说：“谢谢你，是男孩，你的情况还好吧。”

“科学院（他已调到农业科学院工作）那边现在没有你们农学院这边这么乱，也是够乱的了。但我们家却遇上倒霉的事了”，他回答道。

我说：“什么事？也被抄家了，是不是？”

他答道：“抄家是小事，大前天我爱人的哥哥被人打死了。”

“哎哟，是怎么回事呢？他参加武斗了？”

“不是，他怎么会去参加武斗呢？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大概是晚上9点多钟，从音乐学院回家，家里人还等着他回来吃饭呢，离家只有一条街了，不知道是谁向他开了一枪，打在肚子上，好像是从楼上窗口射出的子弹。大家一直等他，以为他是学校有事，今天不回来了。第二天早晨，别人说那边马路上有一具尸体，我们去看才发现是他，倒在地上血流一地，已经死了”，他回答道。

“哎！是谁打的呢，他有仇人？”

他说：“没有，没有，他怎么会有仇人，可能是有人在窗上练枪玩，打活动靶子打死的。”

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不报告公安局？”

“嘿！公安局！我们去报，他们说：‘我们也被造反了，我们报谁？现在这种事多得很，谁摊上谁认倒霉。’这就是公安局，公安人员的回答。”他向我说这番话时，脸色也气得发白了。

“真是的，城内这么乱！”我说道。

他说：“无事最好别进城。”

“进城？我行动不自由了”，我回答道。

他说：“我知道，大家都一样。以后有机会再聊吧，我得赶紧走了，多多保重。”

我回去后把这事告诉了小文。她说：“运动完了，这种事是会清查的。”

我说：“清查？这么多怎么清，怎么查呢？人都死了清查又有什么用。”

学院又发生了一件事。学生第四宿舍二楼，一位造反派学生去强奸女同学，正强奸时女生的叫喊声，惊动了七八位造反派，他们破门而入，想捉拿他。慌乱之中这个学生从二楼窗口跳下逃跑，不幸摔断了腿。

又有一件大事，是在学院后山的树林中，发现一名学生自杀，据说是一名归国华侨因为失恋自杀的。在这乱世之中，就只能是一个谜，听之任之，不了了之。

从传达中央文件起，“文化大革命”在学院中开始到今天，已快两年了。在这混乱不堪的情形下，仅以牧医系为例，我们来看看牧医系的教职工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此时的思想状况又如何呢？

牧医系的教职员工，现在大体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类，是被贴过大字报或进过专政队的人。他们每日心惊胆颤，小心翼翼，希望不要再整到自己头上来。日常生活起居言谈都十分谨慎，叫开会就开会，叫劳动就劳动，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都希望运动能早日有个眉目，希望自己

被诬陷的问题能早日有所澄清，希望早日会把一切都弄清楚，还自己一个公道。他们处处留意，不要出差错，对待毛主席画像、像章、著作他们都十分小心。这些人年龄较大，社会经历要多一些。总的说来大概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等待观望”。

另一类人，就是当初大胆站出来的造反派，这样的人，人数不多。牧医系教职员工中仅有两人，现在都成了忙人，成了矛头直接指向省委的参与者。他们回到系里时，所听到的多是一些“路线斗争觉悟高”的恭维话。在实质上，他们对牧医系的现在和运动的发展并不起太大作用。他们本人对原来系里的中下层党的领导，也仍然看作是领导，只不过在运动中暂时靠边站而已。

第三部分人就是反戈一击有功造反派。这一批人，人数众多。其中包括中、下层领导，党、团员和普通群众。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也是持观望态度，很少有人去参加武斗（参加武斗的多是学生）。绝大部分人的思想仍然视原来的领导为领导，认为不久他们仍会站出来主持系里的大小事情。这种思想状况，就是共产党中、下层组织之所以仍然具有权威的力量基础。

党的中、下层干部在路线上吃了一点亏，有的被戴了高帽子，游了一下街，但并没有像对待被抓出来“专政”的人那样，作为“阶级敌人”或“准阶级敌人”来对待，人们单独遇见他们时，仍然称呼他们为书记，除非和自己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矛盾，没有人真正愿意得罪他们。就是那一两名造反派自己心中也明白，将来掌权的还会是他们这些人。

在这第三类人中有少数例外，如刘铭和关山木，他们早已昏了头脑，自认为阶级出身好，老子天下第一，抓人整人都积极得很。如刘铭就说，他早已不愿在这“臭老九”成堆的地方呆下去，自认为高人一等，是“高贵的铁杆贫农”。他想调离农学院回他的家乡去工作。他对现实的不满，来源于觉得他手中没有他希望和“应该”有的特权，正是“昨怨布袄寒，今嫌紫蟒长”，横竖心中都是不满。如今“运动”来了，为了表现他那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加上那二流子的个性，于是就成了牧医系中作恶多端的人物。

现在这第三类人，即牧医系中的大多数人每天做些什么呢？写大字报，办《炮声隆》战报，抓人，抄家，开批斗会发言声讨，除此之外，终日无所事事，就是玩扑克牌，或以粗俗语言低级趣味寻开心。

“牧医系胡同”中公开把吕中义和胡朝芬的离婚，编些下流故事，讲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什么看书学习，提高业务水平，钻研科学早已成了“只有傻瓜才会那么做”的同义语。其中一些人早已不配作高等学校师资了，早就该作为品德败类清理出老师的行列，可是当时他们却是谁也惹不起的人物，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惹不起我躲得起”，可是我却躲也没处躲。

就在这乱七八糟的情形下，我又平静地渡过了几天。记得大概是6月29日吧，牧医系造反派叫我到教工二舍去，上得三楼，我结婚的新婚洞房305室就在这里。此栋楼为L型建筑。整个L型的一边，两面对应，约有10多间寝室都是住的牧医系单身教职工。中间这条过道，我们称为牧医系

胡同，外系戏谑地叫做“驴子胡同”。

我走进胡同内，看见第三间寝室门大打开，烟从敞开的门内逸出，因为一伙人在内，每人都抽着一只香烟的缘故。我走到门口，看见里面围着桌子歪歪斜斜地坐着五六个人。其中有所谓的铁杆贫农刘铭，此人是西北农业大学毕业生，很想入党而未得。若说解放前一些人争取入党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如今这些人削尖脑袋想往党内钻，他们的用心何在呢？当然就是为了“权”，为了向上爬，那一句“为人民服务”的口头禅，只不过是说起来好听罢了。

参加牌局的另一位是关山木，出身好的“快速”教师。此二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是驴子胡同中何其了得的人物！他们嘻嘻哈哈正在玩扑克牌，后面还站得有些人在看牌助兴。

我走到门口，他们用蔑视的眼光斜看了我一眼，嘴角叼着香烟。这时他们已经毫无高等学校教师的味道，一副流氓十足的派头。刘铭半抬头瞟了我一眼后，从叼着烟卷的嘴缝中吐出了一个字：“唔！”

他们继续玩牌，过了一会儿，他漫不经心地从叼着烟卷的嘴缝中吐字含混不清地说道：“站在那儿等一会儿。”

我不想惹他们，我有妻子和初生的孩子，万事忍为上，我退后一步站在门外等着，就像我过去看过的电影中，那卑躬屈膝的小当差，等着听候地主老爷发话一样。

过了好一阵子，大概他们的牌局告一小段落了吧，刘铭又换了一只香烟，说道：“叫吴苑新过来。”

我走到门口一句话也未说。刘铭披着一件外衣，懒洋洋

地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吸足了一口烟对着我的脸上吐过来。烟喷到我的脸上，又向四处扩散开来，一股难闻的烟味夹杂着消化不良的口腔的臭气，我不得不向后退了两步。

我说：“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叫我来就是为了向我脸上吐烟吗？”

他说：“吐烟？老子爱吐就吐，我还想揍你呢！”

我一忍再忍，回头对关山木说：“究竟有什么事？请讲。”

“你老实点！不是正在向你说话吗？”关山木说道。

我又向后退了一步，因为刘铭不断用烟向我吐过来。

我说：“有事请讲，有事请快说。”

刘铭说：“我们知道你这小子不服气。上次抄你家后，你说什么来的？”

我说：“嘿，事情已经过去了。家也抄了，抄了更好，抄了才会发现我什么也没有。”

他说：“你小子反动思想全在脑子里。”

我说：“刘老师，说话不要太欺人。我不想和你吵，凡事总得有个依据。”

“谁让你叫我刘老师？依据？老子还想揍你这个依据呢？”

我说：“打也打过了。还要想打？”

他说：“老子想起来了，高兴就打。你怎么样？”

其他人渐渐围上来。我说：“未必他们又要想打人？”我又向后退了半步。

刘铭说：“叫你来，就是检查你。不顺眼就揍你。”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说道：“若真要讲打，恐怕你不是个儿。”

他跳了起来，烟卷扔在一旁，但光跳又不敢往前来。我退到了走廊上。这时别的屋里的人都出来了，有人推我说：“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快回去吧。”

我说：“不是我自己要来，是他们叫我来，说是有事。”

一些人推着我说：“快走吧，快走吧。”

我就离开了。听见刘铭在后面叫喊道：“好小子，你等着！”

我回到家。小文正在逗孩子。

她说：“哦！爸爸回来了，叫爸爸抱抱。小宁宁笑了。笑哇笑，一个笑宝宝！过些时候还会说话呢！你说对吗？小宁宁。”

我坐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

小文问我：“你怎么哪？”

“没事”，我回答道。

她说：“你过来，过来呀！抱抱小宁宁看看有多重。”

我走过去，抱起小宁宁，用脸在小宁宁身上擦眼泪。

小文说：“你究竟怎么哪？”

我说：“没事，我去做饭去。”说完就到对面的公用厨房做饭去了。

下午，我去对面公用洗脸厅拿牛奶给小宁宁喝。当时除实验室有冰箱外，无家用冰箱。这儿原是学生宿舍，北面一间洗脸厅，许多水龙头一直漏水，无人修理。我就将奶瓶盖

严，放在漏水管的下面，靠流水维持低温，一瓶奶也可用两三天呢，当我拿起奶瓶，看见已经空了。

我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怎么奶没了呢？”

我问小文：“小宁宁的奶是今天上午才打来的，怎么全空了呢？”

小文说：“上午还有呢，都放在那儿的。”

我说：“这怎么办？奶没有了可怎么得了！小宁宁吃什么呢！”

一位邻居走过来对我说：“牛奶不要放在这里，打盆冷水常换着点，放到屋里去吧。实在没有地方放在我家去，要用时来取。”

我说：“这瓶奶哪儿去了呢？我可没有多的，孩子没吃的怎么办？”

邻居说：“刚才来了几个人，问这奶是谁的，我们说是你们的，他们就给倒掉了，说狗崽仔不许喝奶！”

我气得双目圆睁，用拳头击打墙壁。这究竟还让人活吗？

小文说：“快想办法吧！急也没用。”

我伸手拿起奶瓶，拔腿就往奶牛场跑。进得奶牛场，看见一个工人正在生气，大骂道：“……长得还没有我的卵子高，就背个鸟书包，出来造反来了。回去造你家老子的反吧！”

我看见我又来了。说道：“咦！早晨不才给你一瓶奶吗？怎么又来了？”

我说：“红卫兵给倒掉了。”

他怒气冲冲一把抓过瓶子，一边骂：“操你妈，我让你倒，我让你倒。”

他一边骂一边走到里屋，内有一大罐新鲜牛奶，咕咕咕地就给灌满了一瓶。

对我说道：“喝完了再来。”

我说：“钱，给你钱。”

他说：“不要钱！喝完了再来就是了。有的是奶！老子的奶不卖了！”

我背转身含着两眶热泪，跑步回家，小心翼翼地把牛奶交给小文。邻居正在和她一起发愁，前些时候，因受刺激太深，小文自己早就无奶，孩子全靠牛奶度日，看见奶拿回来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邻居说道：“快点给孩子喝吧，剩下的可得放好了。”

孩子正在呱呱啼哭，小文急忙把奶拿去烧开，又急忙倒出一部分在奶瓶中加上凉开水，盖上奶嘴自己吸了吸，觉得不烫了才递给孩子。小宁宁正饿得哭，两只小手向着天空乱抓，小文急忙把奶嘴递到宁宁嘴边，用手帮忙扶着奶瓶，小宁宁一下子不哭了，用两只小手紧紧地抱住奶瓶用力地吸吮，两只眼睛还骨碌碌地直转游，他在看妈妈呢。小文和我又都笑了。

晚上，红卫兵通知我到第四学生宿舍造反团总部去一趟。

我对小文说：“你在家，我去去就回来。”

于是，我就独自一人来到学生四舍造反团总部。这时天

色已晚。

听见有人在说：“吴苑新来了。”

又听见刘铭的声音：“这小子，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想杀人呢？”

我想：“不好，今天有大麻烦了。”

几个人走过来，都是我未教过的学生（动物生物化学是专业基础课，二年级学生才学），名字我一个也不知道。

其中一人冷冷地对我说：“进屋去！”他用手指了指门。

我又走进那间北屋，屋子很大，灯光很暗淡，窗上都挂有东西遮起来了。如今回忆起来，这间屋可能就是他们专门用作审问的，学院内许多人都在这儿挨过打。

我走进他们指定的屋内后，但见我的四周早已站了八九个人，手都背在后面，看不清楚人的脸部。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我欲夺门逃走，但是门已经被关起来了。八九个人不由分说，围上来就用棍子打。这一次比上次重多了。他们打了几棍子我仍然站着，突然一棍打在我的左肋骨上。我实在挺不住了，腰向下弯下去，他们就打我的背部。每一棍打下来我全身一阵抽缩。我一声不吭，用上牙把下嘴唇紧紧地咬住，用这个方法来抵抗打在身上的剧烈疼痛。

我从暗光中看见屋角有把椅子，我想去抓椅子。一棒打在我的耳根后部，顿时噙然一声巨响，我就面部向下倒下了。

他们就在我身上一阵乱打。我听见有一个人说：“不要打头。”

我紧紧咬着嘴唇，一声不吭，他们打了一阵子。

有人说道：“死了吧？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

他们停住了。用脚踢了踢，又把我翻过来。看见我还活着，有人笑了。

门打开后，说道：“滚吧！以后老实点！”

我站起身来，不扶墙就走出了四舍。后面两个人跟着我。

其中一人说：“这小子经打。”

另一人说：“我说不要打嘛，干吗打人家。”

我走到四舍拐弯处，他们见我能走就回去了。后面没有人了，我的勇气突然消失，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全身如针扎般的疼痛，耳中嗡嗡声长鸣不断，由于遭毒打时我咬着下唇忍痛，把自己的下唇也咬破了。这次毒打使我留下了腰疾，在我今天写这本书时，腰部旧伤仍在隐隐作痛。小文告诉我，打伤的骨骼会转成风湿痛，很难痊愈。看来我这一生都要带着这个纪念品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几个人走过来，看见有人在地上，此时天色漆黑。

也看不清楚是谁。一个人说：“你地上干什么？”

我说：“没事。”

说完我就站起身来，独自向着家走去。

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下，很难说出自己的心情。山冥阴雨，腥风残云，感慨万千。

沉 思

山冥阴雨忆往时，
梦回初春吐嫩枝。
腥风吹落梨花梦，
独对残云有所思。

后来，我的大哥读《沉思》一诗后，和诗一首。

原韵和《沉思》诗

晦暝烟雨止何时，
愁怅腥风摧嫩枝。
天道周星庾生问，
物极不反耐沉思。^①

我强忍剧痛走进门，小文过来扶住我。她问：“五哥，你怎么啦？”

我说：“小文，我不想活了。”

小文哭泣，我亦泣不成声……

她说：“五哥，你要走。我决定和你一起去。”

宁可站着死，不愿屈辱生！

我想以一死来抗争！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去了倒更清爽，安宁！

① 庾信《哀江南赋》：天道周星，物极不反。

● 沉 思

我的伤口疼痛不堪。这是一个我终生也不会忘记的彻夜不眠的夜晚……

小文和我商量了很久，还是决定自杀。如何能买到安眠药呢？这可是一大难题，小文说明天进城去试试看，也许能够想到办法。

第十章 “牛鬼蛇神”队成立

第二天小文独自上街居然买回来了一瓶安眠药，我打伤没有去“学习”。她进屋来，高兴而神秘地告诉我已经买到药了。当时要买到大剂量的安眠药很困难，也许因为她是医生，会编造出需要买药的理由吧。

看见她庆幸买到药的高兴样子，我感到震惊。

我说：“小文，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啊。”

她低头不语了。晚上约莫 10 点多钟，我俩下意识地把孩子安顿睡好后，一同坐到桌前。我去检查门是否已经插好。她把药拿出来，数一数共有 100 粒，一粒也不少，一人 50 粒。

她说：“50 粒足够了。”

“也许我需要 60 粒，40 粒留给你吧。”我

说道。

我俩抱头痛哭，良久。准备好纸笔后，就坐在桌前，由我来执笔留遗书。

我说：“小文，我对不住你。”

“不许你这样说，我们一起走，这是幸福。”她用一只手挡住我的嘴唇说道，然后她去找杯子，准备待我写完遗书后倒水与我同饮自尽。正在这时小宁宁突然醒了，并且哇哇地哭了起来。她立刻忘记了找杯子，过去抱小宁宁。

孩子的哭声，此时于我犹如晴空惊雷。

我说：“我们死了孩子怎么办？”

她说：“在遗书里写上希望他们带他长大。”

我说：“他们？他们是谁呢？这一群法西斯强盗？在他们的眼光中，我们的小宁宁是狗崽子，是牛奶也没有资格喝的狗崽子！还会带他长大？”

我们死了，明天这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孩子啼哭没有人管，他们还会到处宣扬说我们是畏罪自杀。

畏罪自杀！

我们有什么罪呢？我们曾经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吗？没有！做坏事的是他们！我们为什么反倒要自杀？

怕他们再来揪我，怕再挨毒打吗？

“不！我们应该和他们作斗争！应该活下去，勇敢地活下去！在斗争中死去，也要站着死。这样死不是太怯懦了吗？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太不值得，太不应该。”

我说：“不！小文，我们不死，我们不能死！活下来，活下来为了我们孩子的成长。活下来为我们的生存去斗争！”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小文说道。

她依偎着我，哭得好伤心……

我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也无法回答她的问题。

这是一个丑恶践踏善良，野蛮讥笑文明，愚昧战胜智慧，黑暗吞噬光明，暴力欺辱和平的时代。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岁月！我们无路可走，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小宁宁救了我们，那要活下来的想法支撑着我们终于没有选择自杀。

小文又该回单位去了。但她的离去日期总定不下来，今天定下来了，明天却又自己推翻。每次一说到要走总是泪流满面，正在这两情依依难舍难分之时，红卫兵又给我们下达了一道命令，限令她必须在三天内离开，否则就要采取革命行动。

第三天早晨，为避免再次遭到打、砸、抢的“革命行动”，小文只得依依惜别，想不到此一别竟是三年多我们夫妻未见面。

她左肩挂了一个书包，右肩挂着一个大布袋，都装满了孩子的食物、小衣服、尿布等等物品。抱着小宁宁，含着两眶热泪离去了。我给了她我所有的钱，看着她离去时凄凉的背影，我说不出一句话来……

早在许多天前我就给母亲去了信，请她接小文和孩子去重庆。

这时在美国的大哥，仍然继续给母亲寄钱来，数目虽然不多，但对母亲来说却是救命钱。母亲自幼节约成习惯，生活精打细算，所以总是有点小小积蓄存在银行。政府对侨汇

一贯采取优待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确保侨汇存款不受侵犯。红卫兵前来抄家，母亲身上的钱全部被抄走，把她侨汇存款折也拿走了。但他们去银行却取不到款，因为钱是侨汇存款任何人不得冒领。所以大哥寄给母亲的钱，为数虽不多，却是母亲的铁饭碗，打不破也抢不走。

当母亲知道了我的困难后，立刻寄了100元人民币给小文叫她带孩子去重庆。100元相当于小文和我两人月薪的总和。她在天津收到钱后立刻就去了重庆。在母亲的疼爱下小文和孩子在重庆过着一个相对稳定而“幸福”的生活，她不断地寄小宁宁的照片给我。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不会立即拆开，总是在四周无人时才静静地阅读，享受信中带给我的情爱。

小文走后的第三天，“专政”工作大大加强。原来叫做“专政队”现在改称“牛鬼蛇神”队。前些时候“5·21革命红色风暴”打死路矣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早在1967年11月27日江青就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在1968年2月21日，8341部队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实行军管，进行“斗批改”“狠抓阶级斗争”总结出了一套经验。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把《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的经验》呈送中央将该件转发全国，并要求全国各地区“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此时农学院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当然就是在他们的发动之下展开了。

当天，我向劳动集合地点走去，当我正走在学院中一条很美的林荫道时，迎面走来两名牧医系二年级的学生，我走

近他俩时，其中一名学生突然拿出一条短棍，对着我胸部猛力戳了过来，一下子正戳在左胸的第四、五肋骨间。我顿时痛得两眼圆睁，张着嘴喘不上气来，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腔，说不出一句话。想必是巨痛使得我脸形扭曲，很难看吧。

其中一名学生说道：“哎哟，啧啧，还没碰上就挤眉弄眼的，到底是当教师的会装蒜，你一定是说好痛吧？乖乖！我们好同情您啊！哈哈哈哈……”

他俩嘻嘻哈哈地走开了。

我一人蹲在地上约半个多小时才缓过气来，捂着胸部，脸色铁青，勉强来到劳动集合地点，却又遭到领队点名的红卫兵，用尖锐的“阶级斗争”眼光的分析批判、教训和责骂……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我强忍着胸部的疼痛劳动完毕后回家，走在路上，正逢对面走过来几个学生，手里提着一桶糨糊。这时的糨糊当然不是用面粉作的，人还没有吃的呢，糨糊是用劣质植物粉加强碱溶化而成的。他们手里拿着刷糨糊用的扫帚，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冷不防一个人突然用糨糊扫帚对着我的脸上一刷，火碱糨糊进入眼中，顿时我就看不见了，我用双手捂着脸，两眼疼痛得使我趴在地上。而这一群我素不相识的人，却围着我哈哈大笑，比看一场滑稽戏还要开心。并且争相继续向我的头上、身上刷糨糊，以此取乐。

他们玩够了，看热闹的人也看够了走了。我把内衣袖拉出来（因外衣上全是糨糊）擦眼、擦脸。我像一个盲人一

样，摸索着往回走……到寝室摸到洗脸室用水洗净。但是眼睛仍然疼痛，我又是彻夜不眠。漫漫长夜何时旦？

寒 夜 吟

调寄玉楼春

幽恨倩影不成眠，
冷窗陋室孤衾寒。
血雨凄风万民苦，
劫里众生有谁怜。

寂寞更兼寒空月，
芳菲尽歇奈何天^①。
我欲豪饮发狂吟，
哀歌无涯夜无边。

次日上午，关山木又带领一伙人强迫养马学教师文成之，动物学教师胡朝芬，畜牧学教授周谷中，兽医张雨英，养猪学教授毛立广，还有我共八九名教师游街。他们连推带打强迫我走在排首，哈腰敲铜锣，每敲几下就得大声叫喊一遍：“我是小毒蛇。”如叫喊声音不大，哈腰不深，他们就重重地击打头部。从学生宿舍区，到教职工住宅区，再到商店，又到西城路街道上。在西城路更有许多牧场工人和家属都来看热闹。他们还特意将身材高大的文成之和十分矮小的

① 芳菲尽歇：《离骚》“恐鶉鴒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胡朝芬用绳子拴连在一起，恶毒地诬蔑这是大男人和小老婆，极尽下流嘲笑之能事。

这所谓的游街，其实是种极其残酷的恶作剧。游完街后，被游街的人常常被打得青一道紫一道，满身唾沫和污物。所遭受的人格上和精神上的侮辱令人愤不欲生。而这些所谓的“革命派”却是喜笑颜开，整人取乐。

在“牛鬼蛇神”队中，红卫兵的管制越来越严格，“牛鬼蛇神”也越来越多。除了原有的早已被专政的教授、专家、学者和教师外，老院长也被抓来了。各系都有各自的“牛鬼蛇神”队，老院长因为过去是学畜牧的，故而放在畜牧兽医系的专政队中，牧医系“牛鬼蛇神”队由出身于苦大仇深的牧医系学生、红后代巩立武任专政小组组长。这是一个何其了得的位置，巩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牧医系的“牛鬼蛇神”队办得有声有色，每天集合后首先就得集体向毛主席挂像作低头认罪的仪式，然后哈腰背诵规定的10条毛主席语录。过去从电影或戏剧里常常可以看到老师叫学生背书的镜头，而今天却是年青人叫老年人背书，不会背的轻则受到批评，重则挨打。

有一天巩立武命令老院长背诵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条。老院长年龄大记忆力减退。

他背：“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是把一个“的”字给忘了。

我站在他旁边十分着急，连忙轻声说：“的，的”。

老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

巩立武发现了，对我喊道：“吴苑新！你站出来，到处捣乱搞破坏，都是你。”

“×××（叫老院长），你重新背。”

老院长在背诵时仍然漏掉了“的”字。

巩立武伸手就给了这位慈祥的老人一记耳光。

骂道：“混蛋！你他妈的毛主席语录还敢篡改！你大概不想活了是不是？你好大的狗胆！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条你都不会背，你说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什么？”

然后他走到我的面前大声地喊道：“你背！”

我一口气以极快的速度背了下来。

他说：“慢点，慢点。都、都、都说那么快谁听得清楚。”

我又一字不差背了一遍，他考我另一条，我还是一字不差背了出来。

他说：“唔，还可以，回列去。”

我回去站在老院长旁边。

我说：“请问红卫兵，我们可不可以考你的毛主席语录？”

老院长急忙拉我的衣角。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转身走开了。在旁边无人时老院长轻轻地对我说：“小吴，你不要惹他们，当心他们又要打你。”

这时候的红卫兵比以往更为残酷，停发我们的工资，每人只给 20 多元的生活费。每天劳动，背语录，要求随叫随

到，把这一批所谓的“牛鬼蛇神”折腾个够。但是在背语录这件事上他们很少再叫我，老年教师是他们整的对象，因为老年教师记忆力不好，背不出来。

有一天，从早晨8点开始集合、背语录、批斗、劳动、“学习”，一直折腾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才回到家里，真是累得筋疲力尽。我胡乱吃点东西后，躺在床上立刻就睡着了。熟睡中听得急促的敲门声，我以为又是抄家来了。开门后看见一位红卫兵态度十分紧张。

他对我说道：“赶快！到总部（即第四学生宿舍）紧急集合！”

我一面穿衣服一面跑。

心想：“这样紧张未必是战争爆发了？或者是对立派进攻来了，要拿我们去上阵？”

当我跑到第四学生宿舍门口时，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个学生在一把椅子上半躺着抽烟玩。

我以为大概是我跑得快，别人还没有到吧。

于是，我就站在那儿等，大约等了20来分钟，看见又跑来一个人，也是一面跑一面扣衣服。当他跑近时我认出来是张老师。

他急促地问我道：“什么事？什么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来了都快半个小时了。”

我便继续站在那儿等着，又过了10多分钟仍不见动静。

张老师对我说：“你过去问问，是什么事？”

“我们已经按时到了，有什么事他们自然会来告诉我们，等着吧。”我回答道。

又站了大概 20 多分钟，这时又急急忙忙来了好些人。

“你还是去问一问吧，也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来了。”张老师又对我说。

“好吧，我去问问。”

于是，我就走到学生宿舍门口，看见两条长凳上吊儿郎当地坐立着几个学生，每人叼着一只香烟。他们的举止动作使我想起了解放前在上海滩看见的流氓，他们三五成群逗留路旁，拉帮结伙，吃喝嫖赌，打架斗殴。解放后这种人已绝迹多年，然而今天我看到的这些红卫兵确实与这些流氓毫无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当年在我年少之时，听从父兄和师长教诲，见到这种人时，则敬而远之。不与这种人为伍，躲开就是了。但在今天这号子新人，却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顶头上司！学者、教授、专家反倒成了所谓的“牛鬼蛇神”！

我站到他们面前说道：“我们已经来了，请问有什么事？”

问了两三遍后，他们才噗嗤一下笑了起来，其中一人吸足了一口烟，悠哉游哉地在灯光下对空吐出了一道长线。

然后半搭理不搭理地说道：“唔，回去吧。”

原来他们是闹着玩解闷的，回到家中正是午夜两点 40 分。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

有一回，我们已被折腾了一整天。回来时天已全黑，筋疲力尽独自一人回家。这时小文已经离去，这个家就不再是个“家”了，只不过是睡觉的地方而已。至于每天当我离开时是否锁门已毫不在乎，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偷可拿。抄家于我有如风刮墙头草一掠而过，一无所有。我最珍贵的生

物化学讲稿都已扯得稀烂，生炉子用了，还有什么更为宝贵的呢？锁门只是个习惯而已。走廊灯光似豆，我拿出钥匙开门，用手一摸门上粘粘糊糊的臭不可闻。我急忙去打开对面厨房的灯，才看清原来门上糊满了大粪，连钥匙眼中也塞满了。他们的恶作剧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算个什么“革命”呢？这究竟算个什么革命呢？

我用两个指头尖拿钥匙开了门，再到对面洗干净，胡乱弄点吃的就睡觉了。门上的大粪我并不理睬它，关上门也闻不见，只是每天开门更加小心罢了。门上有了大粪倒也有好处，那些半大孩子就再也不到这儿来打闹了。我乐得有个“安静”。

另一日我被分配与图书馆苏至清一起劳动掏马葫芦，即清除下水道的脏物。广播中又放出赞扬阿尔巴尼亚的伟大领袖霍查同志伟大功绩的声音。

苏至清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道：“什么伟大领袖，霍查是个独裁者，弹丸小国也搞什么个人崇拜！”

我急忙看看四周，向他说道：“不要去说这些，不要评论这些与我们无关的事。我们事实上也不清楚，评论也无益。”

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继续不断地骂了许多话。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感到后悔向我说了这许多。小声告诉我前些时他曾企图在图书馆里上吊自杀未遂。

我说：“我也曾想死过，但继而觉得自杀是怯懦的表现，绝不能自杀。”

“人要想死，就说不上是勇敢还是怯懦了。”他说道。

接着他就向我讲了 1957 年他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改了 5 年，尝尽人间辛酸差点死去。以后摘掉右派帽子，却又是“摘帽右派”，快 40 岁了也找不到爱人，这次运动胡里胡涂又被揪了出来。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痛快。

我安慰他，并说了许多话，鼓励他要活下去。

他说：“我看了他们给你写的大字报，全是胡扯。”

我俩一面劳动一面谈心，渐渐就成了好朋友。

最后我告诉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你向我讲的话，我绝对不会向第二个人讲。骂霍查这样的话，今后不要再说，说也无用又何必说它呢。”

我俩虽成了好朋友，但在强大“阶级斗争”的压力下使今日的谈话又带给了我新的麻烦。这是后话。

1968 年 8 月 26 日毛主席发表最新最高指示：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就在这一年的 8 月末，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农学院，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坚决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一天，我被叫去向两位来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师傅介绍动物生物化学课程组的情况，看来他们是每一个教研室和每一个课程组都要看一下的，以便于领导我们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和进行教育革命。

我被叫到课程组等着，工人师傅在党总支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他们看完其它的课程组，最后来到了实验室门前。我要带他们观看那些早已无人管理的仪器设备和各个房间，先看动物生物化学实验室，再看准备室和研究室。在看实验室时工人师傅问道：

“这么大一间屋子，又有这样大的台子和这么些水龙头是干什么用的？”

我说：“这是学生上实验课用的。”

他问：“什么是实验课？”

“课堂上讲过的理论，一些可以在实验中得到验证，比如……”

“什么是实验？”他打断我的话问道。

我答道：“生物化学是生物和化学两门学课之间的科学，实验就是……”

他说：“不要讲这些。”

我看了书记一眼，他毫无表情，我就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这儿每次有多少学生上课？”

我说：“每次 15 人到 17 人，一个班分成两次上，人少便于老师指导。”

这位工人师傅一直和总支书记一起十分亲切地交谈。我

只是远远地站着，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回答时，我才说两句。我像一个附属的，可以忽略的小零件，他们需用我时才来拨弄一下。

看实验室时工人师傅没有说什么话，然后就是看准备室。准备室中有各种化学试剂，教学用仪器。我原以为他会问这些仪器的用途。

没想到他却向我说道：“准备室？有什么好准备的？”

书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工人师傅等着我回答。

我说：“学生上课用的化学试剂要在这里配制，仪器也在这儿检查，然后再拿去给学生使用，实验动物要……”

我话还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对着党总支书记说道：

“准备，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己没本事还有什么好准备的？教师上课前，先到这间屋里放几个屁，把屁放了再去上课？”

听了他的话我真想笑，但我忍住了。党总支书记看了我一眼，我把脸转过去，装作做别的事情。

工人师傅又说：“准备，完全是修正主义那一套。”

他一边说一边就和党总支书记一同走出了室外，其余的他们不想看了。

我独自一人站在实验室门口，茫茫然不知何所事事。站了好一会儿，轻轻地把房门锁上，慢慢地离去。

我在纳闷：“领导教育制度的改革？领导教育革命？这样的人能行吗？”

然后我又觉得自己好笑，现在连我是不是反革命分子，

这生死攸关的大事还没弄清楚，还关心什么教育革命呢？也真是可笑。

自从“工宣队”进驻学院后，高等学校必须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造。领导班子重新建立，所有的教师都要来一个大甄别，每个人的历史都要重新来一次大审查、大交代，人人的思想都要进行一次大革命。以往学院的办学方向，乃至校址的选定等等，全盘都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彻底推翻，来一个大破大立！

要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要扔掉旧农学院这个包袱，大破才能大立。于是一场步行王庄 500 里的号角就此吹响了！

第十一章 步行王庄 500 里

在工宣队的领导下，1968 年 8 月 24 日，农学院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造反派头头朱为政任革委会副主任。各系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牧医系党总支部书记由胡建华担任，原总支王立成书记改任副职。

军宣队前些时对大学下了个“定义”：所谓“大学，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学”。既然是大家都来学，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把“大学要办到腿肚子上”的口号，而不是办在城市中，尤其是农业大学。虽然农学院并不是在城市中，而是在一个有山有水适合办学的 C 市郊区。但是，工宣队要坚决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办学路线”，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革命办学路线坚决贯彻执行的决心，表达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全院师生必须下到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彻

底改造世界观。于是，1968年9月全院师生员工拉起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学习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步行500里到王庄地区进行斗、批、改。这在当时叫做“拉练”，带有“学军”的意思。每人背着行军式行李，四人一横列，排着长队，队伍的最前面高举着毛主席肖像，打着鲜艳的红旗，锣鼓喧天。由驻院工宣队带领着，整个学院全部按军事制度编排。每系称为一个连队，每连前面举着连队队旗。如农学系、园林系、农业经济系、畜牧兽医系、农业机械化系、土壤农业化学系、植物保护系、水利系等等，分别为一个连队。故而改名为农学连、园林连、农业经济连等等，依次类推。各系主任有的下了台，有的进了“鬼队”，连长分别由工宣队任命的学生担任，都是造反派头头。连以下分为班和排等军事单位。每个连队均附设管制着一个“牛鬼蛇神”队，简称“鬼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人，他们是“鬼”，是需要改造的“坏人”。事实上则都是各系的教授、讲师和在职或退休行政干部，以及学院的院长、副院长，还有“右派分子”，虽然都是所谓已经改造好了的“摘帽右派”，这次却又全部重新揪了出来，还有与旧社会有所牵连的人，还有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也有平常言论中被抓住了一些所谓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这些人不许佩戴红袖套，更不许佩戴毛主席像章。每人胸前都用一块白布写上自己属于哪一类坏分子。白布条一律规定戴在胸部右边，以示属于右派，因为他们自称是“左”派。

走在“鬼队”两旁是专政小组的红卫兵小将，手持短棍或皮带，以便随时对“鬼队”采取“革命行动”。

革命师生（即凡是当时未被揪入“鬼队”的师生之总称）每人手举一本红宝书，“牛鬼蛇神”（即“鬼队”中戴白牌的人）不许举，但是必须随身携带，以便随时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牛鬼蛇神”白布条上的名称，由革命小将来确定，社会上的坏人共有八类，那就是：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分子）、坏（坏分子）、右（右派分子）、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务汉奸、反动会道门。这一解释登在1968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加上一个“臭知识分子”，正好是第九位，所以当时即被戏谑地称呼为“臭老九”。这正好和当时上演，每人必须要看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老九同排行。于是，人们就对知识分子戏称为“臭老九”。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称呼。

但“臭老九”不便于用来对“牛鬼蛇神”命名，至少其意义含混不清，所以得有些“正当理由”才好。于是，农学院老院长因早年留学美国，故而定名“美帝狗奴才”；水稻专家李伟，小麦锈病专家章嘉仁，就定名为“反动学术权威”；名兽医张雨英，因参加过国民党，定名为“历史反革命”；动物组织学教师胡朝芬是基督教徒，就定名为“反动会道门”；养马学家文成之，早年留学日本，就定名“大汉奸”，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我呢？在被揪出来的教师中我的年龄最小，任何组织派别也没参加过。所以就根据给我贴过的大字报的标题定名为“小毒蛇”，但是不久后，又给我改名称为“现行反革命”。以后又由于我的大哥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于是又称

我为“后补汉奸”。我找到当时系党总支部书记发问时，我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也被造了反呢，我到哪儿去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的问题将来自会解决，不要和群众对抗，给自己造成更大罪行”。

每个“牛鬼蛇神”都被强迫戴上了一个白布条子，上面写着各人的反动名称。被强迫戴上这个白布条子都有着不同的痛苦经历。或被群众围攻，或被拳打脚踢，棍棒交加；或被戴高帽子游街；或被进行现场批斗。在批斗会中有的被强令作“喷气式”（批斗和游街时双手被向后上扳，头朝下按，长时间哈腰的一种刑罚），有的被勒令当“缩脖乌龟”（强迫人举手缩颈的刑罚），或是“踩高跷”（强迫站到高凳上的一种刑罚）……

当我们正集合在学生第四宿舍专政队办公室门前，被检查胸前的白布条子时，忽然看见一些学生，手持木棍气势汹汹地向房舍的一端跑去，接着就听见打人声、喧哗声和喊叫声，不久见农学系的一位教师被挂上大牌子押了过来。稍后得知，原来是他拒绝戴白布条子。不但挨了一顿毒打，被强行戴上，而且还加挂一个沉重的大牌子，用铁丝挂在颈子上，铁丝嵌入肉中钻心似的疼痛。

一个管专政队的学生对我们大声宣布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谁敢乱说乱动就打倒谁！”

总之，最后每个“牛鬼蛇神”都被强行戴上了这个白布条子，上面写着似乎永远没法洗脱的罪名，这是一种极大的污辱。

我深知这个白布条子的分量。只不过有一点使我想不

通，在土地改革时，被戴上这个白布条，是土改工作队以你家拥有土地的数量除以你家的人口数而得出来的结果。依地区不同达到某一土地占有量的是地主，次之是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或贫农，贫下中农就是革命依靠的中坚力量。大凡贫农或下中农，尤其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会被提拔重用当干部。当时总还有个土地的占有数量为依据。但是，今天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戴上白布条子的依据是什么呢？反正只要被贴了大字报，被揪作“牛鬼蛇神”就必须戴上白布条子。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和他们自己的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当时的农学院全体师生，就这样排着队，在驻院工宣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向着王庄地区出发了。留下了一座庞大的，被人早已眼红，欲抢先占住的空空的农学院。虽然也曾留下少许学院后勤部的工人，来看管这所已根本无法看管的学院。

小偷小摸，大偷大摸，拿农学院的桌椅板凳，破坏或拿走教学仪器，早已是司空见惯，算不得什么事了。学院附近方圆 40 里都是农学院的用具、器材、物品，没有人管得住也没人可惜。

这支奇怪的，有着如此鲜明“阶级划分”的队伍，其大部分是学生，其中有壮志凌云的“造反派”，也有反戈一击有功的原“保皇派”，现在也已变成了“造反派”，兴高采烈的是所谓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红后代”。阶级出身不好，“黑五类”子弟学生貌似欢乐，他们的心中却犯着嘀咕，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疑虑，那些还没有被揪斗的教师

和行政干部，茫茫然地跟着走；另一类则是低着头，无脸见人的戴着白布黑字条子的“牛鬼蛇神”们。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呢？正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队伍去王庄，必须路经 C 市。在经过市郊时道路两旁已有不少人围观，进入市区后，两旁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交通为之阻断。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昂首健步，高举“红宝书”，洋洋得意地高唱着毛主席诗词歌：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紧接着又唱一首又一首的革命歌曲，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以及“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鬼见愁”等等“革命歌曲”。在唱歌曲之间掺杂着呼喊“革命口号”。诸如：“一定要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等等。

“牛鬼蛇神”们则低着头，默不作声，只是跟着向前走。道路两旁围观的人群，看见革命小将的队伍走过来了就鼓掌欢迎，人声嘈杂。见到“牛鬼蛇神”的队伍过来了，大部分是默不作声，少许人是嗤之以鼻。但不少孩子们则是叫着跳着向我们吐唾沫、扔石子和手边能临时找到的一切脏东西。

我隐约听到有人指着议论：“这个人这么年轻怎么也在‘鬼队’里？”

有人回答说：“一定是个强奸犯。”

又有人说：“你看不明明白白的写在白布条子上的吗？他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定是个杀人犯。”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打！”于是，石子儿、脏物、唾沫向着我如雨点般的打来。但他们不容易打得很准，因为我们是四个人一横排。在“牛鬼蛇神”两旁还走着看守我们的红卫兵革命小将，我咬着下唇，手半握拳，继续一步一步在所谓的“毛主席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红太阳温暖的光辉照耀下，在‘向着无限美好的未来’，‘迈步进军！’”

我心中在想：这就是在1947年，我青少年时代曾幻想过的“理想社会”？当年“4·21”学生运动的情景，又一次涌现在我清晰的回忆中。那时我们高呼着口号：“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温饱”！“反饥饿”！“反迫害”！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想起了当时学生运动中甚为流行的歌曲：“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做工啊，没人给你当牛羊。大鲤鱼哟满池塘，织青布啊做衣裳，年年不会闹饥荒。”我热情、天真地对新社会充满着幻想，对新中国充满着憧憬。我领队参加游行，在学生运动中我加入了地下进步组织

纵横社，偷读马列主义书籍。

所换来的就是今天这个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50 年重庆市刚解放时，我和同学们跳跃欢唱着：“天底下有一个光明的国家，那里没有束缚和欺压。”这就是“没有束缚和欺压”？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来抓去，把我们都抓成了阶级敌人。这个所谓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就是不由分说地要人们排起队来，手举“红宝书”，每日无数遍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们就得排起队来，每日无数遍地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什么是“罪”？我犯了什么罪？我们犯的什么罪？

哪有这样没有法治程序，就给一大批一大批人随便定罪的？

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个社会的好坏要看其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展生产力。现在国家搞得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挑起这一批人去整另一批人，人民生活搞得这样糟，却还呼喊什么万寿无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怎么可能万寿无疆呢？……

当时，我实在想不通。

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挨着唾沫、石子和脏物的打，走出了这座我就兢兢业业教了已近 10 年书的城市。

我也像我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心路历程。远在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举世欢乐，中国向何处去，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拭目以待的大

事。1945年8月，这时我还只是在重庆市的一个未成年的初级中学学生，听得父兄谈及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到重庆来与蒋介石谈判，并读到他填的词《沁园春·雪》，这是我初闻毛泽东的名字。此后未成年的我就和同学们一道开始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学生运动，冒着危险偷读马列主义书籍。1949年我们热情地迎接了重庆解放，我热情地盼望毛主席领导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却一次又一次增加了我的疑问。今天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修建毛泽东塑像，天天歌颂毛主席红太阳光芒万丈，万寿无疆时，我的心路历程却走向了反面，进入了最低谷。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疑问。眼前发生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队伍穿过市区，又来到了市郊。当我们渐渐地走远了，追赶的小孩被劝阻回去。一声号令由队伍的前面传过来：“原地休息！”

老院长和其它牧医系的老年教师都已经走得很累了。大家都戴着白布条子，默默无言地坐在地上。公路两旁是无边的肥沃的土地，种着高粱和玉米。公路两侧有一条水沟，我这时口中干渴难忍。一个人生活在这种情形下，也就不在乎什么卫生不卫生了。于是，我便滑下公路，用手捧起脏水欲饮，突然两名红卫兵小将跑了过来，对着我就是一脚，差点儿把我踢到水中，然后两人就像抓鸭似地把我抓回了公路。其中一人对着我肚子就是一拳，说道：“你想死哇，那容易！”

好像是关心我的健康呢，专政小组长走过来假装和气地对我说：“凡事都要报告，这是纪律。”

我猛一转眼，看见老院长和其它老教师好像是在微微摇

头，似乎是在暗示说：“你要忍耐，不要乱来”。

这时前面又传来了命令，各连队分别开“行军现场批斗会”。于是，各个系都立即有红卫兵来抓人，我只不过是他们认为的一条小毒蛇，并无太大兴趣。他们把“历史反革命分子”张雨英抓了出来。据说张雨英是国民党时期的军队兽医，大概有校级官衔。解放后经过肃反、镇反运动（1951年，肃清反革命运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早已审判定案，留职使用，工薪有100多元，相当一个一般教授的水平。张雨英老实地低头站在牧医系连队的前面。大概是大家都走累了吧，口号声喊得有气无力，整个批斗会不过四五十分钟。前面又传来了命令：“大家可以吃饭。”学院后勤车来了，带来了食物，还有水喝。革命师生和“牛鬼蛇神”分别做完了敬祝万寿无疆和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仪式后，就开始吃饭。当然是革命师生先吃，“牛鬼蛇神”排后，领饭时一位红卫兵小将对我说，这是对我们施行“仁政”。

吃完饭后继续“行军”。队伍早已不那么整齐，带领呼口号的人换了好几次，吃力高声地带领着呼喊口号，但跟随者却像泄气的皮球鼓不起多大劲头了。70多岁高龄满头白发的蚕学专家“反动学术权威”李玉铃，大概已经无法再继续步行，各系都有不少这样的老年教师，被准许由红卫兵看管着登上后勤车。老院长被恩准许可不背行李。一番整顿后，这支如一条困倦的长蛇“队伍”，又在这行人稀少的公路上，缓缓地向前进发。“行军”途中各连队啦啦队互相挑战，比赛唱歌以提高士气。

大约下午六七点钟，到达了早已由后勤部联系安排好的

宿营地。“队伍”的行程由农学院出发，经过市区到电缆厂接受该厂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时大家同声背诵毛主席语录。为明白各条语录的段落，这儿加上数目字，当时只是连续同声背诵，不报数字：

(1)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3)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4)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5)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6)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7)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8)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9)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

要反对。(10)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大声地背诵，谁的声音不够大，头上就会挨上重重的一击。因为低着头，挨了打还不知道是谁打的，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打的。背完了这 10 条语录，一些老年教师几乎腰都直不起来了。加之一天已步行数十里，哪里还有食欲吃饭。

吃完饭后，“牛鬼蛇神”被分为二人或三人一组，去清理当地的所有能够找到的厕所、道路和公共场所。革命师生也都出动为当地打扫清洁，这是八路军作风。所不同的只是革命师生是自觉的，而“牛鬼蛇神”是被管制劳动。革命师生人多，且分配的劳动量相对较少，清洁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立刻分成队或组开会，并不断从正在劳动的“牛鬼蛇神”中抓人去进行批斗。“牛鬼蛇神”的劳动量相对较大，我和另外一位教师被派去清扫厕所，西北地区农村的简易厕所，即一人高的墙里面一个坑，上面搭上几块木板。里面很脏，我俩一人一把铁锹，从土墙外面开始连土带粪便一点一点地向里清理，然后又从别的地方取来新土将其填平。清出的粪便集中在一指定地点堆成一堆，令其发酵，到了明年加土混和打碎，施到地里便是上等农家肥。

在我正在劳动的过程中，突然来了 10 多个红卫兵小将，把我叫到一旁。我被围站在中间，他们怒气冲冲地发问，一定要我交代在今天的“行军”途中我在想什么？尤其是在市

内行军时想了些什么？我知道他们是来找岔儿的，冷静地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想”。他们完全不满意我的回答，甚至又要动武打人，而且再三逼问。我仍然十分冷静地回答道：“我什么也没想，就是肚子饿了想吃点儿东西。”几位红卫兵忍不住笑了起来，大概是肚子饿了他们也有同感吧，所以，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他们不但要控制你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控制在想什么。这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斗私批修”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就是把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地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做到对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忠诚、无比热爱。讲师张国栋解放前是在孤儿院里长大，在一次教师的学习讨论会中，要求每个人都要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时，他发言说：“我解放前是在孤儿院里长大，当然是无产阶级啰，虽然现在在是讲师，但也用不着‘脱胎换骨’，扒一层皮也就可以了。”逗得满场大笑。

当天，约莫9点多钟，接到命令去睡觉。大家进入“鬼屋”，又一起排队低头哈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挂像低头认罪，照例重复背诵那10条语录，然后各自上床，红卫兵守门看管，并不时入内检查。我和衣而卧，室内无人说话。我听见隔壁有打人的吆喝声，呻吟声，又是在私设公堂。

第二天清晨起床，第一件大事就是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样的仪式是每天起床后，睡觉前，三餐饭前，每次开会前，任何集会上都必须要作的。“牛鬼蛇神”若是有任何小动作做错，均有可能立即遭到拳打脚踢，或事后的专场批斗会。我每天跟着重复这些万分无聊的动作，而在心中

却已萌发了反抗的种子。

“行军”、劳动、挨批判、被斗争、背语录、写交代，每日的疲劳和痛苦真是难以形容，但夜来躺在床上却睡不着。古人云：“士可杀而不可辱”。但这些所谓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是“士既可杀又可辱”。

只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无所不为，并且所做的一切，他们自认为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永远正确。

从 1949 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我都经历过。但我自己不是被整的对象。加之年轻，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理解不深，不明白其究竟。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整对象，进入“鬼队”。这才使我能够看清这个时代的另一面，看清这个“万寿无疆”的本质。

这次运动来势汹汹，打击面大于以往任何一次运动。手段比历次运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支强打起精神的队伍，打着红旗，抬着肖像，举着“红宝书”，在这无人的乡村公路上，越走越慢，人也越来越少。每当汽车从公路上驶过，扬起一阵烟尘，人们不得不背过脸去。俟尘埃稍定，鼓舞士气的歌声，才会又断断续续地唱起来。老年教师每天不能再走的人日益增多，而革命小将中请病假的也日益增多。“病假”，这是当时唯一可以用来逃避的理由。批准请假的最高权力，想必是在工宣队的手中。许多人，包括工宣队的师傅，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女学生的困难则更大一些，我进大学前作过地质工作，走路对我并无困难。

如何才能鼓舞起这支队伍的革命意志，提高士气继续前进呢？除了不断批斗“牛鬼蛇神”，参观阶级教育展览外，又在“行军”中展开了学习巩立武家史运动。阶级教育展览馆在各个县、公社、工厂都有，均是对比展出解放前的落后、愚昧、贫穷和解放后的幸福生活。

巩立武是畜牧兽医系的一名学生，现在是造反派头头，牧医系专政小组组长，前些时强迫老院长背毛主席语录，打老院长耳光的就是他。这时他可真算得上红得发紫了。巩立武家史由学院印刷厂赶印成册，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学家史，忆苦思甜和批斗会结合起来开展。巩立武家史和我自1950年以来，多次听过的贫下中农的痛苦家史一样。如外出逃荒、讨饭、受欺侮凌辱、妹妹冻坏饿死或被卖掉，地主如何凶狠残暴地迫害贫下中农。以前每次参加这种忆苦思甜的会议，我总是感动得泪流满面，引发出我的深思。可是今天学习这巩立武的痛苦家史，心中却开始怀疑其真实程度。嘴里不说，和大家一样“认真地”学、听、讲。

“鬼队”中的学习讨论，严格要求每个人结合自己的罪行批判。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否则就是对抗运动。这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我确实想不出我犯了什么罪，也不愿意给自己编造罪行。所以我每次发言后都会受到批判，被勒令“会后思考”，“再写交代材料”，“要更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重新发言”，或在“鬼队”内由“牛鬼蛇神”自行批判……

一路批判，一路被斗争，疲惫不堪，总算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畜牧兽医系驻进了永乐大队（乃人民公社下属的编

制单位，一个生产大队下有 10 多个生产小队不等，约相当于过去的一个村，大队队部约相当于村人民政府)。“牛鬼蛇神”关入了早已选定的一间架有双层木床的“鬼屋”——又称“牛棚”或“蛇洞”。

一场“批判”，“交代历史”，“劳动改造”，“落实政策”，“改造世界观”的闹剧的序幕，再一次被冷酷地拉开了！

第十二章 “牛棚”生涯

驻进永乐大队后，“革命师生”在工人师傅的领导下，在当地贫下中农的帮助下，每天开会、学习、进行教育革命、改造世界观。当然这种“领导”和“监督”都是通过红卫兵组织来实现的。他们经常到“牛棚”中来提人去开批斗会。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呢，则是每天由红卫兵看守着交代历史，参加劳动，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世界观。

住入“牛棚”的第二天晚上，大约午夜时分，工人师傅带领着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突击检查，大家下床来站着。他们就开始对我们简单的行李、被褥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毛教授带有一把小刀式刮脸刀，是属于违禁物品，就拿走了。等他们离去后毛教授说：“他们是怕人自杀，所以把小刀搜走了。”

学习毛泽东语录，写交代材料，参加劳

动，接受批判斗争构成了“牛鬼蛇神”们的全部生活内容。每天安排得紧紧的没有丝毫空闲，当然更不会有什么星期天或休息时间了。在所谓的革命师生中（即未进“鬼队”的人），生活得也同样紧张，尤其是教师更是人人过关，交代历史，交代思想，自我批判，学习毛主席语录。

老院长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揪出来的，他右胸前挂的白布条子写的是“美帝狗奴才”。老院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老干部，他会有什么问题呢？据说他所谓的问题，是因为他作为党委第一书记，却不抓阶级斗争；还有在“大跃进”时期，来自上头的精神，提倡养什么“千斤猪，万斤牛”。而老院长则认为：“猪在八个月到一年多，是生长最快速的时期，经济效益高，肉质最好。而千斤猪要养四到五年才行。我们学院的约克夏老母猪，都是‘千斤猪’，但肉却无法吃。”这种言论就是“反对了大跃进”。

在批斗老院长的大会上，还揭发出了他所谓的反对毛主席的许多“罪行”。其中之一，就是说他曾经说过“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但对养猪来说，我们却知道得更多一些。”因此就构成了所谓的反对伟大领袖的恶劣罪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院长的清算，当然远远不止一个什么“秋后算账”，对他专门成立了庞大的专案组，几十年的老账、新账都要算。记得“大跃进”时，根据《八字宪法》，农学院也掀起了“深翻”热潮。校门对面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原来那儿种的是小麦，长得苗壮穗粗且长，公路上赶大马车的，总爱在校门口停下来歇脚，尽皆夸赞农学院的

小麦长得好。

他们说：“你看人家农学院的小麦！真是蝎子的巴巴（粪）——毒（独）一份！（即最好的意思。）”

大跃进，大深翻，学院调动数千师生，集中在这片地里，敲锣打鼓，用间隔开沟的方式大搞深翻。两沟之间的墙还开洞相通，至少挖下有一房多深，又是烟熏，又施下大量的底肥，声称要“放个高产卫星”。大跃进误导人民希望建立一个富强国家的热情，而专家学者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都噤若寒蝉，无人愿说真话，也无人敢说真话。在学院大门对面立了一面巨大的横牌——“毛泽东思想革命样板田”！却不料第二年这“革命样板庄稼”，只长了几寸高，就不死不活地开花结果了。

公路上的大马车，仍在此歇脚。他们仍然翘起大拇指，讽刺地说道：“看！革命样板田。”

不久，与原来敲锣打鼓相反，“毛泽东思想革命样板田”的巨大横牌不声不响地撤掉了。

老院长对当初的“大深翻”，也客观地持了不同意见。不料都成了他所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后期虽然给他平了反，但他却死于癌症，这也许与受折磨太多有关吧！老院长去世后，大家出钱在学院中给他竖立了铜像，以示全院师生对他永恒的怀念。自是后话。

现在老院长和我们住同一“牛棚”，虽然在学院中我们就曾一起被监督改造过，但还是陌生，因为他一直是学院的最高领导，我们很少说话，但在“牛棚”中不几天后我们就很熟悉了。没有红卫兵在场时，我仍称他老院长，他称呼我

小吴。他年岁大，每次我陪场被批斗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去帮助他，或帮他拿东西，有时还搀扶他。为此被红卫兵发现，挨过好几次“帮助”。一位红卫兵骂我说：“你给走资派当儿子好了，小毒蛇。”但红卫兵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他们换班后，有的红卫兵反而主动叫我去帮助他。有一回老院长发冷，红卫兵叫我去给他取大衣。取得大衣后我披在身上走回来，这事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什么：“这是小毒蛇为走资派招摇撞骗，向革命群众示威。”

在牧医系的“牛棚”中，除了有红卫兵轮流值班看管外，还指定一个“鬼”担任小组长，也就是个“鬼头”。此人是一位业务很好的教师，为人一向也很不错，名叫卢建平，他在历史上的问题是曾经参加过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本该是小事一桩，但他却因此进了“鬼队”。

十分奇怪的是他一当上了“鬼头”以后，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他像红卫兵那样来管理我们这些人的思想改造。

有一天在他们抽烟时，老院长对文老师说：“你的烟味道不好，尝尝我的。”

卢“鬼头”在旁，立刻就批判老院长是走资派旧习不改。当时弄得十分尴尬，递到半道的烟是递呢还是收回？根本不是滋味。

我说：“我也要学学抽烟。”就伸手把烟拿了过来才解了窘态，在场的人都对“鬼头”不满，但谁也不敢说话。

抽烟，这是在“鬼队”里无论是繁重的劳动时，还是紧张的学习中，唯一可以合理地休息或解闷的方式，也是在痛苦不堪的境遇中，给自己寻找一种刺激。烟吸到嘴里满口苦

涩味，所以我也就开始学抽烟，但只是跟着做做样子，给自己找点刺激，始终没能学会。

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所谓的“摔毛主席语录事件”，就是他这位“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

事件的发生是每天晚上全体“鬼队”成员都要背诵毛主席语录。一天晚上“鬼头”卢建平叫60多岁的老师毛立广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经多次指点毛仍旧背不出来。毛是一个性格和善，动作迟缓的人。这样的人也会有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在反复逼问下毛一时性起，就顺手将毛主席语录小红书放在床上。说道：“我背不下来。”

于是，就被“鬼头”卢建平向红卫兵汇报，说毛立广摔毛主席语录。这还了得！毛立广就因此多次遭到革命师生的批斗，同时也在“鬼队”自行组织的学习中，由“牛鬼蛇神”互相批判。

卢建平老师过去与人从无矛盾，“文革”前大家相见都是很有礼貌地问候，有时还到一起谈谈心。进入“鬼队”后，在他未当“鬼头”前，大家都是被专政对象。脸上无光，终日低头沉默无语。如今当上了“鬼官”，转瞬间就变了样，俨然以改造人者自居。向红卫兵告状“摔语录”，会上批判发言振振有词，神气活现，见到红卫兵立刻点头哈腰，活像个哈巴狗。

“鬼队”中的人都看到了所谓摔语录事件的全过程，尽管心中有看法，却不敢言，谁也帮不上忙。每次轮到我发言时，顶多我也只能说他不是摔，只是放到了床上，但这样的“放”，也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恭敬，同样该受到严厉批

判。

卢建平的第一把火烧得成功，更取得了“上面”的信任。管理“牛鬼蛇神”就更积极了。其实他也是受害者，不难理解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使一些本来不是整人的人，也不得不干些违心的事，以求得自己有一条出路。

一日，全学院各个系集合于王庄开大会，这是一个空前未有过的紧张的大会。各系的“牛鬼蛇神”们，在各系红卫兵革命小将的看管下，夹杂在所谓的“革命师生”中进入会场，当地的民兵和公安人员，密布在会场四周和会场外，所谓的“牛鬼蛇神”人人都吓得眼睛不敢斜视，全部低着头。会场上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人们鱼贯而入，人人自危，教师队伍中悄然无声。霎时间，造反派头头、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为政登上了讲台。

骤然间巨大的广播声停止了。犹如惊雷后的寂静，鸦雀无声！

朱为政拿起了麦克风大声地喊道：“我们天天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现在，我给你最后 10 秒钟，若在这 10 秒钟内自己站出来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代，还可以从宽处理，否则严惩不殆！自己过去做过的事，自己心里明白，想隐瞒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赶快自己站出来坦白交代，不要自绝于人民！”

大家注意！现在开始倒数计时！给你 10 秒钟，听清楚 10 秒！最后的 10 秒！

开始！10 秒，……9 秒，……8 秒，……7 秒，……”

时钟滴答、滴答，全场哑然，站在我身旁的畜牧兽医系的老年教师，身体微微地在颤抖。

“4秒……3秒，……两秒，……1秒！好，抓人！”

一阵巨大轰响后只见植保系的一位讲师，被进来的公安人员五花大绑地押出了会场。站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师被吓唬得两腿发软，渐渐地向下蹲，我用一只手把他扶起来，他又往下蹲，我又把他扶起来。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精神战，我下意识地背诵起幼年读过的句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死而死矣，何足恐哉，生死安足论……”自己鼓励自己，散会后，我们被带回畜牧兽医系的“牛棚”中开会、议论、学习，进一步交代自己的“罪行”。后来听说被抓走的那位讲师几个月后就放了，没有什么罪行。

几天后又开始学习中央文件，全体“牛鬼蛇神”被要求按文件上所指定的坏人，自己“对号入座”，然后把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①”，全部坦白交代。

各人都对号入座，例如走资派、反革命、右派分子、汉奸特务等等。轮到我对号入座了。我说：“我对不上号，这儿没有我的座。”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天兵天将”，还会有抓错人的吗？不对号入座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当时已经下午5点钟了，休会吃晚饭，晚上继续对号入座。在旁边无人时，老

^① “对号入座”，“竹筒倒豆子”都是中央文件上的原话。所谓“对号入座”就是文件上指出的坏人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汉奸特务、反动会道门以及其他一切反动的家伙”。自报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坏人。所谓“竹筒倒豆子”就是要把自己的“罪恶”一下子全部“坦白交代”讲出来。

院长悄悄地对我说：“小吴，你就对一个号嘛！管它什么的，以后要核实才能落实的。”

毛老师也悄悄地说：“何必吃眼前亏呢，随便对一个嘛。”

老院长和一些老年教师们对我都很好。我常常在劳动，拿重物和背语录等事情上偷偷地帮助他们。有些事情有时不小心被红卫兵知道了。

一位看守我们的红卫兵曾对我说：“小毒蛇！你他妈的还想当‘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当心你的狗命！”

当天晚上继续对号入座时，我说：“红卫兵小将，我已经想好了，现在我对号入座。”

他说：“你还是不想顽固到底嘛，你讲。”

我说：“我就是‘以及其他一切反动的家伙’。”

包括红卫兵在内，大家都笑了起来。

红卫兵紧接着严肃地说道：“不许笑！”

我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既然已经对号入座，就必须把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地交代出来，否则就是“对抗运动”。

这对我确实太困难了，我说：“我没有‘豆子’，倒不出来。”

这还了得，居然没有豆子！于是，他们就勒令我交代我的“第三层思想”，“第四层思想”，“第五层思想”！诸如所谓的反动诗词，里通外国，投敌叛国，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于是，每天在“鬼队”中结合大小批斗会就开始一个人

一个人的“竹筒倒豆子”。倒得好的经工人师傅点头，党总支认可，就可以实行“解放”。所谓“解放”就是可以放你回到革命师生中去，和他们一起继续学习，改造世界观。这当然是极大的恩典，是“牛鬼蛇神”求之不得，引颈以盼的天大好事。于是，鬼队中天天都有写好的交代材料上交给红卫兵转交领导。

红卫兵天天逼迫我写交代。他说：“你他妈的真的没有历史问题？难道说思想问题也没有？那你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啰，这么说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我看见别人有“历史问题”却能因“交代得好”而获得“解放”。我渴望“解放”，渴望早日与小文相聚，我经受不了那“美好”的“解放”的诱惑，受骗了。这时我犯了一个极大错误，为了眼前过关，我写下了一个“第三层思想”的交代材料，那就是当我独自一人看见毛主席挂像时我想过“搞的是个什么运动。”

这一“第三层思想”的交代，当时确实是过了一下“关”，少受了一些折磨，但却成了后来报呈上级批准我为“现行反革命”的重要依据。这是后话。

每当夜来人静，我就独自幻想着美梦，我希望和小文妹团聚，我希望有个家，一个安安静静、安静的地方。我厌恶这一天到晚搞些什么“批判”、“斗争”的生活。我想有个家。那怕一个狭小而简陋没有多大的地方。

我想有个家

我想有个家。
那怕一个简陋的
没有多大的地方。

那儿蕴藏着柔情，
干枯时给我滋润，
迷惘时给我指引。
成功时戒我骄躁，
失败时鼓我重振……

那儿没有欺诈，
没有骄横。
没有迫害，
没有蹂躏。
不羨富贵，
藐视虚荣。

我想有个家。
在忧悒的日子里，
有一双忠实的眼睛
陪我一同哭泣。

啊，家！
你在哪里？

我愿走遍海角天涯
去找寻。

“牛鬼蛇神”的另一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劳动改造。有一次我们到湖边去割碱蓬，这是一种盐碱地植物，割回来以备冬天烧炕取暖用。此地的树木砍伐殆尽，西北地区虽然土地辽阔，然而农村人口密度日益加大，祖传单纯靠烧柴草取暖的习惯亟待改变。我们割得碱蓬，背回来要走10多里地，蚕学家李玉铃已年过七旬，如何背得动！红卫兵要急忙回去吃晚饭，让我们自己走回去。于是，我就帮李玉铃背着，快走到村口才把碱蓬还给他。当我们到达村口时，红卫兵已经吃完晚饭在那儿等着呢。他们对李玉铃说道：“你自幼娇生惯养，未受过苦。平时你假装拿不动重东西，为什么今天能够拿动，还走这么远的路？你真他妈的会装模作样！”我听到他们对李玉铃的责骂。这是由于我帮他背回来而引起的。心中感到内疚又是茫然。不知何所事事。

我们把割来的碱蓬和杂草堆好后，来到食堂门外，大家又一起低头哈腰，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挂像低头认罪，照例背诵那规定的长长的10条语录。饭菜已凉，加之十分劳累，老年教师都吃不下。我是真的饿了，吃了不少。

不知道是因为食物不干净呢，还是因为我冷食吃得太多。第二天我就开始泻肚，一天去厕所许多次。约莫黄昏时分，向红卫兵报告，得到许可后，我又去厕所。由于天色已黄昏，农村的简易厕所里无灯，我知道厕所内很脏，于是，我就到厕所后面的大坑上解大便。刚蹲下不久，就听得急促

的脚步声，来了几位红卫兵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其中一人伸手就对我拳打脚踢，

我说：“为什么又打我？上厕所也有错？”

他们也不答话，连推带打就把我揪回了“鬼屋”。看守的红卫兵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厕所来抓我的。”

大约晚8时，红卫兵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开批判斗争大会，把我抓到会场。强迫我坦白交代去厕所干什么去了？

我说道：“上厕所还会干什么？解手去了罢。”

“为什么不进厕所里要到后面去？”

“厕所内看不见，我就到后面去了。”我回答道。

“那后面就看得见了吗？”

我说道：“是的，天还没有全黑嘛。”

农村的厕所，后面是一片荒地，空无一人。

“不对，这小子不坦白交代，现在大家揭发！”

一阵叫喊声，阵阵口号声……弄了好半天，才酸溜溜地走出来两位当地的红后代妇女，故作姿态，好像这是值得她们骄傲的事一样，说我是去偷看她们尿尿去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什么？你们说什么？看你们尿尿？你们尿尿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在哪里？”

她俩好像是为因此而骄傲，面带诱惑的风骚，讲述着她们是如何在隔壁女厕所，又如何看见我到后面去偷看她俩尿尿。

这真是岂有此理！

我一极度生气，突然嗓子就失音了，这是我第二次发生

嗓子失音，前一次是在学院时红卫兵第一次抄我的家后，心中一气嗓子失了音。

他们说我是装蒜，打也没用，我嗓子失音了，打也说不出话来，就一直站着听他们谎话连篇，进行着所谓的批判和揭发。

回到了相对来说是温暖的“鬼屋”，老教师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嘶哑地回答说：“不知道，他们说我去看女人尿尿去了！真是岂有此理！”

老院长轻轻地对我说：“小吴，你要忍耐些，逐渐会弄清一切的。”

听见老院长对我温和的安慰，不禁热泪盈眶……

老院长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这样的好人，又是老革命，为什么他们也要整他？

又一天下大雪，一大清早全体牛鬼蛇神，接到命令去清扫永乐大队队部门前一块空地的积雪。这本身就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劳动，在农村中行人稀少，这儿又不是大车道，只要清理出一条人行路来就很好了，空地上的积雪清理与否毫无关系，只不过捉弄人，要你们在西北冰天雪地的冬季，零下20℃以下的严寒里“改造改造世界观”罢了。

在清扫积雪时，“鬼官”卢建平，叽叽喳喳张罗得好欢。红卫兵下达完命令后早就进屋烤火去了。卢就命令四位老年教授找来一块旧门板，叫我和另外几个人往门板上装雪，装好后叫四位老人抬走。当然也有其它的工具如箩筐之类，但这个旧门板是最大的一件运输工具，所以卢组长就亲自督

阵，叫我们往门板上多装。四个老年人抬不动，行动迟缓，而这位卢“鬼头”却在一旁紧赶催促。

我的心中早就窝火了。首先我是看不惯这位卢“鬼头”对红卫兵小将那副奴颜婢膝、讨好卖乖的神态，更看不惯那副当了“鬼官”后盛气凌人的尊容。当几位老人抬着空门板，气喘吁吁地转回来时，我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我把我的铁锹递给毛老师。说道：“你来装，我来抬。”

卢组长对我说道：“是你分配工作，还是我？”

“你分配工作不合理，还不兴换换？”我回答道。

他说道：“你说该怎么分配？是你当组长还是我？”

我讽刺地说道：“哟，好大个官儿哪，不就是个‘鬼头’吗？”

我俩就争吵了起来。

他说：“小毒蛇，你要造反哪？”

“呃，毛主席教导我们‘造反有理’。”我回答道。

几位老教师忙对我说：“小吴，别吵啦！我们抬就是了，一样嘛。”

我说：“大家都是在改造，都要改造嘛。”

这时，红卫兵听见外面的争吵声，立刻跑了出来。

大声地喊道：“你们吵什么？”

卢建平说道：“小毒蛇不服从分配。”

红卫兵不由分说，走上前来踢了我一脚，又一下子把我推了好远。

说道：“你敢不服从分配？”

我急忙说道：“组长分配工作不合理，他自己不干活，叫老人干重活，年轻人干轻活。”

红卫兵转身问卢建平道：“你为什么不干活？”

卢急忙解释说道：“报、报告，今天我腰痛。”

“什么！你腰痛？你屁股痛不痛？”红卫兵大声地喊道：“你们他妈的一个好东西也没有，都是混蛋！”

随即亲自分配工作，“卢建平，你，你（都指的较年轻的人），还有小毒蛇，你们四个人抬雪。你，你，还有你（指的包括老院长在内的年龄较大的人）你们用铁锹装。”

然后大声地说道：“大家快干！干不完今天不许吃饭。”

说完就进屋里去了。

红卫兵走后人人都抿着嘴笑。

毛老师轻轻对我说道：“小吴哇，你也真是的！”

一日，吃晚饭前，大家作完了向毛主席低头认罪的仪式后，“牛鬼蛇神”排队等着吃饭。我从口袋中拿出了毛主席语录本，其中夹有小宁宁6个月时的照片，我看了一会儿。站在我旁边的胡朝芬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我没说话，没想到这位胡老师事后去向红卫兵作了汇报，说我看孩子的照片，不认真改造思想，当然免不了又受到批判。我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原来都是很好的人，道德、涵养有数的人，进了“鬼队”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有一天对老院长开批斗大会，我们都去陪场。红卫兵、贫下中农陈词激昂，啰啰嗦嗦长篇大论地发言，口号声此起彼伏。开会时间太长，被批斗的人站在台上作90度的大哈

腰太久（这已是最客气的一种了），老院长年高力衰，就昏过去了。老院长被送走了，回到“鬼屋”一股莫明的愁绪阵阵地袭上心头。

清查历史、交代历史和思想的运动进入了高潮。一日负责专案的关山木突然来追问我，前些时我和苏至清在一起劳动时，说过些什么话。我心中十分纳闷，苏至清与我谈话是在掏马葫芦（即下水道）的时候，仅我二人绝无第三者。当时我就对他说过，他说的话我绝对不会向第三人说，如今怎会弄到专案组去了呢？

农学院在王庄基本上依系划分，牧医系在永乐大队，其他系在不同的地方，听说基础部^①有教师因受不了批斗，跳河逃跑。由此可见其斗争之激烈程度。

经过专案组的人员三番五次前来向我逼问，我才弄明白，原来是苏至清自己主动坦白交代了。现在只剩下要我签个名证实一下苏至清自己的言论，我拒绝签名。

关山木对我说：“你这个人真够江湖义气，人家自己都已经坦白交代了，你签个名，证明坦白交代属实，与你毫无关系，为什么不签？”

他的言论涉及到攻击所谓伟大的霍查同志，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嫌，这会要他命的。

我说：“他的言论是他的问题，我不清楚，不能乱签。”

我十分理解，他不知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压力，才不得不

^① 基础部即由化学、物理、外文、体育、植物生物化学、植物学等等基础课程的教师合并组成的一个教学单位，相当于一个系的编制。

选择这“坦白交代”的作法。今天回忆起来这哪里是什么“罪行”！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局外评论，或者只是一种小小牢骚而已。

1979年“四人帮”已经倒台，苏至清调回他的家乡扬州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40多岁总算找到了一个爱人。临行前他来向我辞行，提起此事声泪俱下，说不知道怎样感谢我才好。

我问他道：“我曾经向你说过，我不会向别人说，你为什么不相信？”

他回答道：“我过去成为右派，也就是几句话被人整了，我已经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好人，所以我就‘坦白’了。”

我说：“你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么不如当时不说，也就没事了。”

“在说话的时候，情绪已经坏到了顶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回答道。

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那坦白交代，自己给自己立功的苏至清，汇报我看孩子像片的胡朝芬，假积极的“鬼队”组长卢建平，乃至那飞扬跋扈的关山木和刘铭，千方百计收集别人“材料”的李林新，还有那组织上纲上线批判《腊梅赞》和《鹧鸪天》的王佳真和追求官运亨通的王立成，人性都已被不同程度的扭曲。其中有的是心理变态，有的是道德沦丧，有的是居心险恶，整人害人……所有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

由于反复和长期的威逼，在“竹筒倒豆子”时期，我编

的那个“第三层思想”，就是我曾经想过“搞的是个什么运动”，以求眼前过关，却是弄巧成拙，反而成了后来他们向上级报案，欲定我为真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一项重要依据。

在永乐大队，正是轰轰烈烈地进行着斗、批、改的一天下午6点多钟，忽然说是传来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968年10月31日）。

那时讲究的是“传达毛主席指示不隔夜”。于是，全体教职员紧急集合，仓促之间拉起大队，在那荒无一人寒冷冬天的农村田野上，声嘶力竭呼喊口号，走了一大圈无人观看的游行，天色全黑以后，高一脚低一脚急急忙忙地回到室内，卷缩在炕上“趁热”讨论，大家热烈发言。异口同声一致赞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英明，无比伟大，无比正确。异口同声倾吐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

同时还热烈讨论的另一条“最高指示”是：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伟大的副统帅”林彪，要求每一个人都要把毛主席的教导“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毛主席的话一句顶

一万句。”“最高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鬼队”中当然也是热烈讨论，发言，谈心得体会、思想收获。一片赞扬之声。

1969年7月，来到王庄地区斗、批、改，已近一年。“鬼队”中的人一个个先后“解放”回到革命师生中去，又变成了革命师生。我交代问题不好，又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嫌，但是只剩一个人显然已无法成立“牛鬼蛇神”队，风行一时的“牛鬼蛇神”专政队眼看即将结束。

“鬼屋”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却仍然有两名红卫兵来看管我。教师和学生那边斗、批、改运动仍然在紧张地进行着，牧医系的“大吼猛进”战斗队队长，大概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一天到晚低着头，再也不那么大喊大叫地盛气凌人了。

有一天，人们都到另外一村开会去了。红卫兵在旁无一人时对我说：“今天他们都走了，我们做些什么？”

我说：“学习毛主席语录呗。”

他们说：“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还做些什么？”

“劳动改造呗”，我又补充说道，“你们观察我劳动。”

其中一红卫兵说道：“吴老师也真有意思。”

我说：“谁说我是老师，我才不当这个老师了呢。”

其中一人说道：“还要用你们的‘一枝之长’呢。”“一技之长”，这是最近传达中央文件时的话，学生们故意说成“一枝之长”。

另一人说：“今天到底做些什么？”

“到湖边去玩”，另一学生说道。

我说：“真要去，你俩可得听我的，不许乱跑。”

他们说：“我们一定听你的，保证不乱跑。”

“那好，你们去带一只桶。我们就出发。”

“带桶干什么？”他们问道。

我说：“抓鱼捉螃蟹。”

他俩高兴极了，就急忙准备去了。

到了湖湾边，他俩都很听我的话。我们抓得小半桶螃蟹和几条鱼。

约莫两点多钟，我说：“回去吧。”

他俩也说：“对，要不他们就要回来了。”

回到“鬼屋”，一个人也没有回来。我们三人就急急忙忙生火煮螃蟹，我们吃完了，又收拾干净，人们才开始回来，我们都吃饱了，晚饭也不想吃了。

几天后牧医系新党支部书记胡建华问我：“你和红卫兵一起抓螃蟹去了？”

我说：“是的。”我想这次恐怕又要倒霉了。

却没想到他只是说：“吃螃蟹会中毒的，以后不要抓了。”就此了事。从此以后此事就再也无人问起。

过了几天鬼队取消了，我的问题还要继续思考交代，现在搬去与牧医系教师同住，在群众监督下继续改造。我被引到了一间屋内，其中有一铺炕，上面已有五个人的行李，还可以睡下一人，我把行李放下正在铺床。这时，原“鬼头”卢建平走了进来，他是早已“解放”了的“鬼”，又变成人了。我的铺位正好分配在他的旁边。

他说：“你铺在这里干什么？”

“你问红卫兵去，他们叫我睡这儿的”，我回答道。

他伸手就掀了我的被。我站起来说道：“卢建平请你不要再掀我的被。”然后又继续铺床，他伸手又掀了我的被。

我说：“你究竟要干什么？”

他又来掀我的被，我抓起枕头就向他扔了过去。

他跑到门口就大喊：“小毒蛇杀人哪！反革命杀人哪！”

这一喊非同小可，几个红卫兵就跑了进来，厉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

他说：“小毒蛇要杀人。”

我说：“他不要我在这里铺床。”

卢建平说：“小毒蛇不许在这里睡。”

我说：“你不就是个三青团吗？有什么值得神气的？”

红卫兵说：“两个都不是好东西，谁也不许再闹了！”

红卫兵走后，他不敢再掀我的被了，卢建平生气地坐在一旁。牧医系的养羊学讲师张守常，饲料分析讲师汪宗明坐在一旁讽刺地说道：“卢先生马列主义学得不错嘛，路线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值得学习，值得学习。”我拿起一本书躺在炕上，一句话不说。

卢建平讨了个没趣，从那天起我与卢再也不说话了。

从此以后除专案组如关山木之类的人物外，也无人再来刁难我，似乎红卫兵的心事都已不再在“文化大革命”上了。

事情说来也蹊跷，下到农村近一年，人人在生活上都吃了些苦头以后，学生们的狂热劲头没有了。打人的现象大为减少，纷纷要求“复课闹革命”。刚下到王庄地区时，学生

们饭前举着红宝书，同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喊得既整齐，又抑扬顿挫，几个月以后，这种仪式就变成了学生们饭前的累赘。他们把“三忠于”仪式简化到可笑的地步，有的学生在老远就掏出了红宝书，走到食堂门口只说了个“……无疆”两个字，就急急忙忙地进食堂吃饭去了。到1969年5月，吃饭前就再也没有人作高呼“万寿无疆”的仪式了。但开会前的仪式仍然照作不误。“鬼”都解放了，低头认罪的仪式也不做了。

步行王庄500里斗、批、改虎头蛇尾，于7月开始返校，到1969年冬全部返回。步行王庄500里斗、批、改的壮举就此告一段落。

这次步行王庄500里斗、批、改的收获是什么呢？

“解放”了“牛鬼蛇神”？革命师生改造了世界观？体现了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威力？

农学院究竟应该怎么办，才算是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早就在不断地讨论、辩论和批判的课题，到了今天却仍然是摆在眼前的一大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十三章 下 迁

从王庄回到农学院后，各个专案调查组加紧进行工作，参加我的专案调查是求之不得的好差使，因为调查我的案件，可以到天津、重庆等地免费出差旅游，横跨半个中国。关山木是我的专案负责人之一。一天他对我说，组织上为了挽救我，派出专案调查组，给我整理的材料已有几大箱。

我想：“这才奇怪，我那有那么多‘材料’，劳你们神来整理几大箱的？”

从步行王庄 500 里到现在，经常都有各式各样的外调人员，来找到我要核实，或外调某人的什么什么材料，我常常是无法回答他们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有一次来人要调查我在后山第一教职工宿舍住时，和我同寝室住的丁一仁讲师的言论。

问：“丁是否说过江青就是蓝苹？”

说实在的我对电影明星从不注意，看完电影从来也不知道扮演者是谁，我除了关心生物化学和喜爱读点古典诗词外，其余一概不关心，所以他们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书呆子”。什么蓝苹不蓝苹的，我当时也没听懂他们说的是“难评”呢？还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栾平”？我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又如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城楼上有一张照片，毛主席用袖子垫着手，把手放在栏杆上，丁看到这张照片说了什么话？他是不是说了“栏杆太凉”？还有他说没说过：“‘粮票’是个新词，字典里也查不到。”等等类似问题。

我一个也答不上，他们牛皮扎，扎牛皮，翻来复去地追问了我好几天，我也无法证实。直到今天我写这本书时仍未弄懂，这样的外调材料究竟有什么用？除了毫不负责任地整人外，还有什么价值？

话分两头说。我的妻子带着小宁宁在重庆与我的母亲同住，她母子俩得到母亲的关怀。虽在如此乱世，生活得还算可以。但是她的医院却不断紧急地催促她立刻回去，万般无奈，只得带着孩子回到天津市远郊，她工作的那所医院。

因为我的缘故，她回去后受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把她和小宁宁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有一天下大雪，居然把她关在医院大门外，孩子冻得直哭，她受不住这种严格的追问和折磨，当我俩在一起时，尚能从相互的语言中得到一些安慰，如今她独自一人了，贫穷尚可以适应，忍耐。但面对那恶作剧的无理取闹，无休无止的精神压力和那如野兽咆哮般

的精神污辱和折磨，对弱小、文静、孤独的小文妹确实太残酷了！无法抗拒和忍耐。最困难不是忍耐贫穷，而是无法忍耐残暴和可怕的精神摧残。为此她曾两次自杀，一次她深夜割腕自杀，流血过多昏死过去，孩子不断哭啼，她们医院职工住房，都是隔音很差的单层夹壁房间。

隔壁的人骂道：“这个反革命家属，故意让孩子啼哭。不让我们休息，意图破坏生产！”后来因为孩子不停地啼哭，她们去开门一看，才发现她已割腕自杀。所幸她在医院工作，急救方便，救活了她一条性命。另一次是服毒自杀，她过去在医院与同事相处关系都很好，所以也被挽救了过来。

自从她回到医院去以后，我就再也收不到她的来信了。我的问题仍是牧医系悬案。但应全国大势所趋，不得不又恢复我的工资并将所欠补发。还是在从步行王庄 500 里前一月工资就停发了，每人只给 20 多元生活费。现在每次领到工资后，我除了留极少数自己必需的生活费以外，全部都寄给了她和孩子。补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寄给了她和孩子。每次寄钱后，虽然都没有回信，但我却可以猜想到钱她是收到了。人还在，这便是我的安慰。

步行王庄 500 里斗、批、改，轰轰烈烈的闹了一年，它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楚。有的人也许认为农学院的办学方向在过去 20 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当时 1969 年）都大错而特错了，其中的错误之一就是把学院办在了 C 市市郊。

王庄斗、批、改的另一个收获，也许就是否定了王庄之

前风行一时“要把大学办到腿肚子上”的理论。

综合以上两个论点，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那就叫做“分散办学”。所谓“分散办学”就是把农学院分散下迁，原在C市市郊颇具规模的学院校址作废。这种将原来校舍作废，而下迁另建校舍的作法，并非只发生在我所在的学院。全国各高等院校皆刮起了这股“时髦的下迁新风”。

于是，经过新的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批准以后，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决定把农学院分散，一场荒谬绝伦、滑天下之大稽的瓜分学院，拆烂实验室，工厂职工抢占校舍的悲剧，就此令人心情沉重地上演了！

农学系、林学系、植物保护系、农业经济系、气象系等下迁到王庄的山子西。但不久又认为选点不对，改迁镇江口。果树专业、蚕学专业下到南中的丹林。农业机械化系下到张家店。水利系下到黄岗。畜牧兽医系和一所畜牧兽医学学校合并，下到大梁种畜场。各自成立新的学院，省里面分别拨款修房舍，教职员工要有住处，学生上课要有几间教室，各处拨款都是数以百万计。修建一个学院的校舍，谈何容易！反正是民脂民膏，浪费起来无人心痛。

学院被瓜分，王陵的校舍纷纷被各工厂占领，原来好端端一个欣欣向荣的农学院面临一片悲惨景象。

牧医系下迁大梁已成定局。于是，我就被安排和全系教职工一道，整天拆实验台，包装凡能弄到的教学用仪器、冰箱、挂图、显微镜、PH计、桌、椅、板凳、木床，各教学研究室的实验框、挂图橱、用品架……从1970年12月末开始装大卡车，向大梁搬迁，重重叠叠在大梁粮库的空房中堆

积如山。日久因挤压变形，腐烂，几乎全部成了废物。

大梁是靠近内蒙的一个草原地带，大梁种畜场以饲养西北细毛羊为主，也有种马和奶牛场，种畜场场部离大梁火车站不远。这儿是一条小街，其中有一个百货店，一个邮局和数家店铺，此地三天一次集市。

牧医系就在离大梁七八里的一片草地上，开始筹划修建第一批建筑物——教职工宿舍。所有的人均投入以建校为中心的事宜。

搬迁完毕后就把我安排去作比较辛苦的工作，在一座荒山上开荒种地。多年来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遭受到极大的破坏，许多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例如炒菜用的油类，每人凭票供应每月只有三两。

鸡蛋、蔬菜、水果，甚至扫地用的扫帚在C市也买不到，现在下到了这偏僻的大梁，在三天一集市的小镇上，反倒较之在C市内时要好一点，至少扫帚是可以买到的。

这时农民自留地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农民拿到集市上来卖的东西也十分有限。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永远“艰苦朴素”。“糠菜半年粮”，“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文革”时期竟然把发展经济与所谓的“革命”对立起来，认为“穷”才是社会主义，富就变“修”了，富了就是资本主义。

我在这一段时期里，生活孤独，寂寞。每日开荒十分劳累。本来是安排大车老板负责用骡子翻地，但是他常常不来。于是，我就学着翻地。这本是老农或车把式才能驾驭的工作，骡子不听从我的驾驭，所以学起来十分吃力。每日在荒山上，四周没有一个人。我想念妻子和小孩，想念父母亲 and 兄弟，但却没有他们的消息。

每天我孤独一人在山上，自带饮水和午餐。开荒地旁有几座土坟墓，我就把包挂在墓碑上，一瓶饮水放在碑旁，坐在石头上吃午饭。有一天，天色阴沉，寂寞之余深觉人生乏味，怅然若有所失。看见墓碑上斑斑剥离的字迹，冥冥生涯，浩瀚长空，不胜感叹。

我对墓碑说道：“朋友，对不起，又借您的坟头用餐。在您生活的年月，您可曾有过苦闷？你可曾遭遇过迫害？您可曾有过像我今天这样的苦难？人生是什么？人生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恼呢？”

四周一片静寂，除了地角站立的骡子发出叽咕、叽咕咀嚼的声音外，我永远也得不到回答。

这样的日子虽然只有数月，但似乎已经很久、很久一样。前年回重庆在母亲处读到大哥的作品《牡丹》，我十分喜爱，但我又不能把它抄在任何地方，因为一旦再被他们发现，又会胡乱“上纲上线”，所以我就默默地背诵了下来。

牡 丹
调寄 鹧鸪天

争占春光百卉忙，
几株琼萼解沧桑。
境迁不改倾城色，
物换犹存故国香。
吴苑艳，
汉官妆。
依然域外亦称王。
千红撩乱晨风里，
和露含烟静吐芳。

今日我在如此凄境之中，与大哥写《牡丹》的心境确有天渊之别，遂以《小草》为题，反其意和词一首：

小草——鹧鸪天
和《牡丹》

霜冷残光抽枝急，
身世飘零空叹息。
谁解茫茫沧桑路，
花自零落寒枝凄。
吴苑冷，
汉官寂。
牛踏羊踩利刃逼。

仰望碧空千万里，
奈何根茎锁烂泥。

寂寞，在这荒山孤坟之旁，我独自一人哼起了凄凉的歌
声：

堤边柳到秋天叶乱飘，到如今只剩下细枝条，
想当初绿荫荫春光好，今日里冷清清秋色老。风凄
凄，雨凄凄。君不见眼前景已全非，眼前景已全
非，一思量，一回首，不胜悲。

一日突然又通知我去开会，进得会场才知道又是对我的一
场批斗会。自从下迁以来，很久没有开过批斗会了，今天
怎么又开批斗会呢？不过这种玩意儿对我早已没有什么稀
奇，已是久经沙场，一点儿也不会引起我的恐惧。

做完了念读毛泽东语录，敬祝万寿无疆，呼喊口号种种
仪式之后，由新任牧医系党总支部书记胡建华掌握会场。他
宣布今天的批斗会是为了挽救吴苑新，现在叫他交代自己的
新罪行，我默不作声。于是，他们按惯例开始了揭发和批判。
几个回合的发言之后，他们拿出了我常用的一个小笔记本。
这个本子我是常带在身上的，出来劳动时放在枕头旁了。

在这段时间里，小小的牧医系也学会了像红卫兵一样，
随意检查私人物品，哪有什么“人权”二字的概念可言！我
就曾亲眼看见有位牧医系的领导，偷拆本系任教组织胚胎学
的一位女老师的信件。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位女教师有所谓的

生活作风问题。这位老师早已离婚，现在可能是在谈恋爱。该领导还公然把偷拆的信件拿来在会上读，用来大家逗笑，作为开玩笑的资料。

他们翻出我的笔记本中的一页，在这一页上贴有一张照片，是我和妻子、孩子三人的合照。我的妻子小文是一位擅长美术的人，她认为照像技术差，背景安排不好，但三个人却都照得不错，所以就人像剪了下来。人像很小，她走后我怕失落，就贴在本子中的这一页的角上了。但这一页上曾经写过一些毫不相关的字，是我在无聊时写美术字玩时写下的。但其中却有“共产党”这几个字。

他们翻出此页，强令我交代“第三层思想”。我不懂他们指的什么事，当然交代不出来，经过他们的揭发、分析、批判后我才明白。原来强加于我的所谓“第三层思想”，剪开像片贴在本子上，就是暗指共产党整得我家破人亡。

“你们可真会分析！既然你们已经分析出来了，何必还要我来交代。”

我决计不再说一个字，来对抗这卑鄙的批斗会。

沉默就是最大的反抗！

这时刘铭突然窜出来了。此时他已调离农学院，他认为生活在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农学院没有出息，他今天来到大梁，一则是来玩一玩，再则显示一下他调离工作多正确，因为我们这些人，现在全都被赶到大梁这个偏僻农村中来了。

他走到我的面前大声地问我：“吴苑新！你叫什么名字？”

我沉默不语。

他又大声地喊道：“哎！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仍然沉默不语。

“你他妈的哑巴啦？”说完他迎面就给我一拳。

鲜血顺着我的鼻口流下来，被他打得退了两步，我真想上去回他一拳。

但我清楚地知道，若我真的回了他一拳，我立刻就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他们立刻就会招来公安人员，将我五花大绑送进监狱。立刻会给我扣上一个打人行凶的罪名。我控制住了自己，但我却向前走了两步，重新又站到他的面前。

他说：“反革命，小毒蛇！老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说完又更重的向我脸上再打一拳，我又被打得后退了两步，但我立刻又走向他的面前。他又给我第三拳，鼻口的血向下淌，我并不擦去，又再次走回到他的面前……

掌握会场的新党总支书记说道：“不要打了。”

几个人上前来劝阻了刘铭。

由于我一言不发，此次批斗会以不成功而告终。掌握会场的人宣布：

“吴苑新顽固对抗群众运动，送到本地第二生产队，交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散会了。我走出会场，刘铭走到我身边，假惺惺地对我说道：

“吴苑新，这次会本来是想挽救你，你却对抗群众运动……”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对着他那瘦小的丑脸上吐出一口

被他打得出血的唾沫，骂道：“呸！谁要你这个流氓的挽救，还是挽救挽救你自己吧！”

他不敢再站到我身边来了。我说：“刘铭，你也真是欺人太甚！你都调离农学院了，还欺负到大梁来，豁出这100多斤，现在你上前一步我就要揍你！”他不敢上前来，牧医系的一些教师，有的已经开始袒护我了，他们怕我真的会打起来，于我会更加不利，几个人就陪伴着我离开了。

我独自一人，回去收拾好行李，就自己到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去了。后来听说新党总支部书记胡建华曾说，“谁叫刘铭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的？他有什么权力到我们的会议上来打人？他已经不是农学院的人了。”

新的党总支部书记胡建华，是一个比原党总支部书记王立成（当时的党总支部副书记）要好得多的人。

在这段时间中，牧医系在大梁修建房舍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牧医系在大梁草原上修建的数排教职工住房，对一个学院来说，太小，太少。对当地机关和老百姓来说却又不合用途。农学院分散各地校舍的兴建工作也在进行。省里原来只需对一个农学院投资，今天却不得不对数个农学院同时投资。各校对款项需要之迫切可想而知，因为下来那么多教职员，还都分别借住在当地老乡家，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没有着落，意见、牢骚一大堆。这对省革命委员会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浪费的情形还不仅仅是一个农学院。

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医学院……都有类似问题。听说音乐学院价值昂贵的三角钢琴，悉数被搬下来堆在一古庙宇中，有一日来了外宾，表演需要用一台钢琴，但

却一台也挑不出来，全都坏了。

这种情形并非只发生在我省，全国各地尽皆如此。北京大学的家具从北京站到西安，沿途各个火车站比比皆是。

我被送去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但实质上则是牧医系整理和呈报我的专案需要时间，整理我的专案组关山木等人已将我的材料报请甘西专区批示，他们是将我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呈报的。当时因“现行反革命”而被枪毙的不在少数。我的问题据说甘西专区认为证据不足，没有批准，以后听说在此期间，他们还会派人与我的祖籍农村和我妻子工作所在地的农村联系，要送我去“劳动改造”，但对方不同意，认为你们自己的人应该你们自己安排对他进行“劳动改造”，为何把包袱外卸。

他们定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罪证”据说是我交代“第三层思想”说过的“搞的是个什么运动。”这一“反革命思想”，以及我骂“红卫兵是法西斯强盗”，还有说我要“投敌叛国”，还有一个“重大罪证”就是所谓我写的《腊梅赞》等“反动诗”，而对我的所谓“反动诗”进行分析、批判的“权威”，事后得知就是王佳真。这是明摆着胡乱“上纲”和恶意中伤。

我与他们素无冤仇，运动到来以前相互之间还是处得不错的同事关系，但是一旦运动到来，仅仅为了他们自身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为何就昧着良心，心地如此狠毒？使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从步行王庄 500 里到现在，整我的专案组关山木等人曾多次严厉逼迫我交代我生病回重庆时弟兄间谈了些什么话。

那么，请看本书第六章《巴山夜雨》，那就是我们弟兄间亲热热谈过的“什么话”，晚了将近 30 年才来作补充交代，遗憾的是现在对“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定论，全盘否定。

我看，每一个国人都应该对 10 年“文革”作深刻的“沉思”，10 年中种种疯狂的行为、荒谬的理论为什么能甚嚣尘上？

我曾努力工作，为教育事业贡奉我的精力，到头来却欲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今日追忆，站在大洋的彼岸，举目远望，苍穹碧波，茫茫无际。在大洋的对岸就是我的故乡，就是那有水有草的地方。回顾往事，无限悲叹。

当时，我就是这样地背起了我的行李，下到大梁第二生产队去，开始了我的“劳改生涯”。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劳改，似乎就是我后半生的生活了。但是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自己也回答不出来！

第十四章 在农村劳动改造

当我来到第二生产队后，得知这儿是一个果树队，队长姓常，他安排我睡在队部的炕上。在队部睡觉的人不多，有贫农谭大爷和十几名下乡知识青年。管理此队的主要是常队长，还有一名果树技术员。每天一清早就有一二十名当地的青年农民来参加劳动。到这儿来劳动的还有原来大梁种畜场的党委第一书记，现在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儿劳动，以外还有一名农场的“摘帽右派”和一名种畜场的技术员，都在这儿“劳改”等待定案落实政策。

我就夹杂在他们当中，我很少说话，劳动肯卖力气。大约过了两三个月，相互间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常队长常常夸我劳动好，尤其是老贫农谭大爷对我更是格外好。当谭大爷从农学院那边知道我和媳妇、孩子已有近两年时间

没有见着面时，他在背后不是骂我的媳妇，就是责怪农学院的领导没人性。他容不得任何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贫下中农是一群生活在低层的人，真正的老一辈贫下中农是一生中饱经风霜、诚朴的劳动人民。谭大爷就是一个这样的老贫农。

我默默无言的劳动换得了友谊。农村的劳动是十分辛苦的，早晨5点钟就下地干活了，下午七八点钟才收工。在西北地区一般说来多已作到翻地用拖拉机。但仍有少部分山地用牲畜拉犁翻耕地。这儿虽是果树队，但仍种有少部分高粱和玉米粮食作物。此外还种有花生、香瓜、萝卜、胡萝卜等农作物。有一天和本地一些小青年一道种花生，前面一人负责打垄，后面一人播种和盖土。人人都抢着要干播种的活，不久我才明白，原来播种的人虽然看起来是在不停地“播种”，并用脚在给种子盖土，但作为种子的花生，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扔进了嘴里，在搞假播种。收成是公社的，反正不是他的。眼下粮食紧张，花生更是“稀世珍品”，能吃几粒当然就要吃。没有人能够管得住。一片花生地因缺苗补种了三次，造成了成熟期参差不齐，大大地影响了产量。我想：“这就是所谓‘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当然，我已深知这种怀疑只能放在心中，绝对不可说出口来。

果树队兴办时间不长，除后山的杏树和少部分苹果树已经开始结果外，大部分尚未结果。

果树队的邻居是五·七干校，山下是奶牛场和种马场，渐渐大家都熟悉了，并且交上了朋友。贫下中农和农场工人都是十分善良的人，他们一般都不大相信什么“劳动改造”

之类的话，在他们眼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老实肯干活他们就认为是好人，劳动刁滑就是坏人。他们对领导虽然有看法，但一般都是领导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的家庭观念都很重，家庭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在这儿劳动就是劳动，看书学习都是不可能的事了。

果树队和五·七干校之间常有矛盾，因五·七干校的大马车常到果树队东边山坡下来拉土垫圈所造成。因为若继续拉土就有逐渐造成山地滑坡的危险。若一旦山地滑坡，其多年经营的果树园就会遭到毁灭。但果树队却制止不了五·七干校的大车不断前来拉土，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要发生。这个五·七干校是省里下放到这儿的干部，劳动的人数时多时少，视上面放下来的人数多少而定，有时这儿也会下来一些有点来头的干部。大梁种畜场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机构，不敢和他们闹僵。

这一天又有两台马车前来拉土，常队长气得暴跳如雷，叫在这儿的所谓“走资派”原种畜场的第一把手去也管不了。常队长就叫人把我从正在劳动的地里叫回来。

他对我说：“你去制止他们，不许他们拉土。”

我说：“常队长，这不大好吧，我现在的身份不合适吧。”

谭大爷说：“队长叫你去，你就去，怕什么的！”

原种畜场的第一把手也说：“叫你去，你就去嘛。”

没有办法，我只好去了。走到取土场两台大车已经装满，我对四名跟车装土的干部说：“我奉命前来制止，不许在这儿装土，这一车已经装满，就拉走算了，可别再来拉

了，否则我没法交差。”

他们问我说：“你是农学院的吧？大知识分子。”

我说：“臭老九，劳改，脱胎换骨嘛！”

他们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人问我：“你教什么的？”

“生物化学。”我回答道。

然后我们就站在一起聊了一会儿天，临走前他们之中的一人对我说，我们不回这儿拉土，也免得给你造成麻烦。真没想到，我出面这么简单就把事情办成了。

秋天到了，这是果树队的黄金季节。花生、水果和香瓜是当时市场上几乎看也看不见的珍品，大小领导都想弄点来吃，果树队一下子变得吃香起来。最头痛的事是方圆一二十里都有来偷瓜偷果的。前山后山面积很大，原来有一人看山。现在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可能都有麻烦，一人根本就看不过来。看山，这是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要由贫下中农最信任的人来做，现在要增加一个人，选谁呢？

这是果树队当前的一件大事，经研究他们决定增加我来看山。我一再说这样安排不恰当，但队上非要我去不可。

我说：“队长，我还没有落实政策，我是来劳动改造的，看山不好吧。”

队长说道：“这是我们队上安排工作，谁有意见找我来，分配你看山，你就看山。难道我们这点权都没有？”

谭大爷说：“改造他妈那个巴，谁知道谁该改造？吴老师是个技术人，老老实实的，看山交给他没错。”

于是，看果园和瓜地的重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了。

再说，牧医系整理我的材料的专案组，把我作为“现行

反革命分子”，呈报到甘西专区后，就不负责任地把我的问题搁置起来，不闻不问。一直不给我平反。

看山是一件十分辛苦的工作，一天 24 小时都要警惕着，晚上还得前山后山地查看，到了晚上常有野狼出没。果树队离大梁场部并不很远，离大梁火车站也只有 10 来里，所以只有孤狼夜晚出没，没有群狼。狼或三五成群，主动向人进攻，进入草原深处这种危险性就会大增。狼怕光，所以带一只三节电池光度较强的手电，是很有用处的。这儿的蛇不多，我所见到的多是无毒蛇，此外就是刺猬、狐狸、野猫、山鸡等小动物了。

看山的人是可以带武器的，我只带了一条短铁棍以防万一。看山的最大麻烦不是动物，而是人。来这儿偷瓜偷果的大多是周围的 10 多岁的孩子，他们从不在深夜来，多是在清晨和黄昏出现，要抓到他们是很难的。因为我在山顶或山脚看见他们，距离很远，赶到该地时，他们早就跑远，或钻进高粱地里不见了。他们吃得不多，但破坏性却很大，十分可恨，而且来偷的多是几位常客。我决心要抓住他们一次。于是，我就在半山腰一个土坑中埋伏了起来，来了五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正在偷果，我的突然出现，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一个也未跑掉。以往抓住人都是带到队部，罚款之外还要找到他们的家长，他们要吃很大的亏。

当他们发现看山的人是我，是农学院的人时，都十分惊讶。

我问他们来过了多少次，他们都如实说出了自己来了多少次，这次被抓住若带回队部，惩罚将是不轻的。我决定不

带他们去队部，以交换他们不再来。

我说：“现在是我看山，只要你们不再来，我这就放了你们。”

他们走了。果然，从此以后来偷瓜偷果的事就少多了。

有一天下午，我到后山去看果园，回到瓜棚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瓜棚内吃香瓜。

我问他道：“你买瓜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们这儿的规定是要付钱买后才能吃的，当然你尝一尝也没关系，但是好吃就得付钱。”

他立刻回答说：“好吃，好吃。当然要付钱，当然要付钱。”

他付完钱，又买了几个瓜刚要走，另一位和我一起看山的赵四进到瓜棚中，他急忙向我摆手，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照样收了钱。

等吃瓜的人离去后，与我一同看山的赵四紧张地对我说：“你今天闯大祸了！”

我说：“怎么啦？”

“你知不知道刚才那人是谁？”他问道。

我说：“不知道。”

“他就是我们场党委书记，第一把手。”他说。

我吓了一跳，说道：“我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吃瓜要付钱，这没什么不对吧！不付钱还要我们看山的干什么？”

赵四说：“话可不能那么说，场党委书记第一把手，得罪不起哦！不如拿点香瓜马上给他家送去。”

“我可不愿做那种事。”

“你真是个好人啦，但是这个世道好人难做啊。好人总是要倒霉的，怪不得他们放你到这里来‘改造’！”

回到队部后，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

大车把式老贫农李大爷，人称“吵鸡毛”，因为他为人正直，遇见不平事总爱大声喊叫，队长说他：“你吵，你吵，你吵个鸡毛巴！”（骂人的话）。于是，他就得了“吵鸡毛”这个外号。

这时，吵鸡毛当着大家的面，对着队长喊：“人家吴苑新看山，才真是好样的！这回他要出了事，我们就拿你队长撒气。谁要是整了吴苑新我们贫农不答应！”

没想到这事不胫而走，很快就在大梁传开了。说是吴苑新在果树队“刮了大梁第一把手的胡子”（意即当面指责了某人的不是）。听说这件事不久传到了牧医系党总支部书记耳里，把他高兴得没法，听人说他们之间正存在着权力之争。

这是牧医系下到大梁地区后，新环境下的新矛盾。

当此事再度传到了大梁第一把手那里时，他就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说农学院在果树队那个教师改造得不错，很有原则性。一时之间成了牧医系教师之间传说的佳话。

一天下午来了10多个牧医系的学生，他们的四年大学生活，几乎是什么课程也没学。步行王庄500里后期，虽然提出了所谓的“复课闹革命”，实质上也是空的。这些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最后的一期学生了。下到大梁以后也许受了些农村生活的磨练，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狂热

就不见了。这一天他们听说“小毒蛇”在果树队，就一窝蜂的来了，他们不是来闹革命的，他们是想来买香瓜吃。我压根儿不想见这些学生，鬼知道他们是不是红卫兵暴徒的劣根性不改呢？他们来时我正在队部办公室，这时果树队队长、谭大爷、原大梁第一把手都在屋里。当有人来说：“农学院的学生马上就要到了，已经走到山下下了。”

谭大爷说：“吴老师，你不愿见这帮人就到后山去吧，这儿有我们管。”

我起身到后山去了。

后来听说这些学生来到队部，就指名道姓要找我。有人说：“叫小毒蛇出来！”

常队长说：“你们找他有什么事？他已经不是你们农学院的人了。”

其中一位学生说：“我们找他要买香瓜。”

原大梁一把手说：“卖瓜我管，瓜没熟。不卖！”

一个学生说：“老子有钱。”

队长说：“老子不卖。”

他们碰了一鼻子灰。这儿不是什么“臭老九”！这儿是贫下中农。谁敢乱来？

什么也没买到，他们闹闹嚷嚷灰溜溜地走了。我回来后他们讲给我听，心中真是比喝一碗凉水还要舒服。过去我很喜欢学生，帮助他们学习功课，和他们谈心。而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流氓差不多，我躲都来不及，怎会想见到他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师生关系，早已不是昔日的师生关系了。

秋天，我们种的花生收获了，队部决定分给每人1公斤。当时花生是珍品。市场上没有卖的，花生中含有21烯醇，是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晚上我独自一人悄悄地把花生剥了，第二天把花生米打了一个小邮包，请假去大梁邮局把它寄给了母亲，不料这事让谭大爷知道了，他就悄悄地告诉了队长。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在一个晚上队长从库里称出了几公斤花生，由谭大爷掌厨，把它炒熟了，然后把我们几个人从炕上叫了起来，还弄了点酒，要大家一起吃。谭大爷和队长把大部分炒好的花生塞给我吃。喝了点酒后谭大爷说真心话了。

他说：“实话说了吧，这花生这酒不是吴老师你们谁也吃不到。人家吴老师分了两斤花生，一人悄悄的给他万里之外在四川的老娘亲寄去了，自己一个粒也舍不得吃，你们哪一个人能像吴老师这样？今晚上这花生是给吴老师炒的。吴老师，你干了这么多活，今晚多吃点。”

把这些诚实、勤劳、善良的贫下中农，和那自称“铁杆贫农”的狂徒相比，我确实找不到丝毫的共同之处。老贫农谭大爷一席话，使我十分感动。

看山的季节过去了，冬天到了，队部给我安排的新工作是拾粪。于是，我每天背起粪筐在牧马的草甸子上（即草原上）和大梁的街头巷尾拾粪，供作来年的肥料。

有一天大雪之后，天气严寒，估计是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吧，我独自一人在草甸子上拾粪。一片白雪茫茫的草原上，远远地望见一个黑点，我想一定是一堆马粪，就向黑点走去。走近一看才发现竟是一头初生的小羊，十分可怜。我急

忙倒掉筐中拾得的马粪，把小羊放在筐中。天气太冷，小羊有可能立刻被冻死，我急忙把大衣脱下来，盖在小羊身上，小羊初生满身粘液，在这种情形下也顾不了许多，大衣弄脏了以后再说吧。举目一望四周一片白雪茫茫，一个人影也没有。远远望去有一个小小村落，它离我最近，背回果树队太远，小羊会冻死的，所以我就疾步向那个小村走去。到了村口，看见一位老大爷。

我问道：“老大爷，你们村里养羊吗？”

“在这儿哪有不养羊的？”他回答道。

我说：“我在草甸子上捡到一头初生小羊羔，快要冻死了，你快些把它抱到屋里去吧。”

他一听便急忙忙帮着我把小羊羔送进了暖和的屋里，他忙着去安排小羊。我看见小羊有救了，就披上弄脏了的大衣，背着粪筐走了。因为我怕倒在地上好不容易拾得的半筐粪会被别人装走了。

当我已经走得很远时，听见后面有人叫喊：“喂！同志，回来喝杯茶再走！”

风雪又大起来。我一边走一边用手在空中摇摆，表示不了。好不容易找到原地，装好那半筐粪，就回队部去了。

几天以后听得农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有生产队到处寻找有一个说话带南方口音的“毛主席的好干部”，在大雪天给他们送了羊，名字都没留下就走了。最后他们终于打听到农学院，老师们一猜就知道是我。

不久该生产队就写了大红纸表扬信：“毛主席培养的好教师，贫下中农的贴心人。”送到了牧医系去了。若是牧医

系哪位“革命师生”有此事迹，肯定会大张旗鼓地热闹一番。是我做的事也就没人提了，向送喜报的人说一番客气话，就此了事。

我当然连想也不曾想过，这件事要别人来表扬或报答，我只是可怜那只小羊，那个可爱的小生命，这和表扬不表扬有什么关系呢？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所乘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但是我们得知此一消息是在1971年10月中旬。其实，自从人们下乡后，谁也没有从“文化大革命”中捞到多少油水。尤其是那些学生，还有造反派和“反戈一击有功造反派”都没有捞到什么油水。许许多多的红卫兵都也被敲锣打鼓地“欢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尝尽了他们从来也不曾想到过的苦难。现在党章白纸黑字写定的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同志”竟出如此奇闻，人们嘴里不敢说，心里却凉了半截。对这所谓“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就开始冷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此进入了低潮。

自从小宁宁出生到现在已该是3岁了，他母子俩的情况究竟怎样呢？我写了许多信都不见任何回音，只有一件事情使我可以判断她还活着，那就是我每月领到工资后，立即给她汇去的钱没有退回。

每月领到工资到邮局去给她母子俩汇一次钱，是我当时心中感到最快乐的一件事。

突然，有一天，一位原牧医系总支部干事，穿着大梁的警察服装，好不神气（但是不久他也犯了错误了，这是后话），来找到我。

他对我说：“你的老婆要和你离婚。”

他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我压根儿不愿和他多说话，于是，我冷冷地答了一句：“是吗？谢谢转告。”

他离去后，这一消息于我犹如晴空霹雳，自分别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和孩子，我对她心中有着深深的内疚。两年多收不到她的来信，使我心里十分不安。

我常独自一人念着欧阳修的词：“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依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她要离婚？一个曾经要和我一同“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如今要离婚？此情此景我能说些什么呢？

这个消息立刻传遍了大梁、牧医系，成了人们会上会下、茶余饭后的话题。这时“文革”热已经热不起来了，同情的、打抱不平的意见都出现了。

“吴苑新究竟是什么问题，你们拖着不落实？”

“为什么他的问题拖得这样久？”

“你们要人家汇报第三层思想，汇报了也算犯罪？”

……

于是，对我的问题的处理牧医系就开始提上了日程。

第十五章 离 婚？

孩子已长到3岁了，十分可爱，但是小文抱走他时才刚满月，到现在他还没有看到爸爸。最苦恼于小文的就是可爱的小宁宁，这个3岁的孩子被当地农村的其他小孩呼叫为“没有爸爸”，是个“野种”，受尽了欺凌。

小文上班时，小宁宁请人代看。

小文回到家宁宁就问：“妈妈，我有爸爸吗？”

“有。”

“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们呢？”

“会的，有一天他会坐飞机来看你。”小文无可奈何，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第二天当别的孩子奚落他没有爸爸时，他就十分骄傲地说道：“我有爸爸，明天他坐飞机来看我，那个飞机好大好大哟！”小文现在是反革命家属，当然失去了一切应有的地位，

要保住她过去在医院中工作好的名声更是不可能的事了，她的苦到哪里去说呢？只有眼泪往肚内咽，孩子是小文最大的安慰和快乐，母子俩相依为命，感情十分深厚。她所工作的医院的同事们，都为小文这样一位美貌女子惋惜。当年曾有许多人追她，都被她拒绝，挑去挑来竟然挑了一个“反革命”，嫁给了这样一个坏丈夫。

3年来都得不到政策落实，她有一个活着的“死丈夫”，她自己却成了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有丈夫的“寡妇”。这个事实活生生地摆在她们医院众多的医生和同事的面前。虽然每位知识分子“臭老九”各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小文的典型遭遇，无论是好心人，或是别有用心的人都有意无意地议论纷纷，给她心理上和生活上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曾经在一个短暂时间里，为她医院同事们所称赞的婚姻，昙花一现地破灭了。似乎是永无翻身之日。

人们有些什么议论只不过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小文的美丽引起了其他有权势的人的垂涎。

小文提请法院要求离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势力是很大的。那时，法院对离婚案件的处理，先总是劝和不劝离，凡提出离婚的，他们总要问个究竟，不会轻易判决的。我的问题系里的领导挂着不处理，他们只关心自身的切身利益，他们制造案件后，被整的人生活得痛苦与否，他们可以长期不闻不问。

但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自从小文提出离婚后，群众对我这件事意见很大，是不是反革命总应该定个案，不应该拖这么久不理睬，这是第一个原因。其二，“文化大革命”到今

天已有5年多了，下迁已经完成。眼前已面临招生的局面，学生一进来，就需要教师，他们又要用得着我了。其三，小文提出离婚，法院要对案件进行处理，牧医系就再没有办法对我的问题挂着不管。是离，还是不离总得有个结果才行。其四，是后来又听说我的大哥要回国观光，探亲。若一旦回来，就会看到我被定成“牛鬼蛇神”的情况，有损学院声誉。

有此四点新情况，所以，对我的问题他们就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牧医系现在是个什么形势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已5年多，从“专政”，“武斗”，“夺权”，“步行王庄500里”到“下迁”。整人的人，被整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吃了不少苦头。惜别了居住多年的美丽的王陵，来到如今这草原小镇，无人不对学院旧址有着深深的怀念。人人都无可奈何，每人心中都窝藏了一股难言的怨气。他们窝藏在胸中的积郁，有意无意地发泄到了对我的问题处理的意见上。

有人说：“人家孩子都3岁了，爸爸都还没有看见过，这不是作孽吗？这事落到谁的头上不窝火？不当这农学院的教师，未必就不活人了。”

在舆论的压力下，牧医系才不得不安排了小文带着小宁宁到大梁来和我见面。她在她们的副院长亲自陪同下，由河北省远道跋涉到大梁来了，她是在副院长的陪同下来办离婚手续的。

小宁宁问妈妈道：“妈妈，我们到哪里去？”

“到你爸爸那里去。”

小宁宁幸福地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副院长就坐在他俩的旁边。

小宁宁把嘴紧紧地闭着，然后突然一张开，做出了“吧！”的一个声音，一个叫人十分疼爱的小动作，然后高兴地说道：“啊！爸爸，大爸爸真好。”

小宁宁总把一个“大”字当作最美好的字眼。副院长顿时产生了疑惑，莫非小文这次去了不办离婚？这在他的脑海中产生了疑问。

聪明的小文立刻对着宁宁说道：“宁宁，你听着，爸爸那里有个大黑吴苑新！”

宁宁惊恐地搂住了妈妈，说道：“怎么啦？”

小文用手做了一个大嘴巴的样子，说道：“哇！大黑吴苑新，哇！”

宁宁吓坏了，紧紧地抱住了妈妈。副院长坐在一旁，淡淡地笑了一笑。

牧医系管我专案者之一朱为政忽然来到果树队，要与我谈话。他把我叫到一间屋内，十分慎重的样子。我说：“不知道今天又有什么新花招？”

他首先说道：“你的问题并没有定案，不要自己把自己当成反革命。”

我抢过话头说道：“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反革命，我根本就不是反革命，是谁把我当成反革命，你应该十分明白。”

他说：“我话还没说完，你冷静一点不好吗？”

我说：“对不起。我现在是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改造，

我并不想留在这个农学院，我的书也教到头了，今后当个农民又有什么不好？我要干活去了，没别的事，我就要走了。”

他急忙说：“你怎么这样性急？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我说道：“我变了？还有什么好急的？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反革命也当了。”

“这不是还没有定案吗？”

“定案？要杀要剐，你们定吧，我要下地干活去了。”说完站起来想走。

他急忙说：“嘿！扯到哪里去了，你老婆来了，带着孩子看你来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我一下子坐了下来，默默地一句话也不说。

他说道：“你要冷静，不要发火，听我把话说完。”

我一句话也不吭声。

他继续说道：“你的问题并未定案下结论，既然你都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那就要有信心。你老婆带孩子一是来看你，要把孩子交给你，二是来办离婚。”

紧接着他急忙说：“你先别急，听我说完。离婚没有那么简单，还有她们医院的副院长也来了。”

他接着说：“一个王八羔子，癞哈蟆（意即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副院长当得不耐烦了！这事我们会处理的，你不用管。”

停了停，他又接着说道：“大老爷们还会把老婆丢了？你吴苑新也是个人才嘛！总之一口咬定，不同意。别的事就都好办了。”

我说：“不对，我同意。”

他说：“什么？你同意，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会同意离婚？那孩子怎么办？”

我说：“叫我，我也不愿意当反革命的妻子。”

“我不是说还没有定案吗，谁说你是反革命？”

他急忙又说道：“在大梁招待所给了你一间房子，她是你老婆，任何人不敢来找你们的麻烦，你就去好好地和她谈谈吧。记住，咬住一句话‘不同意’，他们那个副院长，我们会对付他的。这号玩艺儿好答对，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再也没有说话。

我默默地和他一起走向大梁招待所，从果树队到招待所至少有五六里远，一路上我陷入了回忆：“小文，真对不住你，这几年你辛苦了。”

进屋后看见小文，我们陌生了。小宁宁紧紧地搂着妈妈的一条腿，仰头望着我。我忍耐不住顿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哈腰抱起了小宁宁，他一点也不躲我，当我把他抱起来后，两只小手一下就搂住了我的脖子。

他高兴地说：“爸爸，啊，爸爸，你是我爸爸，我看见你的（以后得知，他是看见过我的像片）。为什么你不来看我？你不是说坐飞机来吗？”

“飞机？什么飞机？”我奇怪地问道。

过了一会儿我醒悟了，说道：“呵！对，对，飞机。等一会儿我带你去买一架好不好？”

他撒娇地把脖子使劲向后仰，说道：“好哇！我要一架大大的。”我急忙用一只手扶着他的头，再把他抱正在我的

胸前。

我说：“对，对，大的，大大的。”

小文说：“宁宁，下来，不要缠住爸爸。”

宁宁说：“不嘛，我不下来，我不下来。”

我说：“好，好。不下，不下，爸爸抱着说话。”

小文看见孩子亲热我的情景，在嘴角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也许是一种苦笑，也许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母爱和微笑。3年来她从来没有家庭的温暖，拥有的只是苦难，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凄凉。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带孩子吃饭去吧，我们回头再谈。”

我急忙说：“你到哪儿去？”

“你不用管，我要和别人一起去吃午饭。”她冷冷地回答道。

我说：“我们一起吃饭嘛。”

她说：“不，我要和别人一起吃午饭，你带宁宁去吧。”

“别人？谁？叫他来我们一起吃饭好了。”

她仍不同意，说道：“晚饭和你一起。”说着就走出去了。

回头又补充了一句话：“我明天就走。”

我急忙说：“宁宁，你跟妈妈去吧。”

“不，我跟爸爸，我跟爸爸吃饭。”小宁宁喊道。

事后得知，她去陪那位千里迢迢与她一起来的副院长了。

小文刚一出门牧医系的人早就迎上去“陪同”了。后来

得知这时已传说我的大哥要回国探亲了。

我牵着小宁宁一起去到那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和几家小铺的街道上。这时，省委拨的钱正在给下迁大梁的牧医系修建教职工宿舍，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分别挤住在这小小集镇上的各个老乡家中。当地老百姓从来没有机会能够收到这样一笔额外的房租收入，所以无论多挤，他们也心甘情愿。

我带着小宁宁出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同情。我完全不在意这些人是如何远远地注视着我们。

小宁宁和我相互之间的感情，发展得如此惊人的迅速，好像我俩早就是老朋友了一样。农学院的人没有一个不啧啧称奇。

他们说：“这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可是第一眼见了就亲得什么似的。可真是血缘关系亲无比啊！他怎么见了别人不亲，就偏偏要亲他爸爸呢？”

有几个人商量好，要来恶作剧一下。几个牧医系的青年教师走了过来。

其中一人说道：“嘿！宁宁，你弄错了，我才是你的爸爸呢！”

小宁宁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我慌忙弯腰把他抱了起来，他紧紧地搂住我，惊恐万状地看着对方，在我耳边说道：“爸爸，你可要当心，有个大黑吴苑新啦！”孩子不知道吴苑新就是他爸爸的姓名。

我听了后说道：“什么，你说什么？”

他一字一句极其认真地说道：“大黑吴苑新！啦！”

我听后不知所云，一丝苦笑挂上了嘴角。

这几个牧医系的青年教师哄然大笑起来，他们的笑声，把个小宁宁吓得更加紧紧地搂住了我。

以后，整个牧医系无人不知小宁宁警告我的“那个大黑吴苑新”的“名言”，这个他们认为是十分可笑的笑话。

我带着宁宁来到百货商店，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姑娘售货员迎了上来，那时国营商店的售货员是很少主动迎接顾客的，爱买不买，不关我的事，今日之所以迎上前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熟悉，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看孩子可爱，来逗逗孩子玩。

这位小姑娘早已知道了我的故事，因为过去我从果树队去商店购物，她就会和我聊天。她说：“离就离呗，一个技术人，大老爷们还怕找不到一个好看的姑娘？”

今天我一进屋，她就迎了上来，亲切地逗小宁宁。还到柜台里拿糖给小宁宁，但宁宁不接。

我说：“宁宁，阿姨给糖，接着吧。”

他仍然不接，用一双疑虑的眼光看着我。

我又说：“宁宁，爸爸说可以要。”

他一把就把糖抓了过来，引得小阿姨和四周的人哈哈大笑。

我带他到柜台前买玩具，可惜这里没有大飞机，只有一架很小的，造型也不好。我抱起小宁宁，让他看柜台里的玩具。

我说：“宁宁，你可以任选一件。”

他疑惑地望着我，然后轻轻地问道：“爸爸，你有钱吗？”

“有哇!”我回答道。

他看了好一阵子,仍不说话。

我催促他:“宁宁,快点挑哇!你要什么?”

他要我把他抱高一点,对着我耳朵又问一遍:“你有钱吗?”

“有哇!你任挑一件,两件也可以。”我再一次回答道。

他胆怯地指给我看,他要那一把枪。这是柜台最大的一件玩具,是一只步枪型的木头枪。于是,我就请小阿姨拿给了他这只木枪,付完了钱。

小宁宁抱着几乎有他身高三分之二那么长的木枪。我问他还要不要别的玩具,他心满意足地摇了摇头,不要别的玩具了。

。 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小宁宁与我亲密的劲儿,感动着所有知道我的故事的人。

晚上,我尽一切可能为小文和宁宁准备了晚饭,吃晚饭时小宁宁对我这个亲热劲儿,大概也深深地感动着小文。昔日我俩亲密无间的情形已经不见了,“离婚”二字在我俩之间拉起了一层无情的幕纱,把我俩的心灵隔离开来。

晚饭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要饮酒,这儿只能买到当地的一种烈性白酒,她大口地饮了几杯酒后,不愉快的离婚谈判,便被酒醉代替了。

小宁宁吃完一小碗食物,大概是白天与爸爸相聚的兴奋使他太疲劳了吧,抱着他心爱的木枪,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睡梦中脸上还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我并没有饮多少酒,看见她醉了,就替她盖好被,独自一人坐在一角回忆、幻想

……和衣而坐直到天明。

第二天早晨，我为小文准备好早饭，因为她决定坐早上10点半的火车离去，她说孩子她不要了，留给我。

我抱着小宁宁送小文到火车站，那位副院长也出现在火车站上，小文虽然仍一口咬定要离婚，但是她自己也已体会到这个婚暂时离不了。小宁宁什么也不明白，在我和小文之间跑来跑去，高兴得什么似的，拿着他心爱的木枪向着远方的小树瞄准。

火车快开动了，我抱起小宁宁，小文走上火车，在窗口上对着小宁宁摆手，小宁宁一点也不在意，依然全副注意力在他的木枪上。火车一声长笛，开动了，小宁宁才如梦初醒。

他惊恐万状地喊道：“爸爸，妈妈走啦！爸爸，妈妈走啦！快上火车呀！爸爸快上火车呀！”

我紧紧地抱住孩子，两行热泪。

小宁宁哇地一声大哭起来，用一只小手指指着火车开走的方向，弯扭着身体使劲地向前探。大声地叫喊：“妈妈，妈妈！……”

他不断用两条小腿在我身上乱蹬，我刚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向着火车开走的方向追赶，我赶紧跑上去又把他抱起来。他一面哭，一面喊妈妈，不断地说：“你不是大爸爸，不是大爸爸。你不好，你不好，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哟！怎么办，怎么办呢？……”

月台上有的妇女跟着哭了，牧医系的人全躲开了，这种局面谁也无法沾边，大梁地方不大，农学院中我这点事早已

尽人皆知，看到这个情景的人，无不摇头叹息。

有人说：“啥世道，这不是作孽吗！”

一个认识我的妇女，走上来对我说：“你快把他抱走，不要在火车站。越是这样他越要哭，会把孩子哭坏的。”

于是，我就一手抱着他，一手替他拿着木枪向着招待所走去……

第十六章 鸡场育子

小文把孩子扔给我任性地独自走了。当地的贫下中农和牧医系的教师，尽皆议论纷纷，这给牧医系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

大家议论纷纭。其一，吴苑新究意是什么问题？拖这样久不能落实政策。其二，像吴苑新这样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够独自一人带这样小的一个孩子？

牧医系专案组的人一个也没有露面。我独自一人抱着用小手不断地捶打着我，小脚不断乱蹬，哭喊着要妈妈的小宁宁，回到了大梁招待所（即旅店）。招待所的小姑娘（服务员），跑前跑后极想帮我的忙，但又帮不上忙。她一会儿送来面盆，一会儿送水，这在当时的旅店是绝无仅有之事，哪有服务员侍候客人的，一切事情都是旅客自己动手。

小宁宁拒绝吃喝，不断地哭喊要妈妈，一

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哭得已经很累，很累了。

他可怜巴巴地问我：“爸爸，我想妈妈怎么办呢？”

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继续抱着他。已经晚上 10 点钟了，他仍然哭泣不睡觉，一个劲地哭喊要妈妈，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哄他不哭。

我就对他说：“你看见那个月亮了吗？”

他睁开眼睛，带着稚气的童声一边哭一边说：“看见了。”

“你不要哭就有办法让妈妈来。”

他立刻就停住了哭泣，问道：“什么办法？”

“你闭上眼睛睡觉，就会把天上那个月亮从天的这边睡到天的那边，月亮看见你乖乖地睡觉，她就会告诉妈妈，叫妈妈回来。”

他说：“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我说道。

他抬起头来，小心地看了一会儿月亮，然后用力把嘴闭上，企图以此帮助把眼睛闭紧，然后把头用力地顶在枕头上，一动也不动，“用力”睡觉，好把月亮从天的这边睡到天的那边。

孩子毕竟是哭得太久太累了，不久他就入睡了。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轻脚轻手地站了起来，开始整理小文留下的孩子的小衣服，做各种我认为必须要做的家务事……

午夜时分，小宁宁突然惊醒了，第一件事就是惊恐地寻找天空的月亮，当 he 从窗口看不见月亮时，就一定要我把他抱到门外去看月亮是不是已经走到天的这边来了。我只得用

他妈妈留下的小被把他包着抱到门外，他看见月亮还没有走到天的另一边，就急忙要回去，好快些把月亮睡到天的这边来。

他躺在炕上天真地说：“爸爸，你也快来睡，我们把月亮睡到天这边来，妈妈就来了。”

听见他天真的语言，真是叫人心酸不已。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着了，我已十分疲倦，和衣睡在孩子的身旁，一觉醒来，看见宁宁已经爬到了炕头，去看天上的月亮，我急忙抱住他，帮助他穿上衣服，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外面看天上的月亮，当他看不见天上的月亮时，又伤伤心心地哭了起来。但是，这次他不是问我要妈妈，而是反复追问我月亮哪里去了。

孩子不吃不喝一心想妈妈。我想这怎么得了，这样下去会生病的。他又哭了好久，我一直抱着他。突然他停住了哭，带着抽泣的声音，在我耳边出乎我意料之外十分伤心地说道：“爸爸，我们不想妈妈了，我们都想累了，还是让我们来想我的那只枪吧。”

我说：“好，好，想枪，想枪好，想枪好。”

于是，我急忙从炕上找出木枪来给他抱上。

“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经7年多了，牧医系的教职员工，乃至大梁的贫下中农都对我的问题的处理有意见，认为太拖拉，太不负责任。实际上在这些渴望着向上爬的“七品芝麻官”的心目中哪有我这个吴苑新。我们夫妻是否团聚，政策落实得快或慢，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不关痛痒的小事一桩。

系党总支书记胡建华，见到今日的情况，第三天就作出了决定，通知我不再去果树队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改令我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去管理鸡场。

这个鸡场是牧医系下迁大梁之后自己建立起来的。与果树队一座小山之隔，现饲养有莱克亨种鸡近千只。这是由养禽学教师陈志方为主抓起来的牧医系自属鸡场，是牧医系可以完全自主的“产业”。陈志方乃当年“保皇派”的主要头头之一，后来反戈一击作了造反派，到我家中去抓我时，一拳打在我左眼上的就是他，他夫妻二人都是本学院牧医系首届毕业生，都是我教过的学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始之时，血统论特别吃香，他们推出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一向无意争春，与人无争，但有些人的“马列主义手电筒”，总是在不断地照人，要“帮助别人进步”。

现在又叫我去鸡场，自然是因为我带着一个小孩，已无法继续在果树队劳动，叫我去牧医系自属鸡场，显然是一种照顾。我的体力好，既然不教书了，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改，还是独自一人去管理鸡场都行。一个人去管理鸡场，对我带孩子来说当然是要方便多了。第二天气温陡降，一夜之间下了一尺多厚的雪。我把小宁宁寄放在原生理生化教研室聂老师的家中，就到果树队去借毛驴车，常队长一听说是我要借车拉孩子，立刻帮忙套车，甚至还想派大车（即中国北方地区常用的一种马拉的两轮马车）为我跑一趟，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自己赶着一头毛驴车来到大梁镇上，在生理生化教研

室聂老师的帮助下，把小宁宁裹在棉被里，再用绳子横竖三道把他固定在车的中央。此时满天鹅毛大雪，我必须在黄昏前赶到鸡场，因为我知道从镇上去鸡场的山路中，将会经过两个大的采石场。这采石场在路旁形成两个一房多深的大坑，在此大雪天，由于大风卷动雪花，早已将采石场填平，若不知道路的人以为都是一片雪地，误认为是平地，连车带人一旦掉进此采石场大坑立刻就会被大雪埋住，而大风转眼间就会将走过的车迹填平，整个冬天也不会被人发现。这是十分危险的。我对此段山路很熟悉，只是毛驴车难驾驭，大雪天毛驴犟着性子乱窜，风雪迎面，宛如利刃，我用一只手勒住缰绳，另一只手执鞭子，呵驭着毛驴，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走在毛驴车旁。

小宁宁掀起一个被角娇气地对我喊道：“爸爸，小马车真好玩，你也来坐车嘛。”

“我不能坐，我要赶车，风雪太大小毛驴太犟，不听话。”我一边大声地回答，一边用鞭子抽打毛驴，我把皮毛帽拉得低低的，让耳扣住下颌，以免大风把帽子刮走，嘴上戴着口罩，呼吸的水气在眉毛上和眼睫毛上结成了冰，妨碍了我看路，我不得不用手抹掉眼睫毛上的冰渣儿。

“爸爸，你不要打它，它多可怜啦！还要拉车还要挨打。”小宁宁掀起被角大声地对我喊道。

“它不听话，不打不行。”我大声地迎风喊着回答。

“爸爸，我听话，你不要打我，呵！”

“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我听话，爸爸不要打我！”

“不打，不打，我不会打小宁宁的。我喜欢宁宁。”

“我喜欢爸爸，我爱爸爸。”

我俩就这样一边说话，一边艰难地向着鸡场走去。上得小山，就是采石场，虽是大地白茫茫一片，但我却清楚哪儿是采石场危险的大坑，哪儿是驴车可以通行的小道，小毛驴“得、得、得”地一个劲儿地往前窜，它很犟很难驾驭，好在我早已熟悉了它的性格，所以在这大风雪中我仍能驾驭它通过两道采石场。

我们终于到达了鸡场，此鸡场为前后两排房子所组成，后排有三间，前排两间，中间是用篱笆围起来的鸡的活动场所。前排一间住人，另一间作库，后排全养鸡。规模不大，但却也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鸡场的后面是一座小山，前面是一个大水塘，水塘的那边也是一座小山，其背面就是果树队。水塘两端都是山沟荒地，在这严寒的冬季，零下30℃的气温，水塘早已冻成厚厚的冰层。我把驴车牢牢地拴在一个木桩上，把孩子抱进了室内。在我去接宁宁前，就已生着了住室的火炕，我把孩子放到炕上后，他很高兴地在炕上跳来跳去，也不哭叫着问我要妈妈了。

他爬在窗上看外面的小毛驴，很高兴他是坐这个车来的，并不断地问我鸡咯咯在哪里？

我把简单的行李搬进屋后，天色已晚。眼下的困难是这头小毛驴怎么办？没有拴毛驴的圈栏，又没有饲料来喂它，拴在外面，在这荒山上夜里是会被狼吃掉的。送毛驴车跨过水塘和一座小山就是果树队，但我若赶车走了，在这雪地里行走，至少也得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回来，在这空无一人的荒

山鸡场里，小宁宁一人怎么办？这儿又没有电话可以通知他们来取，但借果树队的毛驴车怎能不还呢？

天已经全黑了，雪又下大了，毛驴还拴在外面的木桩上，怎么办呢？我打开门站在外边，除了我这屋里有这半山腰的唯一灯光外，外面一片荒野，果树队的灯光被小山挡住了，一点儿也看不见。当我开门时一只像狗一样的动物，被我一惊一溜烟地跑走了。农家养的狗是不会晚上跑到这儿来的，这就是本地的一种野狼。我立刻意识到任何时候必须注意关好门，所以我立刻就用两条粗而结实的短绳拴在门上，以便我出外时，把绳子打一个结，门才不会自动打开。

如何才能送还毛驴车，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我关好门回到室内，正在十分为难之时，突然听得有人敲门，我操起一条短棍。

隔门问道：“谁？”

门外答道：“是我们，常队长叫我们来赶毛驴车的。”

这真是喜出望外，隔门缝一看果然是果树队的人，急忙开门把他们让到室内，只见他们一人手执一根短棒，这是本地人晚上出门防狼用的。进门后他们立刻过来看小宁宁。孩子胆怯地躲到我的怀中。

我说：“宁宁，叫叔叔。”

他俩想给点什么东西给孩子，但摸了一阵子却什么也没有。

他俩告诉我，奶牛场的人叫带口信给我，叫我去买初奶，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我都很好，在他们的身上还有我们民族所固有的传统，他们不愿在人危难之时去整人，不愿干那

“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确是十分善良的劳动人民。

什么是初奶呢？初奶就是奶牛刚下了小牛犊后产的奶。这种奶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甚高，若将初奶放在碗中蒸，会变成蒸鸡蛋羹一样的食物。奶牛场的工人都是本地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知识分子被认为“有问题”就下放到贫下中农中去劳动改造，已经生活在这最低层的贫下中农还往哪儿下呢？所以这个“失”字对他们已不具太大恐吓性，他们只按照数千年来就在这古老国土上，代代相传下来与人为善的道德水准生活着。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开始了管理鸡场的劳动。我在牧医系教书多年，养鸡养猪等劳动经常参加，一件工作交给我，我总会尽心竭力地做好，这是他们久已了解的，所以鸡场交给我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出面来过问任何事。我独自一人管理鸡场，这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工作，鸡场后排房子中间大屋的中央有一个火炉，炉子外罩有铁丝网，以防止鸡靠近炉子。此炉生火维持室温，与此屋相通两间边房，室内都搭有数排供鸡产卵的窝架，每架都有五六层，每排窝架都有几十个供鸡产卵的窝。每间屋的前墙根都有两个通到外面的小门洞，供鸡自由出入到前排房。以前排房后墙为界，用铁丝网围起一个宽大的鸡的活动场。场地里放有几个盆子，需要经常换水供鸡饮用，每次加水不能太多，因为时间长了水就会冻成冰，鸡无法饮用。气温太低时鸡都不爱出来，就得在室内多加饮用水，但给鸡进食我都是在外面的场地上进行，让鸡活动，活动是有好处的。每次给鸡喂食，我先在外面把鸡食放好，然后把门打开，以免鸡同时从小门洞出来拥挤，会造成挤伤或踩

伤。一切进食工作准备妥当后，我站在外面场地一吹口哨，顷刻间鸡就会连扑带飞地奔出来，这时就是我进入室内清扫，检查病鸡或受伤的鸡或拾鸡蛋的最好时刻。

我的工作是一切全包，清扫鸡舍，调制饲料，定时饲喂，检查伤病鸡以及防止野兽攻击……我走到哪里，小宁宁都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寸步不离，再说他若离开我，我也放心不下。但是每当我清扫鸡舍时，室内灰尘太大，所以我只得在扫一间屋时，就把他放在隔壁的一间屋内。他不断地叫我，我不停地回答使他壮胆。

莱克亨鸡产卵大，母鸡一般较温顺，但公鸡却好斗。有一次我看见外屋的鸡都到外面场地里吃食去了，并且该室我已经清扫干净，我就叫小宁宁站在外屋，我去清扫里屋，小宁宁害怕。

我说：“宁宁，你是一个男子汉啊，还怕鸡吗？”

“爸爸，我不怕”

“这就对了，不怕，”我递给他一把小火铲说道，“拿着，鸡来了你就用它把鸡赶开。”

他回答道：“嗯。”

我到里屋清扫去了，不一会儿听见宁宁在外屋大哭起来，我慌忙跑出来，看见宁宁手里拿着小铁铲，坐在鸡饮水的盆中，全身湿了个透，一只大公鸡平低着头，颈毛倒竖，正准备扑起翅膀向小宁宁进攻。我抢上两步站在公鸡和宁宁之间，用脚去吓鸡，想把它赶跑，没想到这只公鸡竟飞起一人多高，向我猛烈进攻，我一伸手就把它抓住了，用另一只手忙把宁宁从盆里提了出来，他全身湿透，站在那里。

我把鸡抓到宁宁面前，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打了鸡几记“耳光”。

说道：“看你还敢欺负宁宁不！”

宁宁高兴地笑了，但却站在那里冻得直打哆嗦。我用一只手抱起宁宁，用脚把门踢开，把鸡抛向院中，这只公鸡咯咯咯地飞了好远，但一着地马上又掉头扑向前来，向我们进攻。我没有时间去和公鸡周旋，急忙把宁宁抱到前屋，替他脱去湿衣，用被包起来，放在炕头暖和处。

但是，他还是感冒了，直打喷嚏。我烧姜糖水给他喝，又用油铜钱给他刮背。我在幼年患感冒时，母亲就是这样替我治病的。这种土办法果然有效，第三天宁宁的病就好了。从此后我就更加小心了，因为这种莱克亨公鸡会主动地向人进攻，3岁的小宁宁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我也太粗心了，万一公鸡啄了孩子的眼睛，岂不是造成孩子终身残废？于是，我就特地去买了一顶带沿的帽子，以保护他的眼睛。

有一天，宁宁躺在炕上，我正准备去抱他，没想到他突然一下子窜了起来，他的头顶正好重重地碰撞在我的眼睛上，这一下真是撞得很厉害，我的眼睛疼痛不已，我翻身仰睡在炕上，真想生气，但小宁宁却忘记了自己的疼痛，爬到我的身上来，用小手摸我的眼睛，并用嘴吹，忙得个不行。

他一面还说：“爸爸，你痛吗？我替你医啊，闭上眼睛，我给你医啊。”

我俩的感情与日俱增，他每日跟着我，寸步不离，父子二人真可谓相依为命。我俩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一天，我用自行车带着宁宁去大梁粮站买粮。由于我对

小文的思念，脑子里突然产生出一种迷信念头：童言出真情。

于是，我就轻轻地对宁宁说：“宁宁，你说妈妈什么时候会来？”

我满以为他立刻就会回答“明天”，因为他是那样的想念妈妈。却不知这个问题对3岁的宁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他想用最美好的话来回答。他默不作声。

我又说道：“宁宁说，妈妈什么时候会来？”

他皱着眉头，握着小拳，用力地说出了在他脑海中能搜寻到的最美好的字眼：“百十年。”

“什么？你说什么？”

“百十年！”他更加用力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我气极了，停下车拉出他的小手就打了两记手心。宁宁惊恐而伤心地哭了起来。

说道：“是百十年嘛，妈妈百十年马上就来了。”

“说明天，不许说百十年，说妈妈明天就来。”我生气地喊道。

孩子惶惑不解，用小手擦着眼泪，惊慌地跟着说：“明天，爸爸，明天。”

宁宁惊恐的样子刺激了我。“愚蠢！我怎么迷信起来了，怎么可以这样责怪孩子呢。”

我拉起宁宁的小手抚摸着，说道：“宁宁，爸爸错了，不能打宁宁，爸爸爱宁宁。”

他很快就转啼为笑，伸手搂着我。于是，我俩又和好如初了。

10多年后，宁宁已经长大，我问他还记得这件事不，他说他还记得很清楚。

“你当时为什么要那样说呢？”

他说：“那时我才3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百十年’当时是我脑海里最神圣的字眼，你问妈妈什么时候来，我当然就用这最美好的字眼‘百十年’来回答了。”

这件事成了我们父子俩常常回忆的佳话。

还有一回，我把宁宁托付给人代看一会儿，我去买点东西。此时的宁宁一会儿也离不开爸爸。他不断地问叔叔道：“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叔叔顺口答道：“1分钟就回来。”

“1分钟？叔叔，1分钟是多长哇？”

我购物回来后，宁宁高兴地向我奔跑过来，代看的叔叔讲给我听，宁宁问“1分钟是多长哇”的神态，逗得我哈哈大笑。

我说：“宁宁，1分钟就是60秒。”

“60秒？60秒是多长呢？”

我拿出钟来数给他看。

宁宁说：“爸爸，你不是1分钟，你是好久，好久哟！”

春天快要到了，我必须去果树队取行李，宁宁要镜子，我在果树队有一面小镜子。一天中午趁宁宁睡着了，我反锁上门，飞快地顺着堤坝跑到果树队，快速捆好我在果树队剩下的东西。大家围着我寒暄，我快快地结束了交谈，跑回到小山顶上，便听见小宁宁在对山鸡场里用力地叫喊爸爸。因往坝上要转一个圈，于是，我就直接从水塘的冰上奔了过

来，冰块发出巨大的轰隆声。此时已是初春，冰块已开始溶化。这轰隆声就说明冰已不能支持人体重量，随时有可能掉进冰窟窿中。既已到了冰上就无法后退，我慌忙弯着腰，一个驰溜滑了过去，冰块发出不断的轰隆声吓得我一身冷汗，滑到对岸慌忙跑到半山鸡场，打开门看见小宁宁全身都光着，站在地上冻得直哆嗦，哭喊着爸爸。我心痛地把他抱到炕上，把他哄不哭了，我指给他看在水塘的对岸的行李卷。

我说：“宁宁，你不是要镜子吗？这就在那行李中，你看着我拿去拿好不好？”

宁宁终于同意了。于是，他叫一声爸爸，我答应一声。虽然我越走越远，相互间声音越来越小，但他一直在叫，我也一直在回答。我再也不敢往冰上走了，我绕道坝边，总算把行李取了回来。宁宁和我抱在一起，发出了来自心田中的笑声。

白天宁宁和鸡占据了我全部的时间。但是，晚上孩子入睡后，我仰望着窗外的星斗夜色，却是思绪万千。我下意识想起了少年时代读过的诗句：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

是的，“志向”“理想”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确实曾经有过。但这“志向”和“理想”却也变成了一个“笑话”，一场“噩梦”！

记得那还是我遥远的少年时代，也许是1946年吧——我还是重庆市市立二中的一个中学生。有一天，我和同年级的好友李辑祖和王学思同时读到了一本关于“衰老研究”的

小册子，书里的内容引起了我们三人的极大兴趣和遐想。我们三人传递着反复阅读、抄写，整天谈论着这个神秘而十分有趣的问题。渐渐“探索衰老和死亡之谜”，就成了我们三人极其幼稚的“志向和理想”，变成了我们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神圣誓言”。重庆解放了，共产党领导中国。1952年我被组织保送去重庆大学进修学习地质学，没想到李辑祖和王学思也正在重庆大学念书，李辑祖就读物理系，王学思就读化学系。少年时代的密友，意外重逢，立刻就变成大学时代的至交。我们几乎在每天的课余时间或周末，都聚在一起。我们献身于科学理想的梦复活了，我们三人决定李辑祖从物理学的领域，王学思从化学的领域，我从生物学的领域向探索衰老和死亡之谜前进，决心终生不渝。

李辑祖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生活已经大大地满足，社会就会全心致力于科学，人们就会都要求能够活得更长一些，探索衰老和死亡之谜就会刻不容缓地提上日程。”

我们为自己所树立的人生志向和理想振奋。我们常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还决定要努力学习外国语，以便能阅读更多的资料。

我最喜爱的一句名言是：

“什么是生命以及死亡的秘密究竟在哪里？这是人类从开始思维和有意识地对待周围环境时起就感觉不安的两个问题。”

李辑祖说：“从现在开始我就要从哲学的角度，写一本书来论证衰老和死亡研究的现实性、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论

证衰老与死亡的本质是否可以探索。”

我当时是组织保送进修地质学一年。这一年中我除了学习指定必修的地质学外，还在图书馆中借阅其他书籍，并开始准备投考生物系。当时，我们三人轮流每两三周作一次十分幼稚的“学术报告”，来谈论“衰老研究”和“死亡和年龄问题。”我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作的一个“学术报告”。它的题目是：“建议设立一门新兴的科学——衰老生理学”。现在回忆起来虽然十分幼稚，但绝不是像被反复批判时所说是“反动的”。我说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地向前发展。人类古老的梦想，飞向月球将会成为现实。一个使人迷惑难解的衰老与死亡问题之研究，亦将提上日程。

生命问题，是人类活动中探索的一个中心问题。过去人们对生命的解释，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方法。人们相信体外有灵魂的说法。中国有句俗语，“不修今生修来世。”也就是相信体外有灵魂。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曾说：“生命之体除去肉体，有如蝴蝶从躯壳中飞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说：“在人体外有一种力量驾驭躯体，如像驾驶一条船一样。”

18 世纪对生命之解释出现了一种新的机械论，认为并无灵魂。例如医生波尔哈伏，认为肌肉是弹簧，心脏是一个泵，肾脏是一个过滤器。

19 世纪哲学家米奈（1801—1858），认为体内有灵魂。直到 20 世纪，科学家谢灵顿（1857—1952）亦认为人体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和一个罪恶的躯体。

所有这些都不能满足人们解答生命之谜。一位苏联学者认为，“寿命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另一位学者认为，“死亡与生命问题是一种自然现象，人们没有必要去解释这种现象。”

对此我有不同看法，饮生水会生病，就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当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后，就可以否定此一现象。若因水中有细菌，就可将水烧开后再饮。死亡与生命问题是一种自然现象，不能因为我们尚未弄清楚死亡与生命之秘，就说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就不去研究它。

我觉得年龄问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现在我们计算年龄的方法，是一个人为的年代年龄。就如我们规定多重是一斤，多长是一尺一样。这是人为规定的。但事实上应该有一个“生理年龄”。例如头发变白，牙齿脱落，血管硬化等，都是生理年龄的一种表现，而甲状腺的机能却与头发变白和牙齿脱落有关。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遐想，如果我们探索到了“生理年龄”的机制，我们就可以采用一些步骤和方法去影响年龄。可惜如今人们说到年龄，都是年代年龄，真实的“生理年龄”却仍然是一个谜。

两个人同样在年代年龄上都是 60 岁。但是，“生理年龄”却不一样。有人年代年龄 80 岁，但“生理年龄”却年青很多，而有的人年代年龄 50 岁，但却十分衰老，说明“生理年龄”不一样。若说人的年龄只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妨来看看动物的年龄：

动物名称	年代年龄
家兔	5—7 年
骆驼	40 年
狗	10—15 年
猪	15—20 年
猫	8—10 年，有的 15 年
马	20—30 年

若说年龄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动物的年龄则应该如何解释呢？

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实验。将一个普通蜜蜂的卵，移植到一个较普通蜂巢略大一点的人工蜂巢中，再放上一只工蜂上颚腺分泌的一种酸性物质，即王浆于其上。于是，工蜂就会以王浆饲喂它，而其它蜂巢则饲以蜂蜜。如此，王浆饲喂的就长大成蜂王，而蜂蜜饲养的就长成工蜂。工蜂的年龄通常为 8 个月，而蜂王的年龄则为 3~4 年，竟是工蜂的 5~6 倍。这是什么原因呢？仅仅因为食物不同吗？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希望我今后能有机会研究它（掌声）。

此外，机体不同器官年龄也不同。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在不同年龄中的表现也不同。

还有一个故事，用年青动物的血浆培养的组织细胞，较之用老年动物的血浆培养的组织细胞寿命要长得多。

现在我要问：“生理年龄”究竟在哪里呢？体内甲离子

浓度之高低？或由细胞中蛋白质之结构的状态而决定？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问题，希望我们的一生能够有机会从事这个伟大而又有趣的问题的研究。谢谢你们。

1954年，我如愿以偿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进入了南开大学生物学系。从二年级开始，我就不知天高地厚着手写我那幼稚的理想之作——《为建立一门新兴的科学——衰老生理学而斗争》，也就在这一年的一天，突然有人从重庆前来外调，我在重庆大学进修期间和李辑祖、王学思三人搞了些什么活动，谁是负责人？

我说道：“我哇，我就是负责人。”

外调的人说：“你别乱说了，我们已经查清李辑祖是负责人。”

大概是我在学校念书表现很好，系党总支部书记还特意告诉我，说是我没事了，自己好好学习。我当然莫名其妙。

但从此李辑祖和王学思与我就失去了通信联系，一直到1958年我才得知，说我们当时在重庆大学是组织了“反动组织”。据说李辑祖是被学校开除了。对此事我一直也闹不懂我们怎么会是什么“反动组织”呢？

1958年，我大学毕业。每一位同学这时都面临着一个所谓“毕业分配的考验”。这就是说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做到“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服从分配就意味着断送自己的“前途”和“政治生命”，当然这也包括了“饭碗问题”。

我曾常自问：“什么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幼年时代的理想在成熟的年龄里实现，就是美好的人生。”

大学毕业分配我曾竭尽全力，争取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衰老研究室”工作。当时南开大学毕业分配方案很好，一半以上同学都可以分配去中国科学院。我呈交上去我写的《为建立一门新兴的科学——衰老生理学而斗争》手稿，竭力争取幼年时代的理想在成熟的年龄实现。但是，我的现实情况决定，我不可能如愿以偿。我被分配去了农学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把我青少年时代的“衰老研究”理想（其实，也许只能叫作青少年时代的幻想），作为我的历史问题扯了出来，旧调重弹，上纲上线地批判一番。说什么“衰老研究是唯心主义”，说我“是想寻找长生不老仙丹”。这真是你说东他说西，你说葫芦他说鸡。对这些无稽之谈，这些无聊的指责，难道有必要去讲个明白吗？爱批判就批判好了，这样的狂吠乱叫若能捂住耳朵不听，就真得谢天谢地了。所幸的是我从一位造反派的口中得知，我们的衰老研究“反动组织”后来改定成了“落后学生组织”。据说我们的错误是“我们的理想超越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超越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词，原来是因为不知道他们怎么查出了李辑祖说过：“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高度的满足后，就会极大地重视衰老研究，追求生命的高度美化和生命的延续。”这句话错在“超越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几个学生居然把“错误理想”放到了“最崇高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之上，因而就是十分反动的。这真是奇怪的逻辑，难道共产主义就不需要科学

研究吗？

几十年以后，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998年就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今天的中国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视科技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抚今追昔，不胜感慨，如果是在今天，我幼年时代的理想，也许可以实现吧。

当时，我实在想不通，我们青年人在科学上有一个理想也不行！只有“规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才是理想”？只有官方规定的理想才可以存在吗？

这些时候，整天宣传、教育我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莫非是到了“天堂”以后就用不着科学研究了？或许因为现在我们走在去“天堂”的路上，提前议论了“天堂”里的事？“衰老研究”已是当今科学界甚受瞩目的研究课题，而我们三个青年学生当年却为此被称为成立“反动组织”，付出沉重的代价。

17世纪初，布鲁诺为了阐发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活活地烧死。因为那时的“权威”认为“地球是中心，是太阳围绕着地球转”，从而违背了“圣教”，故被处死。在这20世纪的今天，我们只不过有一个探索生命与衰老之谜的十分幼稚的幻想，却落得个“反动”“落后”，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成了算不完的旧帐！

独坐在这荒山鸡场之中，仰望着窗外的夜色，思及这些年来的遭遇，如今居然更落到了如此地步！星月朦胧，辉映着小宁宁可爱的睡姿，前途茫茫，人生将会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心情无限愁怅……

怅 歌

黯淡秋光琼芳泣^①，
瞻前思后惊迷离。
自是人生多坎途，
寒蛩月脱情迫急^②，
惊世骇俗十年乱，
千村寥落倍凄迷。
思情无髓与时变，
天地有形难逐谛。
长空入冥思潮迫，
无声可待惊雷击^③。

① 屈原《九歌·东皇太乙》：盍将把兮琼芳。

② 蛩（音 qióng 穷）：蟋蟀。

③ 鲁迅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十七章 落实政策

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是第七个年头了，一个好端端的农学院已被整得七零八落。甚至一些“突出政治”的人，也开始露出怨言，虽然不敢正面反对，但旁敲侧击提点小意见，发点牢骚则是大有人在。

这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其要点就是“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这种以“推荐为主”的招生方法，具体执行的时候，就成为最热闹的“走后门”。把考试制度，变成了一些掌权者名正言顺地选送他

们圈定的人去上大学。变相地提倡了裙带之风。给书记长官的亲信嫡系、公子舅姑大开了方便之门。

入学？从1970年学院各系分别下迁后，这农学院如何办才算是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在原校址办学是很好的，但在那时候，谁敢把农业大学办在城里？

但学院过于分散，对教学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大家意见纷纷，万般无奈，省革命委员会就决定在岭南地区重新建立新的农学院。

几年来农学院的各个系东迁西搬，浪费的钱财不计其数，现在总算有个“决定”了。于是，新校舍的兴建工程就紧锣密鼓地开张了。

眼看1973年第一届命名为“工农兵学员”的学生就要入学，新学院的兴建工程加紧进行，原农学院在C市市郊偌大的一个校址无人敢问津，分散在各地的系仓促之间向岭南集中，“文化大革命”已经革了8年，从C市市郊搬到岭南市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大问号，但谁也不敢说出口来。这些年来东搬西迁，“革命校舍”着实建了不少，但是都作废了。如今这积极兴建的岭南农学院命运又将如何呢？无人愿说真话，也无人敢说真话。

眼看开学在即，一切都是凌乱不堪。学校在哪里呢？除了有一大批被长期闲置，所谓“需要改造世界观”的“臭知识分子”外，教室、实验室、教学仪器……一切最起码的设施都没有。

教授、讲师被戏剧性地讥讽为“叫瘦”，“僵尸”，现在又要被启用了。有一种民谚流传开来，说这些知识分子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教师们实在是一群可爱的人，大家都把迫害放到了脑后，开始行动起来，迎接新同学入学。

1973年9月以新名称、新姿态入学的大学生——“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在东北一家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中，有一名报刊上大为宣传的人物名叫张铁生。他本是锦州专区兴城县白塔公社的知识青年，当时，江青对国务院颁布的“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大学招生方法，仍然是大为不满，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应当加以批判。恰好在这个时候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兴城考区的文化考试，在理化考试时他因为回答不上，就在考卷的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要求录取的信，希望能够通融入学。他在信中备述他作生产小队队长每日辛勤劳动，无时间复习功课的情况，“为人民热诚忘我地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不像那些“为个人努力的大学迷”，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写道：“我所理想 and 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此事被当地招生办公室汇报上去，时任辽宁省领导的毛远新得知后，就将此信文字上加以修改，并将最后一段话删掉，于7月19日在《辽宁日报》上以头版头条的醒目位置予以报导，其标题是《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不久《人民日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均全文转载，

说什么“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就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说什么这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攻倒算”。从此更是大加渲染将张铁生捧成了“反潮流的闯将”，但世人背后却悄悄地议论，把他讥讽为“白卷英雄”。

由于张铁生被捧成了“反潮流的闯将”，他的入学是当时中国大专院校的一件大事。据报道，在他入学那天，该学院院长亲自带领一伙人到火车站迎接。张铁生从离开家到学校一路上都拍成了新闻记录电影专集，名为《张铁生入学》，标榜为所谓“真正的新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牧医系的教师们，在这种情形下，依然积极备课，迎接“文化大革命”所谓“砸烂旧体制”后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以“反潮流的闯将”张铁生为首，在报章杂志的“革命理论”鼓舞下，他们成了肩负着“改造大学”使命的使者。这帮“反潮流”的学生很傲气，以为他们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正确的执行者。时有教师在课堂上被学生赶下讲台的事情发生。教师们上课的气氛就更紧张了。牧医系先上畜体解剖学、生理学等课程。动物学、动物生物化学等课程砍掉不上。

任教家畜生理学的是一位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当她刚登上这第一届工农兵学员的讲台时，学生都投以不信任的眼光，她感到他们像是在说：“你还能上好课？讲授内容还不是封、资、修的老一套！”这位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师，第一次在学生面前感到害怕，害怕会不会也被赶下讲台。

上课不几周，教育革命的讨论，在以“反潮流的闯将”张铁生为榜样的工农兵学员中又积极地开展了起来。学生们认为现在这样的教学方式是“复旧”。在一次全院师生代表大会上，基础部有位教师发言说：“……像这样不断地讨论下去，不上课，学生还能学到什么东西。”当即受到了工农兵学员的激烈批判。于是，在场的教师都不再发言。

不久，上面来了文件，提出了要“开门办学”，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于是，学院就下到岭南、新丘等县兽医院办学，学院还派了许多政治课教师前来蹲点，总结“开门办学”的经验。

就在这时，张铁生“开门办学”点，演出了一场闹剧。为证实这所谓“开门办学”的“伟大成果”，证明张铁生在教学改革上的成就，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好经验，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安排张铁生做一次大手术，说明什么课也没上的张铁生，就能主持骡直肠破裂的大手术。他们先把骡的直肠用手弄破（人为造成直肠破裂），然后由张铁生主刀，学生当助手，老师们在一旁递手术器械。为证明手术进行之先进性，麻醉采用针麻。手术进行的当时来了两名记者，还有参加绿肥会议的科研人员，闻张铁生的大名，也赶来助兴。可惜针麻失败，大家不得不把骡的四肢用粗绳索捆绑起来，在靠近直肠的腹壁开刀，然后又进行缝合，整个手术过程，动物都是在无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手术进行时，骡因为疼痛挣扎得很厉害，搞得十分难堪。以至在场的记者说：“这不是硬来吗？太残忍了。”当时教师只能当傀

偏，因为“老师不如学生”。难得在场的老师们都怀着一片好心，希望张铁生的手术能够成功，可惜这骡子不争气，手术后的第三天它就死了。但消息已经报导了，张铁生主刀手术的报导文章还是煞有介事地出笼了。

上面领导不断地催促，万般无奈，该校只得责成一位老师写文章。真是难为了这位老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文章才通过，并发表在报纸上。可是后来张铁生垮了台，他又为此事大作检讨，进行自我批评，日子也真难过。

话分两头说，这时或许是牧医系的教职工和大梁的贫下中农都对我的问题的处理议论纷纷；或许是因为1973年我国进入联合国后，我国在美国的一些要人与我的大哥有了接触，而我大哥又提出了想回国探亲的愿望；或许是因为工农兵学员入学，又需要教师。总之，要对我落实政策了。一天管我专案的朱为政来找我谈话，我以为又是那老一套，又要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来了。

我说：“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新罪行？”

没料到他却对我说道：“你怎么这样不开窍，现在是要给你落实政策。”

果然，不久后，一位“工人阶级”来找我谈话，要我写一份关于我大哥所填《鹧鸪天》一词的解释（即在第二章《大字报出笼》中被他们说成是“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那首所谓的“反动诗词”）。而且特意再三叮嘱我要“实事求是，不要自己给自己乱上纲上线”。他们的态度终于使我这个笨人明白了，他们是要我写符合他们想要“解放”我的目

的材料，我的“问题”原来就是他们乱“上纲上线”弄出来的，现在大概是需要来个“下纲下线”吧。于是，我就写了一份编出来的，他们也十分满意的我的新“交代”。

我写道：《鹧鸪天》一词是我在美国的大哥的作品，这是一首爱国词作，第一句和第二句，“景短云愁雪拥阶，寒鸦绕树苦难排。”都是说他自己苦闷的心情。

第三句，“枯枝忍待东君至”，“枯枝”是说他自己，也是说在美国的劳动人民，“东君”就是说的毛主席，就是毛泽东，此句是表达了希望毛主席去解放他们的心情。第四句“绿叶红花一夜开”就是说他们若得到“解放”后的快乐心情。

“梅浪发”梅花是中国国花，所以就是间指毛泽东思想的影响遍及全球，而“暗香猜”则是说毛泽东思想到处传扬的可喜景象。

“河山忽又笼阴霾”是指蒋介石 1962 年要“反攻大陆”。

而最后两句“冰雪几度熬煎过，引望春风总不来。”则是说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都在等待毛泽东来解放，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还不快些来呢？

不管他们怎么想，总之我不会再像在“鬼队”中那么傻，上当受骗被逼迫交代什么“第三层思想”，以换取什么“解放”（见第十二章《“牛棚”生涯》），差点当上现行反革命被判刑或枪毙。

从 1968 年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把被整的人作了分类，一类是本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不是叛徒、特务和历史反革命；第二类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直系亲属

被管、被关、被杀，本人表现落后，但不属于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阶级报复；第三类是有非政治性错误，情节恶劣，有民愤；第四类是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这些人都是属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推一推就会掉下去，拉一拉就可站起来。

据说我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拉一拉就可以站起来，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们所用的人。若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算起他们对我推推拉拉了已近8年，若从清理阶级队伍算起也已推拉了5年。以后听说1973年从上头来了“精神”，我的大哥不久将回国探亲，这种状况会影响关系。于是，就开始给我“落实政策”和调小文来农学院。

调小文来农学院的任务，是朱为政去完成的。事后他告诉我他到河北省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河北省人事领导部门，开好了调动小文的公函，他拿着公函直接就到小文所在县的县委组织部，由组织部直接通知医院放人，小文所在的医院领导虽然是一百个不乐意，但也不敢不服从，于是，小文就顺利地调来了大梁，当时的牧医系所在地。

由省委拨款在大梁修建的教职员工宿舍，数排平房已在离大梁火车站六七里地远的草甸子上修建起来了。我也和其他教师一样，不论书记、主任，不管职位高低，都按家庭人口多少，毫无歧视地分得了一套房子，每户房前都有一小块自留地，教职员工家家都种起了玉米和西红柿，我也有个家了，小宁宁成了幸福儿，又有爸爸又有妈妈了。

刚回系里不久，我就像与世隔绝已久的人一样，对牧医系的环境格格不入，系总支书记告诉我，要开始准备给学生

上课，当然就是要教动物生物化学啰。但是我手边一无书籍二无资料，过去的讲稿早已只字无存。现在既然被告知要讲课，总得开始着手准备准备，于是我就到处找书籍、杂志和各种参考资料，开始写讲稿。教学上的一套，我当然很熟悉，加上我想赶在事情发生的前面，不要一旦叫开课闹个被动，所以在两三个月中，就已写得有数万字。一天，原教兽医学的一个助教，到我的房内，看见了我写的讲稿，就在系里大加嘲笑，说是：“吴苑新真是死脑筋，什么年月了，还写讲稿！”我当时不懂这种嘲笑的由来，事后方才得知，原来是他自己正集中精力争取入党，不久后果然成功地被发展成为党员，但以后牧医系的群众，却因他的入党提了一大堆意见说：“这样的人也能入党？不过是用请喝啤酒的方法入党的，‘啤酒党员’而已。”

几月后，系里安排了五名讲师去全国各大专院校教学观摩。了解各校教育革命状况，取得经验以作借鉴。我亦被安排为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这当然是一项“重用”了。我们先后去了内蒙古农牧学院、内蒙古医学院、北京农业大学、西安大学、西安军医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北农业大学、武汉医学院、华中农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大学……了解各院校教学进展现况，开了许多座谈会，所到各校均受到热情的接待。

当我走到苏州时，接到牧医系发来的电报，我的妻子临产，所以计划要去的华东农学院等校我就没有去。回到大梁后不久，小文生下一女，取名媛媛，邻居听得孩子出生时哇哇的啼哭声时说道：“又来一个受罪的！”这就是当时在牧医

系中，对我家庭状况的评语。虽说是“落实了政策”，却仍是下下等，名符其实的下等公民。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从父辈那里得来的阶级成分，必然还要“遗传”给下一代。若不如此，岂不就成了那万恶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所以“阶级斗争”必须长期斗下去，“阶级斗争”万万不能熄灭。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早已没收的没收，“合并”的“合并”。老一辈的地主、富农、资本家许多人早就死了，但阶级出身成分则必须“遗传”下去。财产没有了，但在思想领域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阶级斗争”就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唯成分论”并非“阶级斗争学说”的实质。今天看来，很多人都会觉得十分荒诞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我无法摆脱的沉重的枷锁。

小文满月不久，我就去新丘市，因为在开门办学中学生学习兽医课程的同时也需要学习部分动物生物化学。我到新丘后就开始和第一期工农兵学员有了接触，常去听听兽医站给他们讲授的内科学、外科学和解剖学等课程。几月后当学生们学得了一些知识，他们就纷纷提意见要求系统地上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等等课程。我看出了意见发展的趋势，这是一个换瓶却换不了酒的“教育革命”，科学的发展，一个专业的安排，都有其规律和其内在的联系，想要生硬地砍去某一部分，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为了使自己开课不被动，所以在新丘市期间我就开始编写《生化学》一书。

1974年度的新生又将入学。在岭南的建校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新建五层楼房的巨大建筑物已经耸立起来，一排排

教职员工宿舍和学生宿舍亦将完工。为了加快教职员工向岭南集中的速度，新的学院党委鼓励大家在岭南农民家租房，学院予以补贴租金。于是，我也就在一贫农家租了一间小屋，提前搬到了岭南。

我们在岭南贫农赵大娘那里租的一间小屋，内有一铺炕，外间有一锅台。我们一家四口就挤住在这小屋中，没有桌子，写字就坐在炕上拿一块木板放在腿上来写。隔一个山口就是新建的农学院，首先办起来的是托儿所和学院附属小学。每天一早我们抱着媛媛，牵着宁宁一同去学校，小文去学院医务所上班，我去看系里有否政治学习、会议或劳动等等安排后，就立刻到图书室或自找地方赶写讲义。在这段时间里，又重复起那句老生常谈，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们一家在这段时间里安贫乐道，生活得还算平静。小宁宁的启蒙教育，第一天第一课就是学习念读“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此外就是“文化大革命万岁”和“人民公社好”等等，在这段时间里经常宣传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的最高指示。小媛媛从托儿所回来，我们问她在托儿所学会什么啦？她娇媚地说道：“文歌大职宾”。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孙光文教授正好在一旁，笑着说：“好哇！‘文化大革命’你说成‘文歌大职宾’该不该抓个现行反革命！”把个小媛媛吓得直往妈妈怀里钻。

我们的房东赵大娘家养有四只母鸡。宁宁和媛媛总爱把自己碗里的食物拿去喂赵大娘家养的鸡。赵大娘很喜爱这两

个孩子，和我们相处十分友好。不久，我们发现赵大娘竟然把自己家养的心爱的母鸡，一只一只地杀来吃了。我们原先不知道，一天她端给我们一碗鸡肉，问起来才知道赵大娘杀了自己心爱的母鸡，我们十分奇怪，赵大娘怎么会杀自己的下蛋母鸡呢？特意过屋去探听究竟，才知道是小队队部（人民公社生产小队）通知“根据上头‘精神’，反对走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凡养有母鸡的家庭，每只母鸡每月上交八个鸡蛋。”赵大娘没有鸡蛋上交，所以就杀掉母鸡。这种政令真是叫我瞠目结舌，真不知怎样才能安慰这位和善可亲的贫农老大娘。

1974年秋，大家迁入新宿舍，我被分配住进了八栋三楼，一室一厅一厨一厕的单元房，孙光文教授住我楼下一楼。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第二期工农兵学员要求课程的讲授，要能体现教育革命的成果。又要求开动物生化学课，但对于动物生物化学一科的讲授，则提出了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三门课程合并为一门课来教，要求能开出一门体现教育革命成果的课程来。此课程经系里与基础部联系后，基础部生物化学组回答无人能开此课。系里经多方联系不成后，他们就把开这门课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推脱不成，就只有硬着头皮接受了开此课的任务。此课取名《动物化学》。

为了赶开《动物化学》这门课，我日以继夜地赶写讲义，开课的时间到了，讲义才写出三分之一，就只得一面讲课，一面编写，分章节地发给学生，力求赶上讲课的进度。

但这时却传了解放军某军兽医大学的全国推荐样板教材，看了他们的教材后，深感自己写的讲义不合潮流，因为他们的教材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一切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此种教材几乎有一半的内容都是马（马克思）、恩（恩格斯）、列（列宁）、斯（斯大林）、毛（毛泽东）的语录，讲任何一个问题，前面都必须要用他们的语录为前导。举个例子来说：在讲到“动物体内的新陈代谢”时，讲义上就这样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动物体内的新陈代谢，就存在着合成代谢和分解代谢两个方面……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所以生物体内凭借各种化学反应，能将体外的物质（营养物）及能量加以转变，吸收和利用。”

编写这样突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材，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去查找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并且要把他们的话与要讲授的自然科学的内容联系到一起。讲解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个自然现象，都要由马、恩、列、斯、毛的教导中引伸出来。这种牵强附会，形而上学的东西，却是我们当时必须效法的典范。这在人力雄厚的教研室，可以共同编写这种“典范”，我在如此紧迫的情形下开课，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来编写这种处处都要引用“伟大语录”的教材。再说此时反潮流的闯将提出了“星期天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所以全院师生在星期天都不得休息，全体参加修“大寨田”，即把学院内的一座贫瘠小山改造成梯田。更因此时市上物资奇缺，家家户户都要为储备过冬白菜挖菜窖，真是忙得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由于一周七天全部被安排得紧紧

的，没有空闲时间，全院教职员工都没有时间作家务事，连洗衣服的时间也没有，有孩子的家庭更是困难重重。最后还是由党总支书记胡建华向院里说明，给大家一点作家务的时间，但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口头上还是要反的。

这时学院的文娱生活，主要就是晚上放映露天电影。所放电影除了“革命样板戏”之外几无别的内容，真是“10亿人看8个样板戏”。每到放电影的日子，全院的教职员工拉家带口和学生都带着小马扎，高高兴兴地坐在礼堂前的半山坡上看电影。有一天晚上，正在电影放映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突然大声呼喊起来。

我问他道：“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他大声地喊道：“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

“眼睛？眼睛怎么啦？”现在是晚上，相互间看不清楚。

他说：“快！快到医务所。”

电影虽然继续在放映，但我只得不看了，急忙站起来扶着他往学院医务所去。可是，医生们都看电影去了，又急忙去放演场找医生。

医生来了看后说：“石子打破眼镜，破碎的玻璃嵌到眼睛中，大一点的已取出来，但小碎块必须立即去看眼科，时间太久麻烦就大了。”

大家又分别去找汽车司机，等把受伤的老师送走后回到电影放映场时电影已快完了。这是有人用弹弓向人群中射击，在黑暗中却始终没有抓到这个坏蛋。真不知这“文化大革命”所造就的一大批恶人的恶作剧，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在这段时间里，学院的文娱生活十分贫乏。再说这“革

命样板戏”大家都看腻了，但却没有别的影戏可看。

一天大家突然得到通知，由工会组织去岭南市看外国电影，这是很稀奇的事，几乎人人都要去看。学院的汽车怎运送得了这么多人，只好步行前往。我抱着媛媛，小文牵着宁宁步行将近 15 华里进城去看外国电影。开映后才知道是放映西班牙影片《罗宾汉》，这还是我童年时代就看过的影片。一个杀富济贫的豪侠故事片。今日能看到进口影片，真是一大奇事。

两个孩子看电影的时候当然很高兴，但走来已经很累，现在再往回走时就困难了。小文和我轮流抱媛媛走了一段路后，实在是抱累了放下来叫她自己走，可没走几步媛媛就回过头来，把两只小手先往天空一张，她刚要想说“爸爸，抱抱”，小文立刻说：“你们看媛媛要说，爸爸，你看我会走，我不要抱抱。”于是，媛媛立刻放下手回过头去，像个小鸭一样自己继续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正在我们一家四口走得很累时，突然校车开来停在了我们旁边，司机一定要小文抱媛媛上车，但车上实在太拥挤，无法上得去，最后就让她俩坐进了司机台，一位教师从窗口把宁宁抱进车去。车开了我就独自一人快步走回家，进得学院远远看见宁宁和媛媛早已在山垭口等着我了。大家高高兴兴，难得有这么一个愉快的日子。

回到家中，晚餐特地煮了三个鸡蛋，孩子和小文各一个，当时鸡蛋是难得的食品。吃饭时媛媛碗中的鸡蛋，始终舍不得吃，她总在碗中留着翻来扒去的。

小文说：“啊！媛媛不爱吃蛋蛋，给爸爸吃吧。爸爸还

没有呢。”

媛媛急忙说：“不，我爱吃蛋蛋，我爱吃。”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天，学院门前出了一件奇事，就是判岭南种畜场党委书记死刑的案件。原来这位书记大人，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先后强奸了16名下乡女知识青年，强奸手段恶劣。在临判他死刑前几天，他还口口声声地声称：“我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劳苦功高，共产党绝对不会杀我。”在开判他死刑的宣判会的那天，传说岭南种畜场的会场戒备森严，以防他多年培植的爪牙作乱。

现在的学院是建筑在一山沟中，翻过南面的小山就是火葬场，本地区死了的人都在这儿火葬。火葬场与新建教职员工住宅区一座小山相隔，小山上有一片树林。这时我们的女儿已经3岁。我无论工作多忙，清晨总要带两个孩子到这儿来运动锻炼身体，黄昏时则带着两个孩子到这儿散步，小文和我牵着媛媛，宁宁蹦蹦跳跳地跟着我们。媛媛摘下一朵蒲公英，要我抱起她来用嘴吹，一片小小降落伞群向着山坡下飞啊、飞啊，两个孩子笑呵呵地跟着追赶、鼓掌、跳跃。

哥哥摘下一朵小野花问妹妹道：“媛媛，这是什么花？”

媛媛立刻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边香花！”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大家分头捉来纺织娘，用草茎编个笼子装在里面，带回屋挂在窗口上听她“吱吱”的歌声。

是的，“边香花！”这就是大难之后我永远难忘的“我的边香花时代！”那纺织娘优美动听的歌声，那小小降落伞在

蓝天里轻柔的飞翔，像梦一样地至今仍在我的心中萦绕，荡漾。

火葬场后面的山沟就是本地区的刑场，凡被判死刑的人都被抓到那儿去执行枪决。一天我正在家中写讲义，忽听得宁宁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声地喊道：“爸爸，爸爸，快去看火葬场枪毙人。”他拉着我就跑，来到“边香花”小山上，满山坡都已站满了学院的教职员和家属，他们都放下了工作跑来看枪毙人。不一会儿三辆卡车载来五花大绑的三个人，分别由一小队人拖到了火葬场后面的山沟中，强令站定。我们从山顶往下看，直线距离并不太远，离我们视线最近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被拉扯到指定位置站好，执刑的人跑步向后和他拉开一段距离。只见这个男子仰面看了看天空，又向人群看了看，然后低头看他前面地上的一个小洼坑。霎时间三声枪响，把周围的人群吓得一惊，枪声在山谷中发出回响。眼看离我们视线较近的中年男子，当清脆的枪声“吧”地一响，就听见他头部“扑”地一声，好像有一股青烟从他的头顶上升起，伴随着枪声在山谷中的回荡，他就软绵绵地扑面倒在了他刚才看了一眼的小洼坑上，就此死亡。青烟似乎缓缓地在山谷上空升起，看热闹的人群发出不同的议论，脚踏着这秀丽的小山岗，缓缓离去。而我却在想：“前些时若我被定成了‘反革命’，这颗子弹也就会打在我的头上。”

想着想着，突然发现小宁宁不见了，小文抱着媛媛上山来找到了我，她责备我为什么带着孩子做这种无聊的事，跑来看杀人，还把孩子也看不见了。后来找到他才知道是被他

的小伙伴拉着跑下山去了。

看行刑，听人一次又一次讲述种种奇闻怪事，就和难得看到的一场电影一样，就成了此时学院中人们的文娱生活。

“文化大革命”到现在已快9年了，“反潮流的闯将”在学院中当然具有绝对权威。多年来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人们游手好闲，背后议论别人的习惯。整日议长论短，说三道四，“张家长，李家短，王家打了个大花碗。”人与人的关系尔虞我诈，十分紧张。人人脑子里都绷紧了一根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弦。适应“文化大革命”所造就的新环境，预防挨整，不少人都是两副面孔在生活着，会上一副面孔，会下又是另一副，会上一套，会下又是另一套。达尔文的《进化论》——“适者生存”涂上一层“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色彩，有的成了“变色龙”便于攻击别人；有的成了“变色虫”防止被人攻击。人们都变得“聪明”了，基础部的党支部书记王佳真，每次主持会议，总是用一只手按着腹部，声称“肝区疼痛”，好令人同情，让人想到他是在抱病坚持上班。于是，李××带病，王××也是有病……有病坚持工作是思想进步，是政治本质好的表现，是评论会、鉴定会上提优缺点的内容，而且下乡、义务劳动都有可能避免或从轻，将来涨工资、申请补助都是大有裨益。再说公费医疗用不着自己出钱，“体弱多病”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于是，“泡病号”一词便应运而生了，“有病”成了时髦。大家生活的环境，早已不是什么“按劳取酬”，而是按“政治条件”，看嘴巴是否能说会道了。医生，在一种新的含义上，成了令人羡慕的职业。因为医生有权给人开病假证明。

● 沉 思

农学院从“步行王庄 500 里”到“下迁”再集中岭南，在省内转了一个大圈子，浪费了大量的钱财，人力和物力。

可是，在所谓“教育革命”上现在究竟有哪些具体收获呢？教学上比“文化大革命”前究竟有哪些“进步”呢？谁也说不清楚。

第十八章 再登讲台

新学期开始了，系里又安排我主讲动物生物化学。在开课前就听说宋大维老师给工农兵学员讲课所发生的事情。宋是土壤农业化学系的老师，和我很熟悉。这次组织上安排他给工农兵学员讲课，再登讲台。他备课十分努力，为学生讲课量体裁衣，力求作到要把学生教会，教懂。在“文化大革命”前学生入大学都是高中毕业生，经过考试，成绩优秀方才录取，所以学生文化程度大体一致。现在的工农兵学员，是以所谓“群众推荐为主”，“政治”为第一条件入学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具有高中生的水平，有的则连个水分子“ H_2O ”和氧分子“ O_2 ”都不认识，有的甚至连课堂笔记也记不下来。所以给这些学生讲课就得从最基本的讲起，但又得兼顾讲授进度。当宋老师讲授完一小段落后，他想检查一下自

己的教学效果，于是，他就在课堂上提出一个小问题，让学生思考后，再请一位学生回答。果不出所料回答不出来。他只好认为是自己讲解有缺陷，便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再作讲解之后，他说：“昨天我提问了一位同学，但没有答上，这也许是我没有把问题讲解深透，现在我再请一位同学回答一个问题，我把问题写在黑板上，大家思考几分钟，然后我请一位同学回答，若仍然回答不上也没关系。我可以再讲解，或在课后辅导。”

当他又讲了一个单元后，他又第三次向同学提问，下课后的当天下午，在教学主楼出现了大字报，其标题是，“坚决反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员的猖狂进攻。”向宋老师提出了质问。

宋老师遇见我时，含着两行热泪，一肚子委屈地向我说：“我是一番好心怕同学没听懂，提问了同学，怎会是向工农兵学员进攻呢。”

我说：“现在的事难说清，凡事总得多动点脑子才行。”

吸收了宋老师的经验教训，我讲课就更加注意了。我先发讲义，再发辅导提纲，上课不提问，注意课程进度，不贪多求快。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有9年没有给学生上过课了，9年来天天都在喊教育革命和教育制度的改革，现在进行得究竟怎样呢？若将“文化大革命”前与现在相比，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

“文化大革命”前的学生多是从学校来，社会经验少。工农兵学员则多是下乡知识青年、农村或城镇知识青年，一般都有两年以上社会经验，不少人都是队长或书记。

“文化大革命”前学生入学后先上基础课，如物理、化学、生物、外文、体育、政治等，然后是专业基础课，如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等等。三年级以后才开始学习专业课，如兽医专业就是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流行病学等等，畜牧专业则为养羊学、养马学、养牛学、饲料分析、畜产品加工等等，而专业基础课亦针对不同专业而有所偏重。二三年级有课程实习，毕业前有毕业生产实习。现在“开门办学”则一入学就先去兽医院或牧场，然后再补上专业基础课和基础课。

再有就是教材不同，“文化大革命”前教材中很少用马、恩、列、斯、毛的语录来作讲授的自然科学内容的引导语，现在则处处要用这些语录来编写教材，讲课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

还有就是考试制度不同，“文化大革命”前有小考、期中考、期末考、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毕业答辩，现在则废除了考试，能够入学就能够毕业。

“文化大革命”前学生就是学生，现在的学生则是政治觉悟被捧上了天。他们“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学生监督或指导老师，这叫做“掺沙子”。

当时动物生物化学的开课方式是“突击”。没有实验室，所以也没有实验课，讲授是一周讲十二次，每次半天。也就是说从周一到周六，上午下午全满，星期天修大寨田。教师无备课时间，学生无复习时间。填鸭式地教，填鸭式地学。“文化大革命”前是一周四节课，分为周二和周四上，另有三节实验课，多安排在下午，此外还有答疑，辅导等。

综上所述，就是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砸烂旧教育制度后，所建立的新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

为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革命”成果，这时又掀起了“全国学朝农”的运动。所谓“朝农”，就是原来辽宁农学院下迁去朝阳地区的水利系和农业机械化系。这是当时江青利用辽宁农学院的又一大“创举”。“朝农”之誉为教育革命样板的主要经验就是“朝农办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大家都来学就是大学。”

为学“朝农经验”，全院又再次拉起大队，“拉练行军”去朝阳地区取“经”。更进一步鼓舞起学院的革命斗志。我因开课任务紧，无法去参加“拉练行军”。学院规定：凡双职工家庭必须有一人参加“拉练”。经院、系领导研究决定，我留校在家备课，带孩子。小文去参加“拉练行军”，步行去朝阳。

在我整日忙碌不已的时候，一天原系党总支部干事李林新和我走在一起，他对我说道：“现在组织上安排你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你要全心全意把课讲好，同时你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学习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我问他：“是不是我又有什么事做错了。”

“不是，我是提醒你。”他回答道。

“谢谢”。

我明白了，他是习惯性地对别人进行所谓的马列主义教育。

在我进行讲课的一天早晨，突然下起大雨来。我冒雨来

到教室上课，等了10多分钟仍不见学生到来。“文化大革命”前上课有时是要点名的，现在从来点名。不久见一名学生打着雨伞来到教室，他是代表其他学生来叫我去学生宿舍给他们上课。去学生宿舍在寝室给大家上课？没有黑板，那么多人怎么个上法？

我说：“下雨我不也走到教室来了吗？现在雨已经下得小多了，还是请你叫同学到教室来上课吧。”

该学生离去后不久，见他和一位工宣队师傅，与另一院党委成员一同向教室走来。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否则工宣队师傅和院党委成员来干什么呢？

我苦苦地思考对策。不久他们进入了教室，工人师傅用责问的口气对我说：“学生派代表叫你到寝室去给他们上课，你为什么不去？”

这时我已经想好了对策，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到寝室去给学生上课是没有问题，只是有件事我没想通。”

“什么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今天下点雨学生就怕雨不到教室来上课，我若去寝室给学生上课，像那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符合毛主席的教导吗？那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吗？”

工人师傅哑口无言，他们三人小声地商量了一会儿，决定由该学生去通知同学们到教室来上课。

几天后，在一次全院性的大会上，党委书记说：“……现在我们有一名教师在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的问题上，还能考虑毛主席的教导，说明这位教师还是有进步嘛。”

事后宋老师碰见我，他对我说道：“同样是上课，我一片好心却落得个‘猖狂进攻’，而你到了危险关头却化险为夷，还受到表扬。你说这公平吗？”

我笑着回答道：“前些时候你没进‘鬼队’，看来你该补一课，把你抓进‘鬼队’去呆两年，你就学好了。”

我俩都笑起来，然后一同回家吃饭去。

这次开课讲完了预定的内容。没有考试，我没有出问题。

反潮流的闯将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去访问日本。回国后就到处作报告，他讲，……江青对他如何如何好，吃饭时给他往碗中夹菜。又讲道，他在日本时与资本家作斗争，有一个资本家刁难他，问他一些怪问题。于是他也就不客气，向这位资本家发难，也回问了他一个问题，您说骡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使得对方再也不敢向他发难。同时他还讲道，也有人对他很友好，如有人送给他一双象牙筷和一个很精制的碗。

后来私下听说，曾有人忠告他送碗筷的故事不要再讲了，因为那是在骂他，说他是“饭桶”。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整个学院也进入了防地震高潮，人们晚上不在家中睡觉，都在屋外搭起了窝棚来过夜。根据上头的指示，“不能拿地震压批邓”，学院又大抓起阶级斗争来了，所谓“反潮流”的风声越来越紧，我天天都提心吊胆，也许又会抓到我的头上来。

这时学院附属小学教宁宁的老师突然来做家访，说宁宁不好好听课，并且一直不批准宁宁加入红小兵（即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我心中当然十分明白，不批准宁宁加入红小兵是“阶级斗争血统论”的结果，是学院抓“阶级斗争”又趋紧张的缘故。

我问宁宁：“你为什么不好好听老师讲课？”

宁宁说：“爸爸，我是好好听课的，那天有一只蚂蚁爬到我的桌子上来了。我不想杀死它，我看着让它爬走，老师过来了说我玩蚂蚁，不好好听课，老师还把蚂蚁打死了。它好可怜啊！老师还不让我加入红小兵。”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加入了红小兵，孩子脖子上可以系上一条美丽的红领巾。那是光荣的象征，宁宁很羡慕，很想戴红领巾，但却总戴不上。这对幼儿的心灵是一个无辜而有害的无情打击。

老师家访离去后我对宁宁说：“宁宁，红小兵不能入，只要上课好好听讲就是好孩子。”宁宁说：“我听爸爸的话，我好好听课。”

学院的“阶级斗争为纲”又抓起来了，开会学习时传达了“反潮流”的闯将张铁生的讲话：“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敢不敢顶着干？现在是‘走资派还在走’！中央现在就有一个赫鲁晓夫！”他还说：“江青同志教导我们‘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和他‘顶着干’！”并暗示中央这个走资派就是邓小平（邓小平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即被打倒）。学院中把体育教研室的王老师看管了起来，办班，交代问题，形势又是十分紧

张了。我时时都在警惕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4日清明节，北京人民送花圈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潮如涌，沉痛哀悼周总理。却遭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所控制的首都工人民兵、卫戍区、市公安局联合指挥部的血腥镇压。江青等人严密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登载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报纸上是清一色的一边倒的政论、批判和报导文章。这时我们的政治学习，总是组织大家听念读报纸。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有许许多多所谓的“反动诗”，字字句句都感人心弦。其中有一首是：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天安门事件后我所在的学院则刮起了和报纸上完全一致的批判风。在教学主楼的旁边，建立起了巨大的“大批判专栏区”，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又挂出了“打倒邓小平”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巨幅标语。我们每日受到的教育都是：“走资派还在走”，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和平演变正在进行。

我们学院也把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成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反革命事件。

1976年9月9日，突然传来了毛主席病逝的消息，整

个学院立刻进入了震惊而又紧张的气氛之中。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人们面前一个严酷的现实。一场严峻的斗争激烈地展开了。在激烈斗争的日子里，江青及其同党到处作报告、讲话、签名、题词，为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我们学院中亦广为流传毛主席 1961 年 9 月 9 日所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为江青所题。

1976 年 9 月 9 日和 10 日，反潮流的闯将张铁生在辽宁省委知识青年办公室讲话吹捧江青。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看江青，她对毛主席的思想理解最深。她要挑大梁我们最信得过。”江青对张铁生的讲话十分赏识，为他的讲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不久江青一伙在《光明日报》头版抛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这段时间政治学习不多，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人人发言都很谨慎。

万万没想到，就在 10 月的一天，突然传来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垮台的消息。记得那天听见这一消息广播时我们正在劳动，听见这消息我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便对正在我身边劳动的赵江说道：“你听广播。”他突然像是疯病又发了一样，把手中的铁锹一扔，一句话也不说，掉头就走了。当时我心中真是开心得没法形容，大家都没有心情再继续劳动，各自早早地回家去了。到家后小文和我牵着两个孩子往“边香花”小山上跑，我们在那四周空无一人的小山上跳啊，唱啊，发泄着胸中多年的积郁。

人们背地里欣喜地讲述叶剑英如何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于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办法，抓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并在中南海201大院抓江青和毛远新等人的小道消息，更是趣味横生地讲述着如何抓江青，以及江青被抓时的种种丑态。只要有会，我就要请“消息灵通人士”重复再讲那抓“四人帮”的趣闻。我则在听取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自我享受着心底深处的欢乐。“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80年11月公审“四人帮”，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张铁生亦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当时，我和小文带着宁宁和媛媛爬到了学院后的小山，媛媛奔跑着去采摘蒲公英。这小小山岗今天是如此美丽。媛媛命名的小野花——“边香花”也格外美丽，仿佛在对着我们甜蜜地微笑。我摘了一朵“边香花”，戴在小文头上。媛媛撒娇地一定要爸爸也给她戴上一朵。我们一同躺在草地上，抬头仰望蓝天，宁宁坐在我的旁边，媛媛往我身上爬，两个孩子要妈妈讲故事。

小文说：“爸爸故事多，叫爸爸讲吧。”

两个孩子转而要求我。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在上早朝时关心他的文武大臣们的生活。

皇帝向众大臣问道：“众位爱卿，大家每日忙于国事，都辛苦啦！你们的生活还好吧？”

“我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托万岁爷的洪福，生活得很好啊。”

“什么是万岁爷？”宁宁打断我的话问道。

“中国古时候多用岁数来代表官职的大小，比如皇帝就是万岁爷，亲王就称九千岁，再小一点的就称为八千岁。”我继续讲道：皇帝听大臣说生活过得很好，于是又问：“你们一天吃几头猪哇？”

一位大臣说道：“启禀皇上，微臣一家人半年也吃不完一头猪，哪能一天吃几头猪呢。”

皇帝龙颜不悦，说道：“什么噢！一家人半年也吃不完一头猪？这还能说是生活好吗？我一天就要吃三头猪呢！”

大臣们明白了，这是太监贪污报的谎账。但谁也不敢揭穿。

一位马屁精立即奏曰：“我皇天仙龙体，当然要吃三头猪。微臣等凡夫俗体，怎敢和圣上相比，所以我们吃不了那么多。”

原来是这位皇帝万岁爷，从小生活在皇宫之中，没有见过猪有多大。在万岁爷的脑海中，以为猪只有拳头那么大呢。

媛媛嫩声地问道：“爸爸，那么猪是多大呢？”

媛媛的问题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我抱起她来说道：“啊呀，我的小公主，原来你也是刚从皇宫中来的哟！”

回到家中我对小文说：“讲这个故事，我想起了1958年《人民日报》上登载水稻放‘卫星’，亩产36000斤，‘大跃进’的浮夸风。”

● 沉 思

“不要想些没用的事，好不容易落实了政策。少说废话。”

我当然同意小文的见解，独自忙着备课去了。

第十九章 出 国

以“四人帮”垮台为标志，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一天，我在岭南市内看见一个蔬菜店前有许多人排队买茄子。这是难得买到的蔬菜。我想今天运气真好。所以我也排上队想给孩子买点回去。本来秩序很好，却不料附近的工厂下班，突然来了几名工人，他们挤到前面不排队就要买。排队的人大为不满喊叫了起来，这时我已排到第三位，眼看就可以买到了，可惜秩序就要乱了。

我说：“我们原来排着队，秩序好好的，你们不排队，来了就要买，我们排队这么久却买不成。”

几名工人中有一人指着我说：“这小子是农学院的。”另一人立刻大声喊叫道：“嘿，臭老九，臭老九！臭老九还敢管我们工人阶级。”

又一大喊道：“老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臭老九还敢乱说乱动！”

两人走上来抓着我前胸的衣服就往外拉，把扣子都拉掉了两颗。这时，排队中不少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都为他们破坏了秩序生气。看见这些人不讲理，立刻就跑上来了六七个人站在了我的一边和他们争吵起来。两边各有七八个人，势均力敌，谁也不敢再动手。这时蔬菜店要关门不卖了。几个工人又一拥而上和蔬菜店的人争吵了起来。我再也不想买这几个茄子了。在往回走的路上，一股莫名的愁绪深深地烦恼着我……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10年“文化大革命”所遗留下来的社会影响并未结束，拉帮结伙，打斗行凶，道德败坏的影响也未结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培育”，认识到“权”字的重要性的一些干部在学院中（以牧医系为例），争夺“七品芝麻官”的闹剧没有结束，由“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教育断层，更是远远没有结束。另一方面，“文革”10年，正是亚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我国国民经济却陷于崩溃的边缘。“文革”中遭受冲击的干部和各阶层人士，范围之大，影响之广，亘古未有。我个人所受的种种磨难，就只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像是跟牧医系的领导干部和“革命派”存心过不去，要和他们开玩笑一样。最初他们紧跟党总支支部大抓“牛鬼蛇神”，整同系的中、老年教师，万万没想到北京告状一仗，天公不作美却当上了“保皇派”。被造了反后，急忙摇身一变，成了“反戈一击有功造反派”，

“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大行军，大下迁，大搬迁”。以为万无一失了，正当他们沉浸在美梦中的时候，突然间晴空霹雳，“四人帮”倒台，真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于是，一个个又急急忙忙作检讨，脱干系，划界线，也真够受的。

清理“四人帮”罪恶的活动，在农学院中开展了，党总支部书记胡建华隔离审查，交代。而这位现任党总支部书记王立成当初费尽心机，在牧医系中大抓“牛鬼蛇神”。花了近10年的时间，却是无功而溃。现在轮到审查他了，可他却经不起审查，一下子就查出了他的马脚。查出了许多问题。于是乎，他的这顶乌纱帽就保不住了。农学院牧医系不好再呆下去了，只得调动工作。听说被调动到了某一小单位，却依然又得了一顶新的乌纱帽，仍然是当官，姑无论是鸡首还是牛后，大小总还是个官职！

一天，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因室内坐满了人，所以我就坐在门口，这时陈志方走到我的旁边，小声地对我说道：“吴老师，你知不知道，那回去你家抄家，打你的人是谁？”他接着说道：“打你的人就是刘铭。”

我清楚地记得这第一位动手打我，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的人就是陈志方他自己。但我却没有回答。今天要“整顿”了，第一个出来赖账的就是他！

难道我还能寄希望从他这样的变色龙那里，找出个“真理”和“正义”来不成？所以我一句话也未说。

“四人帮”一倒台，学院返回原校址的呼声大起。正在施工的岭南农学院校舍亦停顿了下来。人人都希望搬迁回

去，再说现在岭南的校舍无实验室，许多课程都开不出来。于是，整个学院又陷入了举棋不定的局面。

一天，我碰见曾一起呆“鬼队”的一位“反动学术权威”，他对我说：“小吴，我刚才从中央开会回来，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现在你有何打算？”

我们曾一同历经磨难，相互间无话不说，我答道：“这个牧医系我实在是呆不下去，我要设法调回家乡四川去工作。”

他说：“你10年也办不成！”

“那怎么办呢？”

他笑着说道：“申请出国，立刻就能成功。”

我说：“别瞎说了，‘文化大革命’我为这点海外关系，差点儿没把命搭上，现在好不容易老婆孩子在一起，有了个一家团聚，还再去捅那个马蜂窝？”

他认真地说道：“我还会整你吗？我刚从中央开会回来，我相信你一申请就准。”

恰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我的大哥大嫂，带着他们的孩子回国探亲的消息。在什么地方让我们弟兄见面，成了学院领导和牧医系考虑的一个问题。

传说当时领导考虑结果只有在原学院校址才合适。但原学院校址已被工厂和各住家户占领，各住家户在优美的林荫道至植物园的沿途，搭了许多小窝棚，很不雅观。于是，省委下达命令，将所有窝棚连夜拆除。学院动员人力在综合楼整理出了几间像样一点可供参观的实验室来。

大哥一家到达C市的那天，学院统战部部长叫我一同去火车站迎接。当我在火车站第一眼看见大哥时，真是千头万绪无从说起。为了见这一面，我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喊了一声：“大哥”，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学院统战部部长、大哥和我坐进同一部轿车。大哥对学院统战部部长说道：“我的弟弟在你们学院工作，多年来谢谢你们对我弟弟的照顾和关怀。”

我的眼中充满着泪水。我在想：“从1958年毕业分配到农学院，我在这儿工作已有22年了。22年确实是一个不短的日子啊！人生能有几个22年呢？这22年正是我的壮年时光，但这些年我是怎样渡过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紧接着3年国内战争共产党取得胜利。长期战争后人民渴望和平，全国上下，乃至海内外华人都蕴藏着一股建设祖国的热潮。我曾热情盼望毛泽东能够正确地领导，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国家。但是，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40年的时间里，却搞了一些毫无必要的运动，极大地浪费了建设祖国的大好时机。

我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运动。如：“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合作化”，“肃清反革命”，“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有的带有简单化、扩大化的倾向，而继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疯狂的时代。

在这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的同时，各种插曲多得不胜枚举，诸如：“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大调整”，

“反胡风”，“批武训”，“向党交心运动”，“大食堂、大锅饭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除四害、讲卫生”，“大深翻”，“全民大炼钢铁”，“千斤猪、万斤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单位亩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导致了从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大饥荒；《人民日报》巨幅标题报导，水稻亩产从数千斤，迅速提高到数万斤，甚至有水稻密植到其上可以坐一个孩子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诸如“农业学大寨”，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尊法反儒”，“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宋江”等等，或变成极“左”路线的典型，或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搞得全国人民没有一天宁静的日子，已把国家和民族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反观我自己呢，年轻时候的一腔激情，在最有作为的壮年时期，被吞噬在不堪回首的崎岖与坎坷中，而今，我已是半百之年，该如何，却又能如何……

想着，想着，车已到达学院。当我看见学院的林荫道上挂着巨大的欢迎标语时，我的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曾几何时，这儿却是贴的“红色风暴万岁”的巨幅标语，我差点没死去。而转瞬间却是“最热烈地欢迎”！千头万绪真叫我无从说起。

我的大哥叫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照像，我不愿意去照，大哥问我为何如此不懂礼貌。我默默无语。

事后他问我道：“你要做什么嘛？”

我说：“我要出国。”

他说道：“出国？你在南开大学念书时我就写信叫你出来读学位，怎么现在又想出国了，你申请吧。”

“申请？就是批准了我也买不起飞机票。”事后我算了一下，按1980年时的收入计算，由于当时实行低工资制，我和小文工资的总和，一文钱不花，也要存10年才够买我一家的赴美机票。

“我给你买飞机票好了。”大哥回答道。

大哥一家在国内的观光日程被安排得紧紧的。在学院观光后，又去长春和北京观光。一起游览万里长城，又参观机车制造厂……北京观光后，我们又一同去重庆探望父母亲。弟弟一家也来了。家人团聚十分快乐。

1979年经省委批准，农学院搬迁回王陵原校址已成定局。新学年入学的学生都在王陵原校址上课，又由我主讲牧医系畜牧和兽医两个专业的动物生物化学。我编写了25万字的生物化学讲义。

我于1979年下半年提出了赴美国的申请，未有丝毫困难学院立即就同意了。申请护照必须要由学院开介绍信去公安局申请领取，同样毫无麻烦我就拿到了介绍信。信上写着“吴苑新同志，一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这封介绍信，我的心中真有一言难尽之感。既然认为我一贯有此三热爱，当年却为什么大字报批判，批斗会斗争，把我揪进“鬼队”，关入“牛棚”，“劳动改造”，还差点定成“现行反革命”呢？

申请的手续进行得十分顺利。大哥送给我的赴美机票已寄来。我就要走了！

刚刚毕业到农学院，正值青年之时，踌躇满志，希望在科学上能有所建树而终未能。如今以我半百之年，腰无分

文，却即将去到那异国他乡，地球的另一面。前途茫茫，思绪万千。前面又会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临行前学院内不少教师、同事都来与我们道别，临别依依，最使我难忘是原系副主任孙光文（见第四章《阶级斗争新动向》，我曾陪场和他一同被批斗），走到门口来送行。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站在门口张着嘴，像一个孩子一样地失声痛哭。

说道：“小吴哇，你们走了，恐怕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啊！噢！……”

孙教授为离别悲痛和哀伤的形象，长久地在我记忆中无法挥去。正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面对孙教授的惜别之情，我亦两行热泪长流，咿呜不清地说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无论如何我这小小一家是要走了。带着心灵深深的创伤与无比矛盾的心情，即将离开我的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盼望我的祖国富强昌盛。

水调歌头

我本飘零人，
沦落度此生。
自恨生不逢时，
偏作乱世人。
花言巧语作态，
沽名钓誉是真。
高声倡革命，

鼓吹大斗争，
遗害于万民。

云天碧，
星辰移，
转乾坤。
怅悲风万里，
空沸一腔热血。
奈何往事如烟，
回首虚度韶华，
罔怀少年志，
愤愤意难平，
凄然已黄昏。

第二十章 关注中国

来到美国以后，面临着不少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在国内，虽然我时断时续地学过英语，但刚到之时，仍然结结巴巴，不过在这种语言环境之中，适应起来还是很快；其次是居住问题，举家迁移，得先有一个“窝”啊；最后——最重大的是工作问题，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好在大哥在美国生活了多年，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他很快就为我在纽约大学找到适合我的专业的工作位置。这样，一家人安定下来，宁宁和媛媛就在一所专为华人子弟开设的学校读书。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世界各地侨居美国的人不少。1980年旅美的中国内地的华人几乎都是解放以前到美国的，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离开祖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华人比

较集中的城市，都有华人学校。

据统计，美国现有华人 180 多万，主要集中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前者 30 多万，后者 60 多万），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已经超过了美国白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华人比例达到 34%，远远高于美国白人 23% 的比例。留美的内地留学生一般估计在 8 万人左右，尽管他们两手空空，经济上无法攀比，但却很受尊重，因为他们学业成绩普遍很好，博士生比例最高。

1984 年~1995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系有位来自四川的留学生，攻读生物化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基因工程。也许是同乡的缘故，也许小伙子攻读的专业与我相同，也许他学习的劲头使我想起了自己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我对小伙子抱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慢慢地，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小伙子思想敏锐，学习刻苦，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但是，他学成以后还是要回国，虽然中国的科研条件、学术水平相对落后，但是，中国人体基因资源很丰富，堪称世界之最，“拓荒先行，一定能蓬勃发展，造福人类。”平静的语调中，透露出自信的力量。这语调，这自信与当年李辑祖雄辩的语言何其相似。那时候，我们也一样的年青，一样的充满朝气与豪情，一样的充满希望与幻想，一样的渴望贡献！不同的是，大大小小的运动，闭关锁国的状态在 10 年浩劫中登峰造极，知识分子“写不完的检查，站不完的队”，遑论科研！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国民经

济如何发展，“文化革命”10年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科技水平停滞不前，科研人员备受摧残是一个重要因素。

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经济现象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工作之余，我也十分留意有关报导。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10年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农业生产负增长，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8.80元；城市职工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下降20元。农民生活在“鸡屁股银行”（意指靠鸡下蛋换钱以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下面，城市居民则生活在各种票证之中。科学教育文化更是受到严重的破坏，科研文教机关基本上被砸烂，科研设施破坏严重，学校长期停课“闹革命”，许多科学文化艺术精英惨遭迫害。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一场大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9~1997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大大快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增长

6.1%的速度。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有效地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困扰，陷于经济危机的境地。1979~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差，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第七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1979年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1997年已达1399亿美元，是1978年的89倍。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为日后遏制亚洲金融危机的势头提供了坚实的屏障。

举世瞩目的成绩固然与改革开放的国策紧密相关，但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方针，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阶级斗争热火朝天的“文化大革命”，斗过来，斗过去，工人不安心生产，农民无法种田，知识分子胆战心惊，国民经济怎么能搞上去。

经济发展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199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377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1.97倍；农民人均收入2090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4.8倍。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现在，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为48.6%，比1978年下降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为56.3%，比1978年下降11.4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据统计，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30%以上。1979

年以来，在近 300 个重大项目的科研上，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系列火箭，在技术性能和可靠性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成功地发射了 40 多颗卫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已达商业运行水平，有关技术和设备进入了国际市场。还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重离子加速器、大型天文望远镜等重大科学工程。在交通、能源、通信、化工等方面的应用技术，也有所突破。

在不同的时期，根据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还制定了一系列科技计划，取得巨大的成就和效果。

1984 年，制定“丰收计划”。该项目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农业机械化等各业的先进实用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的推广。“丰收计划”使农、牧、渔业的产量大幅提升，仅就粮食生产而言，1987 年增产 19 亿公斤，占全国粮食总增产量的 18%。

1986 年，实施“星火计划”。“星火计划”旨在依靠科技振兴农业、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计划”成功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过 10 多年时间，已建成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 40 多个，完成项目 4 万余项，为农村培训管理人才达 3000 多万人，在推动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提高产品档次和经济效益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到 1996 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已占工业增加值的 3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1%，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柱。

80年代,全世界掀起了新技术革命浪潮,各国都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制订了“863计划”与“火炬计划”。“863计划”确定了7个方面的技术领域的研究课题,即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等;“火炬计划”则是将“863计划”的成果经过进一步开发,使之成为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目前,全国已建成53个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迅速,产值超10亿元人民币的大企业(集团)就有42家。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还存在很多问题。“863计划”经过十几年艰苦攻关,取得研究成果1200多项,获国内外专利244项,仅有10%的成果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

目前中国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三分之二市场已被国外占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从某种程度说明开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迫切性。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科研开发费用已占GDP的2.3%,中国仅占0.5%。中国五分之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没有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已有的技术开发机构大约有一半不能胜任本企业的技术开发任务,还有一些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在国际知名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竞争中,部分国有企业和相当数量的产品相继退出竞争,把市场让给了国外。

在人力资源储备上，中国目前的情况也显得相对不足，平均每万人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仅有 25 人，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同“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夹着尾巴作人，教育科研机构瞎折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究其形成原因，“文革”时期的大倒退，应该负主要责任。好在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邓小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到朱镕基“科教兴国”，都把科学技术教育提升到很高的位置。我相信，上述问题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获得解决，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水平，否则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可能继续扩大，从而难以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之林。

上面有决心，下面就有信心。进入 90 年代，越来越多的留美学子回到国内寻求发展，报效祖国。

哥伦比亚大学那位来自四川的留学生要回国了。他来向我辞行，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交谈。他的父亲从事法学研究，“文革”中也受到很大冲击。由于父亲的缘故，幼年时候的他，生活异常艰苦，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过，我毕竟长大成人了”。他呷了一口淡褐色的饮料，继续说道，“中国也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尽管步伐非常缓慢，但是在走，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进步，中国，也有可能在世界上赢得相应的地位。”临别，他还再三劝我回国看看，国内这些年变化很大。

1996 年，我回国探亲，感慨良多，前面已有叙述，这

里就不重复了。

1997年，是当代中国意义非凡的一年。有着“东方明珠”美誉的香港回归祖国，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旅美华人反应尤为强烈，在纽约，就有八个华人社团联合主持有关活动。我有幸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召集人之一。在整个过程中，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起初是隐隐约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感觉越来越强，在“七·一”的游行中达到顶峰，我才明白，那就是——民族自豪感！事后交流，很多同胞都有这种感觉。

由于是民间自发活动，我们的信息来源只有通过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公共媒体获得，交接前的种种工作，进行得异乎寻常的顺利，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

7月1日，回归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我们通夜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由于时差，彼时在纽约是6月30日夜晚）。交接非常成功，尤其是江泽民主席充分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二天一早，我们举着早已准备就绪的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抬着“庆祝香港顺利回归”的标语，冲向街头，像过狂欢节似的游行起来。我领队呼口号——由衷地发自内心地高呼着口号；一会儿，我们又唱起了《歌唱祖国》。激越的歌声和振奋的口号声响彻纽约地区。沿途，不少华人——来自内地的、香港台湾的——加入了我们的游行队伍，就是司空见惯的美国人，也指指点点，说道“China”。

这一天，是我最开心的日子。今天，实实在在的“大灭了帝国主义威风”，怎么能不高兴呢！

从此以后，纽约华人增强了凝聚力，关于祖国的话题也多起来，华人在美国的地位也有所提高。

旅居美国已经 10 多年了，往事常常一幕一幕地涌上心头，梦回萦绕，挥之不去，那苦涩的回忆，散发出时代的无奈，眷恋的情结却又透露出赤子心肠。这次香港回归大游行，便是情结的宣泄。“繁荣富强”是国人百十年的梦想，站在世纪的门槛上，我默默地祝愿这神圣的愿望梦想成真。

后 记

来到美国后，往事历历，梦魂常系故国。常常是白天在美国晚上在中国。当我踏上地球另一面这块美丽而陌生的土地时，我们全家腰中只剩 6 美元，好在有大哥到机场来接我们。我在高等学校任教 20 年，为何竟是如此穷困？半百之年，拖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远走它乡，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文化大革命”结束，农学院迁回原校址后，千疮百孔。经学院同仁多年努力，已有甚大发展。农学院已改名为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发展成了畜牧兽医学院。正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1987 年我帮助同教研室某教授来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他带给我牧医系一封函，原信全文：

×老师：

您离开母校已经七年了，系内的老师都非常想念您，您几次给×老师的来信，老师们都非常关心，常打听您的消息，也热情地欢迎您互通国外的信息。

您走后国内形势变化较大，彻底地粉碎了“文化大革命”，清理了“四人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罪行，各行各业士气高涨。

我们牧医系变化较大，通过整党进一步从理论上实践上加深了对否定“文化革命”的认识。全系教工同志认识一致，对您在“文革”中所受到的迫害，都深表同情并且愤慨，在“文革”中添加在您身上的不实之词已彻底推翻，在“文革”中打过您的，抄您家的同志，在整党中已经认真检查，并且赔礼道歉，他们表示对不起您，使您在“文革”中受到了折磨。今天，×××同志去美国学习，她带着全系老师的一片诚心，向您问候，希望您进步，幸福。并且希望您在方便的时候回国讲学传教。

祝安！

牧医系全体教师

1987年9月5日

这一纸短短的来信，竟使我热泪纵横，10年之中的种种磨难，顿时化为乌有。于是，遂发写作此书的念头。其时

浮想联翩，蓦地跳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被“文革”批得家喻户晓的名联，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幅对联，我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写照。溯其源，大概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的延续吧。近百年的中国，积弱积贫，内忧外患，多灾多难，中国人民渴望安定富强。百年中国，为我中华之崛起，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不知上演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反观我自己，曾经幻想，曾经憧憬，终以“知天命之年”远走异国他乡，个中滋味，谁人能解？

今天，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已经蔚然成风，诚是国家一大幸事，中华一大幸事。中国知识分子终于扬眉吐气了。

有感于此，撰写此书，既是笔者生命轨迹之追忆，亦作后生奋进之警策。

本书出版，蒙重庆邓三元先生在公务繁忙之际，奔走于成渝两地之间，联系出版事宜，并在物质上大力支持，终遂我愿，使人感怀。

作 者

1999年1月22日

沉 思

川 迟 著

责任编辑·彭学云

封面设计·李 南

出版发行 天 地 出 版 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印 刷 华西医科大学印刷厂

版 次 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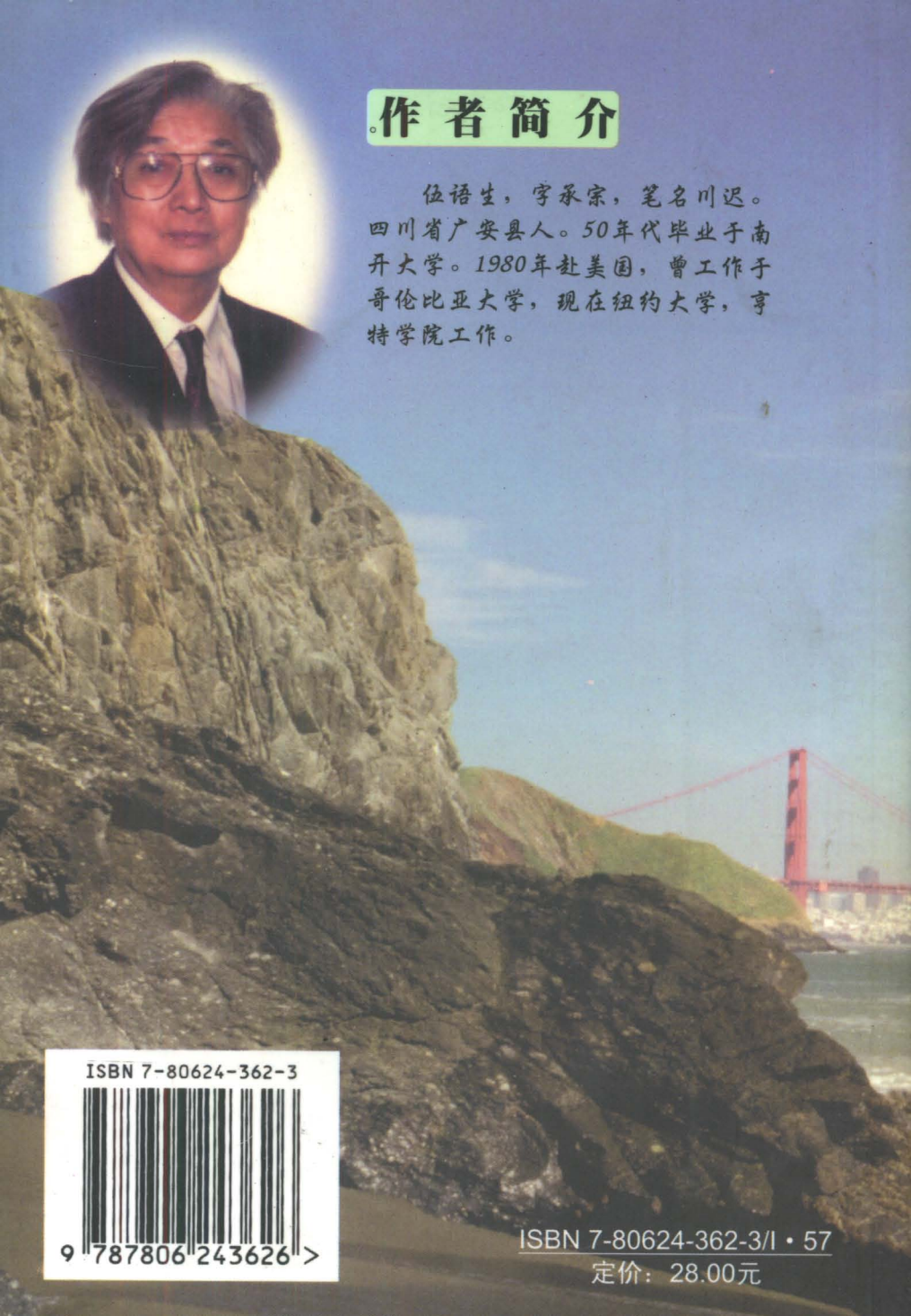
规 格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20 千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28.00 元

ISBN7-80624-362-3/I·57



作者简介

伍语生，字承宗，笔名川迟。
四川省广安县人。50年代毕业于南开大学。1980年赴美国，曾工作于哥伦比亚大学，现在纽约大学，亨特学院工作。

ISBN 7-80624-362-3



9 787806 243626 >

ISBN 7-80624-362-3/I · 57

定价：28.00元